The Revolutionary Self

Social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ividual 1770–1800

Lynn Hunt

革命性的自我

社会变革与现代个体的兴起
1770-1800

林恩·亨特 (LYNN HUNT)

W. W. NORTON & COMPANY
Independent Publishers Since 1923

目录

Introduction:最小的事物如何引发巨大变革

One:茶与女性的“文明化”

Two:革命意象与社会的揭示

Three:艺术、时尚与一位女性的经历

Four:革命军队与战争策略

Five:金钱、私利与共和制的建立

Epilogue:自我、社会与平等

ACKNOWLEDGMENTS

NOTES

INDEX

THE REVOLUTIONARY SELF 革命性的自我

引言

最小的事物如何引发巨大变革

在 18 世纪，欧洲和英属北美的人们对人类前景的看法变得更加乐观。此前，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被原罪无可挽回地玷污，只能通过对更高权力（无论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的恐惧来约束。现在，一种观念开始传播开来，即普通人有自主的潜力，能够行使他们的自由，无论是在选择配偶、职业、宗教信仰还是管理机构方面。通过教育（它增强了推理能力），原本被罪恶标记的人，转而成为了一个由发展和改进能力所定义的人。参与式民主的现代世界并非一蹴而就，但鉴于这种观念上的革命，它的出现是必然的。1

个人独立的同时，还伴随着一个不那么明显的结果：社会开始作为一个独特的实体出现，被认为拥有自己的规则，而个体则被视为受社会条件塑造的生物。这造成了一个悖论：就在挣脱束缚似乎成为可能的那一刻，人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个体，他们微妙却又强大地被社会力量所塑造。原罪失去了束缚力，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决定论——即我们的身份由阶级、种族、民族、

性取向、年龄、职业和婚姻状况等要素形成，这些都是现代官僚机构赋予价值并被个体内在化的所有标记。

本书探讨的正是这个悖论的起源：个体拥有自主能力与社会塑造个体能力的同时发现。尽管个人主义兴起的许多原因已被探讨，但仍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后果：例如，从远方消费商品（如茶叶）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女性的作用（尽管女性的个人能力常被贬低）；新战争方式带来的挑战；以及新金融工具（从保险公司到国债）的发明所释放的机遇。所有这些新的社会实践都拓展了个人潜力的范围。例如，饮茶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成为司茶者；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新角色中，女性现在与男性同坐茶桌，在同等地位上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以更从属的姿态站立一旁。茶桌带来了性别平等的初步暗示，尽管它仍然标志着社会地位，从而也标志着社会差异。

白人女性获得了新的期望，尽管她们在法律上仍然依赖于父亲或丈夫，但黑人被奴役者却没有，至少在理论上没有。然而，奴隶制作为一种状况和实践，却渗透到了关于个人能力的新思维中。它定义了自由的界限，并在各个方面都是自主的对立面。然而，尽管在 1725 年至 1800 年间，被运往美洲的被奴役者人数激增，比前两个世纪从非洲运送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但被奴役者仍然以无数种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自主的渴望，从微小的抵抗行动到重大的自我解放壮举，这往往是通过操纵最初使他们陷入奴役的商业经济来实现的。2

被奴役者的渴望与对个体能力日益增长的强调相结合，共同促进了废奴运动，但它只有在“人”的定义发生改变后才得以扎根。在近代早期，奴役有多种形式：家政服务、契约劳动、对领主的封建义务、农奴制和奴隶制，更不用说未成年人、妇女和手工业行会中的学徒的法律从属地位。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里，很少有人享有自主的优势，只要各种形式的奴役不受挑战，废除奴隶制的论点就很难站稳脚跟。从父母对子女的无限权力到领主对农奴

的权力，奴役在 18 世纪下半叶受到了质疑。因此，对能力的强调有助于回答一个关于非洲人被奴役数百年来的持久问题：为什么废奴主义直到 18 世纪末才出现，然后却相对迅速地赢得了追随者？

社会决定论——这个悖论的另一半——的历史发展更难确定，因为社会是一个比个体更模糊的概念。个体被认为存在于单个人的身体中，但社会没有固定的位置。它通过在很大程度上不言而喻的惯例运作。虽然个体的身体可能总是在变化，随之变化的是个体的身份，但它仍然设法显得独特和可区分。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是什么，但社会则不那么容易识别。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曾有句名言："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简而言之，社会需要更多的解释；它只能通过隐喻来理解。它的规则可能在某个时候以书面形式出现（通常是当规则受到质疑时），但它们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以及个体如何使用他们的身体——例如，茶的冲泡方式或军队训练新兵的方式。社会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在。3

社会一直存在，但它的存在仅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才成为一个议题。其中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是 18 世纪下半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其 1755 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中抓住了这种紧迫感："第一个圈占了一块土地，并自作主张地说'这是我的'，并发现有人足够简单地相信他的人，才是公民社会的真正缔造者。"他接着说，这一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无尽罪行、战争、谋杀、苦难和恐怖的根源。卢梭的《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1762）旨在解决这种社会发明所带来的问题。通过社会契约的结合，个体可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从而保留他们的个人自由。但这份契约有一个警告，触及了个体与社会之间悖论关系的核心：如果一个个体不服从公意，他（卢梭总是用"他"，从不用"她"）"将被迫获得自由"，也就是说，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将被迫服从。4

卢梭将社会提上了思想议程，但他并非唯一关注社会的人。在英语和法语中，“society”和“social”这两个词的使用在18世纪中期之后开始流行，在法语中，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在18世纪90年代达到高峰。法国大革命使一些人相信，社会需要一种新型的科学研究，被称为“社会科学”。（“Sociology”这个词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出现。）18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的出现，标志着理解社会和社会关系的新愿望。5

“社会科学”这个术语的精确出现时间很难确定。1789年，阿贝·埃马纽埃尔·西耶斯（Abbé Emmanuel Sieyès）在他的轰动一时的反贵族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中使用了它。它也出现在1789年至1794年的其他著作中，通常与道德和政治科学相关联。数学家兼政治梦想家尼古拉·德·卡里塔，孔多塞侯爵（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在1792年至1794年间多次使用它。他关于独特社会科学的理念在1795年后在他的追随者中扎根，这些追随者是新的国民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的成员或合作者，该研究院旨在组织和传播知识。（孔多塞本人在1794年面临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时自杀了。）研究院的合作者安托万·德斯图特·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创造了“ideology”（意识形态）一词，他将其定义为思想的科学。他认为社会科学需要“公认和系统化的原则”才能真正成为科学，并且有了这些原则，“我们将能够解释甚至预测不同社会的命运。”因此，从一开始，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就与社会间的比较联系在一起。6

为什么社会科学在法国兴起？“社会科学”一词曾在18世纪的一些英文诗歌中出现，但仅仅是作为社会文明的代名词。它在英语中扎根，是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研究了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著作之后，而孔德曾受孔多塞的影响。1843年，密尔热情地捍卫

了社会科学的理念，尽管他与孔德在如何最好地追求它方面存在分歧，但他是在对孔德作品的反应中发展自己的思想的。7

因此，关键要素是法国大革命。德斯图特·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和孔多塞（Condorcet）、西耶斯（Sieyès）一样，都在寻找稳定法国社会的方法，同时接受了革命带来的许多与过去的决裂。他们认为有必要稳定局势，这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共识，即社会关系处于动荡之中，但相信可以通过系统研究这些关系来制定更好的政策，这表明了更深层次的东西：坚信社会是一个由隐藏法则调节的机体。

这种信念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一种追溯它的方法是通过语言，特别是“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这个术语。在 1789 年之前，它在法语中很少使用，但从 1790 年及随后的几年开始频繁出现，首先是在新的革命议会中的演讲中，然后是在更系统的反思著作中。对社会组织的援引紧随新政治类别“旧制度”（ancien régime，意为“前政权”或“旧政权”）的创建之后。“社会组织”预示着一个新政权正在形成。当西耶斯在《什么是第三等级？》（*What Is the Third Estate?*）中运用它时，他暗示了它的煽动性潜力：“贵族阶层根本不包括在社会组织中；它当然可以是国家的**负担**，但它不能成为国家的一部分。”8

正如西耶斯的话所清楚表明的，如果政治体制要改变，就必然需要社会转型。但改变多少？改变多快？法国大革命期间令人眩晕的连续动荡——废除贵族头衔和特权，处决国王和王后，与大半个欧洲作战，反复修改宪法——使得理解社会转型的需求更加紧迫。它也为社会知识提供了最重要的理由：法国大革命表明，政权和因此社会组织的改变是可能的。从那时起，一切都需要被正当化，包括任何回归传统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必须解释为什么社会和政治转型发生在某些地方而不是其他地方，更普遍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以它们运作的方式运作。

要使社会成为研究对象，它首先需要被看见，并且其密度和复杂性以及社会关系的一般意义需要被理解。法国大革命撕裂了使社会等级制度显得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构，但社会并没有在幕布的裂口后面立即显现出来。它不能，因为社会是想象的产物。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揭示社会交往潜在规则的存在，而本书的目标之一就是追溯 18 世纪后期人们如何构想他们的社会。我将考虑许多来源，其中一些出人意料，例如欧洲社会与北美社会的比较，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的版画中社会关系的呈现，绘画中时尚的描绘，对待普通士兵的规定，使用精算表创建保险公司，以及关于维持国债是否明智的辩论。它们都**关注社会内部的功能以及社会对其中个体的强大影响。**

个人主义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张力深刻地塑造了现代生活，并有许多起源点。在本书中，我将指出其中一些张力，特别是当文化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时。在此过程中，你将遇到一些杰出的个人，他们阐明了这种二元性的关键特征。

其中第一位是格拉斯哥大学法学教授约翰·米勒（John Millar）（1735-1801）。米勒最初像他父亲一样，注定要从事神职，但他转而选择了法律，并将其作为探究人类社会本质的平台。米勒个性活泼，智力广博，他关注到女性地位与不同社会文明水平之间的关联。对于一位法学教授来说，撰写关于比较文明的文章是出人意料的。他以其他方式反复挑战传统观念：他用英语讲课，而他的同事们则坚持使用拉丁语；他即兴演讲，并不断根据学生的反馈修改讲稿；他没有像指定课程那样喋喋不休地讲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编纂的罗马法，而是迅速扩展到更普遍地谈论法律、社会和政府。米勒接受了个人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也提供了反思其社会原因的方法。[9]

下一章中，没有哪位版画家能像米勒那样突出，因为制作革命版画的法国艺术家通常是匿名的。人们对画家了解更多。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

（Marie-Gabrielle Capet）（1761-1818）在此被重点介绍。她体现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并非因为她取得了巨大的声誉，而是因为她出身卑微，却成功地为自己开创了卓越的艺术家生涯。卡佩不知何故来到了巴黎，进入了当时最著名的画家之一阿德莱德·拉比勒-吉亚尔（Adélaïde Labille-Guiard）的工作室。这位年长女性对有才华的年轻女性的指导，是朋友圈如何取代传统家庭关系角色的众多例子之一。肖像画似乎不是一个寻找社会或社会关注点出现的地方，但在 18 世纪，肖像画家旨在描绘的远不止个体的肖像，他们对时尚的关注往往在无意中或有意中概括了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卡佩生动的作品使社会可见，即使没有直接描绘社会本身。10

谈到军队在促进个人前景方面的作用时，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人物，他惊人的权力攀升可能被认为是不同寻常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它掩盖了他所遵循的道路普遍的可及性。他的许多元帅出身远不如他科西嘉小贵族家庭那样显赫。他最终的妹夫兼那不勒斯国王约阿希姆·穆拉（Joachim Murat）是旅店老板的儿子；米歇尔·内伊（Michel Ney）的父亲是箍桶匠；安德烈·马塞纳（André Masséna）是店主的儿子。他们都凭借自己的技能晋升到最高军衔，但在每个级别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轨迹。军队的结构性创新使其更能接受个人主动性，即使是新兵的主动性。这个最有可能为了实现集体目标而压制个人特质的机构，发现了培养个人才能的优点。11

瑞士出生的金融奇才艾蒂安·克拉维埃（Étienne Clavière）（1735-1793）的职业生涯为关于金融的章节提供了核心线索。作为日内瓦布商的儿子，克拉维埃因与 1782 年那里的民主起义有关联而被迫离开家乡。他最终移居巴黎，在那里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并学会了如何利用精算表使人寿保险公司盈利。他与两位未来的法国革命领导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和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克蒂，米拉波伯爵（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的密切关系使他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就涉足政治。布里索在 1792 年任命他为财政部长，当布里索倒台时，克拉维埃也随之倒台。他于 1793 年 12 月在狱中自杀身亡。12

克拉维埃的经历很有启发性，因为它一点也不典型。当时还有许多其他金融投机者，但他们大多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政治。克拉维埃渴望财富，但也希望通过乌托邦实验、废除奴隶制和共和主义的传播来重塑世界。他深信个人潜力的新真理，从他自己开始，他发现通过研究社会——例如通过精算表——个人可以赚钱，甚至可能重组政府。

本书在密切关注个体生命的同时，不断将人们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摆在突出位置。新的社会实践，例如法国展览空间的开放，为有抱负的个人崭露头角开辟了道路，但个人仍然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的塑造和限制。回顾 18 世纪后期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个社会为人们在更大角色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多空间的时代。也许它能让我们以更清新的视角审视当今自我与社会之间持续的摩擦。

第一章

茶与女性的“文明化”

个体主义——强调个体自主性——的起源可追溯到许多方面，但就我所知，从未追溯到茶。自 16 世纪以来，欧洲引入了许多新型刺激物，其中咖啡获得了大部分关注。欧洲第一批咖啡馆出现在 17 世纪中期。很快，顾客们边喝咖啡边阅读报纸，不久之后，公众舆论中便充斥着要求政府问责和个人参与的呼声。咖啡因此为民主铺平了道路。咖啡馆和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男性领域。1

茶则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它主要涉及**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但其影响同样深远。茶在英国的饮用量超过了咖啡，其普及以及对茶具时尚的追捧改变了女性的角色。中上层阶级女性开始主持茶桌，茶桌成为家庭对话的中心。在引入茶之前，仆人会摆放食物；在没有仆人的家庭中，家中的女性通常会提供食物，然后站在一旁，让男士们用餐。茶将所有人带到桌旁，在富裕家庭中，饮茶成为一种仪式，由在场地位最高的女性（例如母亲或长

女）监督茶的准备并亲自冲泡。在当时，“围坐在一张桌旁”被认为是“文明和优雅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而使用银质茶壶、茶匙以及瓷质茶杯和茶渣碗则标志着更高的精致程度。2

18 世纪下半叶，女性地位在关于欧洲文明优越性的著作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新词，在 18 世纪 60 年代以前在英语中鲜有使用，它尤其通过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们而流行起来，他们开始将社会按照从落后到先进的谱系进行排序。女性地位对这些排序至关重要。尽管无法证明茶启动了这些发展，但其中的联系耐人寻味：茶影响了女性的地位，与英格兰相比，茶在苏格兰的存在非同寻常，而苏格兰哲学家而非英国哲学家在比较和分类社会方面做得最多。3

茶，尤其是随之而来的中国瓷器的吸引力，与英国女性有着不可思议的关系。在伦敦，女性光顾甚至拥有瓷器店，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茶和瓷器都从最初的奢侈消费品演变为与家庭生活和女性温暖相关的日常用品。茶和瓷器曾一度暗示着女性的欲望和感性，甚至某些茶具的造型本身也如此，而家庭中的饮茶仪式最终帮助塑造了**母性居家**的理想。4

居家生活也许是规定的常态，但要成为一个有效的范式，它必须吸收茶的准备，特别是茶桌所促进的女性地位变化。女性现在主持茶桌，茶桌的存在鼓励了女性和男性之间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对话，至少在他们就座于桌边时是如此。反过来，对话又促进了读写能力，这一点被 18 世纪礼仪的早期传播者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立即领会。他们的报纸《旁观者》（*The Spectator*）（1711 – 1714）只持续了三年，但它关于从道德到时尚的社会举止的日常建议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都产生了数十年的广泛影响。在 1711 年 3 月 12 日的刊物中，艾迪生将自己比作苏格拉底；如果这位希腊哲学家成功地将哲学从天堂带到人间以造福人类，那么他，艾迪生，则“将哲学从书斋、图书馆、学校和大学中带出，让它存在

于俱乐部和集会、茶桌和咖啡馆中”。简而言之，他将其从学校带到了家庭和大众。5

理查德·柯林斯（Richard Collins），《一家三口品茶图》（A Family of Three at Tea），约 1727 年。布面油画，64.2 × 76.3 厘米。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 Art Resource, NY。

艾迪生（Addison）还声称，这份报纸对女性尤其有用。他希望鼓励一种由茶和期刊助推的家庭生活，并建议“我这些思考，献给所有规规矩矩的家庭，它们每天早上都专门腾出时间喝茶、吃面包和黄油；我衷心建议她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务必准时奉上这份报纸，并将其视为茶具的一部分。”艾迪生知道有些女性的求知欲甚至更强。一个月后，也就是 4 月 12 日，他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士的故事，她拥有一个非凡的藏书室，里面包括牛顿（Newton）的著作和洛克（Locke）关于人类理解的论文。对开本用中国花瓶压着，八开本用茶碟压着。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日式桌子。像艾迪生这样敏锐的观察者，

察觉到茶具在女性所占据空间中的无处不在，或许也理解了茶、瓷器和茶桌如何共同促进女性地位的悄然变化。6

然而，茶、阅读和对话的积极关联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扎根。茶最初因其药用价值而被吹捧，例如净化血液和治疗头痛，但批评者很快就找到了警报的理由；茶来自一个据说柔弱的国家——中国，它会使英国男性变得女性化。根据一位贬低者所说，茶是一种“懒惰的习俗”、“荒谬的开销”；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沉溺于茶的女性是愚蠢的八卦者，对奢侈品有着无止境的嗜好。18 世纪 40 年代，伊丽莎白·海伍德（Eliza Haywood）仍能在她广受欢迎的《女旁观者》（*Female Spectator*）中发表一篇反茶的谩骂文章，尽管她的动机并非完全清楚。据称，一封来自男性读者的信在 1746 年评论道，“过量饮茶，无论对实践者来说多么无害，都是一种放荡，”尤其因为“所有阶层的女性都沉迷其中，妻子现在认为她的茶箱、茶桌及其用具，就像她的结婚戒指一样，是婚姻应得的权利。”海伍德是真的在抱怨茶叶消费的发展，还是讽刺性地描绘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男性观点？无论如何，这些评论表明，当时女性对茶和茶具的热情已经司空见惯。7

伊丽莎白·缪尔（Elizabeth Mure）在她生前未发表的关于苏格兰日常生活的追忆中提到，茶桌在 18 世纪 20 年代出现；“一切都是谈资；宗教、道德、爱情、友谊、礼仪、服饰。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促进我们的文明。话题都很新颖，都很有趣。书店里不像现在这样塞满了小说和杂志。”她坚持认为，18 世纪 40 年代又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男人们一直定期在各种俱乐部聚会，打西洋双陆棋和其他赌钱的游戏，购买烟草，饮酒，也经常进行交易。茶桌把他们带回了家，因为“茶桌很快就引入了私人家庭的晚餐习俗”。茶使男性家庭化，甚至在为女性灌输一种居家模式的同时。8

直到最近，学者们还忽视了茶叶消费的社会影响，更多地关注官方文件，例如茶叶税收记录，而不是关注那些转瞬即逝的日常食品处理姿态。关于茶

叶进口的信息远多于它进入家庭后的意义，然而即使是简单的经济数据也表明了一场品味的革命。18 世纪 30 年代至 50 年代，英国官方茶叶进口量增长了一倍以上，到 18 世纪 60 年代又翻了一番，并持续增长。1700 年，英国人饮用的咖啡量是茶叶的十倍。随着茶叶价格相对于咖啡下降，茶叶迅速取代咖啡成为首选饮品。到 18 世纪 20 年代，英国茶叶进口价值是咖啡的七倍。9

茶叶的消费依赖于进入全球市场，并推动了日益紧密的全球互联，但这并非总是对所有参与者都有利。18 世纪，欧洲人从中国进口茶叶。但当英国人于 19 世纪 30 年代占领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Assam）后，他们开始种植茶叶出口，以打破中国的垄断。英国对茶叶的需求也促使英国在西印度群岛进行殖民，以获取价格实惠的糖（18 世纪茶叶中通常不加牛奶）。英国人均糖消费量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近六磅跃升至 18 世纪 70 年代的二十三磅。为了生产所需的糖，英国人奴役非洲人在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工作。英国将非洲人运往加勒比海地区并奴役的残酷行径在 18 世纪呈指数级增长，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约 11.5 万人增加到 18 世纪 60 年代的 24.5 万人，整个 18 世纪总计近 200 万非洲人。饮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制，直到 18 世纪末才被消费者所忽视。10

如同茶叶一样，瓷器最初也是中国的垄断。18 世纪初，英国每年从中国进口一到二百万件瓷器，到 18 世纪 20 年代，至少三分之一的中产阶级家庭拥有瓷器。到 1740 年，这个数字可能已达到 50%。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VOC）在 1600 年至 1800 年间总共进口了四千三百万件瓷器，包括英国公司在内的其他欧洲公司又进口了三千万件。仅在 1777-78 年这一年，欧洲公司就运进了七百吨瓷器。这些官方贸易数据不包括由“船主代表”（supercargos）和其他水手进行的私人贸易。11

不出所料，对中国瓷器的热情促使欧洲人竭力探寻其精巧和半透明的秘密。在撒克逊的奥古斯都大帝（Augustus the Strong of Saxony）的监督下，

研究成果促成了1710年在德国迈森（Meissen）建立了瓷器厂，几乎立刻就有其他人加入寻找迈森配方的行列。英国制造商在18世纪30年代也紧随其后，但重点放在了更便宜的骨瓷和后来的乳白色陶瓷上，这些产品可以作为中国瓷器廉价但仍然理想的替代品推销给中产阶级。最终的品牌大师是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他利用女王和其他贵族的订单，赋予他的乳白色陶瓷一种社会区分度，使其成为社会效仿的热门商品。他在1767年写给合伙人托马斯·本特利（Thomas Bentley）的信中说："需求……仍在增加——它在几乎整个地球上如此迅速地普及，并且如此普遍地受到喜爱，这真是令人惊叹。——这种普遍的使用和评价，有多少归因于它的引入方式——又有多少归因于它真正的实用性和美观？"12

当他写下这些话时，韦奇伍德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同时代大多数人的想象。他出生在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一个陶工家庭，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九岁时父亲去世，年幼的他就辍学为他大哥工作，十四岁时正式成为大哥的学徒。三年前的一次天花发作使他的右腿剧痛（最终被截肢），使他无法继续从事制陶工作。他转而研究模具，以及不同粘土和矿物质在釉料和着色方面产生的效果。一到二十一岁，他就离开了，开始与那些比他哥哥更接受他实验愿望的人建立一系列合伙关系。到三十岁时，他已经独立创业，并不断引入新的工具、材料和窑炉。他与制造商兼蒸汽动力先驱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成为朋友，后者为他的业务扩张提供了建议。韦奇伍德最终游说议会修建新公路和运河，以加快从远至北卡罗来纳州进口原材料，以及在全国各地和海外运输成品陶器。通过这种方式，韦奇伍德将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从一种由小贩进行的本地贸易，转变为向欧洲、北美甚至中国和印度各地的买家销售的国际业务。13

像韦奇伍德这样的人知道，品味和生活方式正在迅速变化，欧洲在更广阔的贸易和殖民世界中的地位也在变化。为了理解这种令人兴奋的结合，哲

学家和社会评论员们经常转向欧洲海外商业和征服之后出版的旅行记。这些书籍最终激发了一种破坏稳定的文化相对主义，它动摇了传统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确定性，包括长期以来欧洲关于财产、正义和自由的观念。然而，即使旅行书籍让欧洲人感到不安，它们最终却培养了一种新的欧洲优越感。欧洲人渴望中国的茶和瓷器，但当他们审视世界时，他们越来越将自己视为世界的潜在主宰者。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将欧洲女性的地位置于其优越感的核心。

欧洲社会习俗与所发现土地习俗之间的比较，对于文化相对主义和假设的文化优越性都至关重要。正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他的《政府论（下篇）》（*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1689）中所说，“起初，全世界都是美洲。”他指的是所有民族最初都像美洲原住民一样“落后”，他们对财产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没有金钱概念，至少洛克和与他有相同看法的人是这样从他们阅读的旅行记中推断出来的。金钱依赖于建立关于其交换价值的社会惯例。洛克总结道，没有金钱，土地的价值取决于投入的劳动，而过剩的生产是无用的，因为没有交换系统，过剩就会被浪费。金钱使得这种交换得以发生，并随之带来一些人积累越来越多财产的可能性。旅行者对“美洲”的描绘因此使欧洲人能够看到自己习俗的文化相对性，并认识到不平等具有历史和文化根源。14

欧洲人最终从这些由旅行文学引发的思考中得出两个相关的结论：首先，既然全世界最初都像美洲一样，那么社会必然存在一个发展轨迹；其次，欧洲是这个轨迹的终点，因此根据定义是优越的，因为它“更先进”。因此，即使旅行文学侵蚀了欧洲传统，向一些读者暗示这些传统只是社会习俗而非上帝赋予的真理，它也同时催生了欧洲人的优越感。这些结论依赖于“文明”概念的阐述以及对不同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比较。

尽管西方优越论现在与“现代性”相关联，后者被认为是西欧首先实现的状况，但 18 世纪的人们并没有建立这种联系。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现代性”（modernity）一词在英语中可追溯至 1635 年，但数字数据库“18 世纪在线藏品”（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在整个 18 世纪只找到一处英文提及。在 18 世纪引起共鸣的词语是“现代时期”（modern times）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词都起源于 18 世纪下半叶。然而，在此之前，法国作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就已经阐述了女性作为社会标志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政治体制类型与女性地位之间的一种有影响力的关联，首先在他的趣味性伪游记《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1721）中提出，然后在他主要的论著《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1748）第七卷中系统化。在后一部著作中，他阐述了“三种[类型]政府的不同原则对奢侈品法律、奢侈和女性状况的影响”。他发现，在君主制中，宫廷女性享有一种特定的“自由精神”，但她们也带来了虚荣和奢侈的统治。在专制国家中，女性不引入奢侈，因为“她们本身就是奢侈品的对象”，并被当作奴隶对待。相比之下，在共和制中，“女性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受习俗的束缚；奢侈被禁止，随之而来的是腐败和恶习。”这种对“习俗的束缚”（captivée par les moeurs）的提及，孟德斯鸠将其等同于古希腊女性的品德、朴素和贞洁，将被证明至关重要，因为它在 18 世纪被欧洲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他的措辞也捕捉到了新的个人自由（“法律上的自由”）与社会决定论（“习俗的束缚”）之间的张力。15

尽管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主张这些统治形式、女性地位和消费问题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他并未赋予这种关联以历史或文明的轨迹。事实上，法语词“civilisation”直到 18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才变得更为流行。相反，文明路径是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提供的，他们将孟德斯鸠的范畴纳

入了一个渐进的、历史性的阶段序列中，并将重点从奢侈、恶习和腐败转移到将女性作为商业社会的象征，她们体现着**精致、礼仪和对话**。16

苏格兰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法官亨利·霍姆（Henry Home），即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以及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通过阅读游记来发展文明阶段的演化史。这种阶段理论的长期影响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殖民者和帝国建设者，都依赖它来解释世界欠发达地区的“落后”，并为发达世界对其的控制辩护，而“发达”和“未发达”或“欠发达”这些术语本身就是由阶段模型塑造的。由于消除这些关联耗费了如此长的时间（如果它们已被消除），因此很难理解 18 世纪阶段理论是如何不成熟的。其基本要素已经存在，但远未编纂成典；它是一组有时相互冲突的假设，而非一个理论。亚当·斯密关于阶段理论的大部分思想（他被广泛认为是该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都可以在他 18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在格拉斯哥大学（Glasgow University）的法学讲座中找到。这些思想仅通过学生的笔记才得以传播。17

斯密（Smith）的学生之一，约翰·米勒（John Millar），可以为我们指引迷津，因为他在阶段理论最初阐述的时期，对其进行了日益具体的表达。米勒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关于社会阶级差异的观察》（*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in Society*）（1771），明确将孟德斯鸠的静态分类与文明随时间的发展联系起来，并在修订后续版本时，他开始采用**阶段**的术语。米勒现在已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但他的书到 1779 年已出版了第三版，尽管标题更新为《论阶级差异的起源；或，探究社会不同成员间影响力和权威的产生原因》（*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or, An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Give Rise to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in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Society*）。1773 年第二版的法文译本标题《对社会开端的观察》（*Observations sur les commencemen[t]s de la société*）更清晰地

将个体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在他的序言中，米勒阐述了他对社会决定因素的兴趣，认为这是个体生活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键纽带："当我们同时考虑到个体的性格受其教育、职业和特殊环境影响之深时，我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民族的行为。"18

像许多苏格兰同胞知识分子一样，米勒（Millar）旨在通过关注"社会状况中更明显和普遍的进步"来提供"人类的自然史"。在米勒看来，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女性作为社会成员所给予的重视程度"的变化。他通过人类历史的不同"时代"追溯了这些变化。女性在"早期"（他常称之为"粗鲁和野蛮的"）"地位低于男性"，并"通常被当作男性的仆人或奴隶"。女性的地位随着"社会在文明、富裕和精致方面的逐步进步"而改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米勒的书中经常与"进步"（advancement）或"精致"（refinement）同时出现，并在欧洲达到顶峰："现代欧洲国家的法律和习俗，"他认为，"已经将自由的优势提升到任何其他时代或国家都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果关系对他来说显而易见：法律和习俗的进步导致女性地位的改善，而女性地位的提升是礼仪变得精致的明确标志，这意味着更高的文明水平。19

米勒（Millar）在第一版中自信地宣称了"人类社会的自然进程"，但直到 1773 年版之后，他才特别强调了这一进程中的各个阶段，从"粗野时代"的野蛮，到引入畜牧业和农业，再到实用艺术和制造业的进步。在第三版中，他最终使用了"阶段"（stages）一词，但只用了一次："因此，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一个从无知到知识、从粗野到文明的自然进程，其各个阶段通常伴随着独特的法律和习俗。"通过考察这些"独特的法律和习俗"，米勒为阶段理论的骨架增添了血肉。20

米勒（Millar）自称是斯密（Smith）的追随者和学生。米勒坚称："伟大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指明了道路。他是哲学这一分支的培根勋爵（Lord Bacon）。斯密博士（Dr. Smith）则是牛顿（Newton）。"与孟德斯

鸠不同的是，孟德斯鸠主要关注专制主义，因此偏爱与中东和亚洲国家进行比较；而米勒，像斯密一样，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美洲的旅行文学上，因为美洲被认为是走向文明的起点。米勒引用美洲证据的次数比他引用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总和还要多。与斯密一样，米勒特别受到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弗朗索瓦·拉菲托（Joseph-François Lafitau）著作的影响，而孟德斯鸠则对他的同时代人拉菲托毫无兴趣。21

拉菲托（Lafitau）于 1724 年出版的 1100 页著作《美洲野蛮人的习俗与原始时代的习俗比较》（*Moeurs des sauvages amériquains, comparées aux moeurs des premiers temps*），对苏格兰思想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与他们的法国同行形成了对比，后者要么忽视拉菲托，要么像伏尔泰（Voltaire）那样嘲笑他，因为他认为美洲原住民可能起源于古希腊人。尽管拉菲托最初的目标是证明美洲原住民并非无神论者，但他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培养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通过将美洲原住民的习俗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习俗进行比较，他有效地肯定了美洲原住民是人类的一部分，从而肯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欧洲人的相关性。拉菲托在加拿大伊洛魁人（Iroquois）中担任天主教传教士五年，积累了大量关于原住民群体的相对公正的信息。他心中没有进化史的概念，但通过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进行广泛的类比，他暗示美洲原住民属于历史上的早期时代；通过观察他们，苏格兰人可以想象自己在文明发展早期阶段的模样。22

苏格兰哲学家对美洲人的看法并非特别乐观，但在这方面他们也并非异类。拉菲托本人尽管努力使美洲原住民摆脱欧洲人最粗暴的偏见，但仍发现他们充满了缺点：他们报复心强、多疑、忘恩负义、轻浮、懒惰、“享乐时野蛮”以及“对敌人残忍”。米勒（Millar）在做出以下轻松的评估时，并没有背离拉菲托的观点：“从所有野蛮民族身上如此明显的极度麻木不仁来看，他们对那些在文明民族中被认为是构成女性荣誉和尊严的美德，抱持着最粗俗的

观念，这不足为奇。”米勒对“野蛮人”缔结婚姻的漠不关心以及他们对婚前性行为的无所谓感到惊奇。像拉菲托（他在这一点上引用了拉菲托）一样，他发现了这些习俗与古代民族习俗的相似之处，但随后更进一步，将这些习俗与旅行文学中描述的俄罗斯堪察加半岛和亚洲各民族（佩古[缅甸]、暹罗[泰国]、交趾支那[越南]和柬埔寨）的当代部落群体进行了类比。23

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教导，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性差异可以用气候来解释；他认为亚洲的相对弱势与欧洲的强势，亚洲的奴役与欧洲的自由，都源于欧洲地处温带，而亚洲则没有介于极冷和极热之间的地带。孟德斯鸠由于主要关注东方专制，对美洲关注甚少，但他的气候思想却广为流传。然而，米勒（Millar）追随斯密（Smith）淡化了气候的影响，因为气候很难解释北美原住民相对的“野蛮”，因为他们的气候与欧洲相同。米勒反而像斯密一样，强调了**生存方式**：

一个通过狩猎捕鱼或采集地上自然生长的果实来获取食物的野蛮人，不可能在享受方面达到任何显著的精致。他在获取必需品方面会遇到如此多的困难并遭受如此多的艰辛，以至于他没有闲暇或动力去追求生活的奢侈和便利。

原住民的性格与欧洲人没有不同。米勒坚称“人无处不在都是一样的；我们必然得出结论，未受教化的印第安人和文明的欧洲人遵循相同的原则。”不同的是他们的繁荣程度。24

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对文明问题以及北美原住民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表现出相同的关注。苏格兰人可能受到了与他们自己的“野蛮人”——高地人——近距离生活的耳濡目染。苏格兰的知识精英来自低地，但高地就在近旁，1745 年支持“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英国王位斯图亚特王朝的最后一位继承人）的起义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低地作家约翰·平克顿（John Pinkerton）的观点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这在他的

时代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有回响。在他 1789 年出版的早期苏格兰历史中，平克顿毫不掩饰地说：

低地人敏锐、勤奋、明智、正直、自由。高地人愚蠢、懒惰、愚笨、谄媚、奴性。简而言之，前者拥有文明民族的所有特质。后者是彻头彻尾的野蛮人：而且，就像印第安人和黑人一样，将永远如此。因为一个从起源至今一直保持野蛮的民族，将毫无疑问地保持野蛮，直到其种族因混血而消亡。他们野蛮的懒惰阻碍了一切耕作的想法。

米勒（Millar）绝不会走那么远，但他确实曾在 1773 年版的一个脚注中评论道："无可争议的是，一个英国马车夫比苏格兰高地地区的低阶层人士拥有更多的独立精神。"25

无论他和苏格兰其他学者对"阶段"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对"野蛮人"的研究帮助米勒（Millar）确信女性地位至关重要，这是一个他已经从孟德斯鸠（Montesquieu）那里学到的真理，但现在可以将其置于进化的历史背景中。他可能也受到了自己生活决定的影响；他选择担任教授职位是因为它比私人执业有更稳定的收入，而且他想结婚并组建家庭，最终育有十一个存活子女。相比之下，斯密（Smith）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终身未婚，尽管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米勒年轻时曾短暂辅导过凯姆斯的儿子，并成为这位法官兼哲学家的门生。）26

米勒（Millar）对女性地位的兴趣并非源于他自己的旅行。与许多苏格兰人不同，他在苏格兰以外的世界经历很少。对于一个最多只有 150 万人口的地区来说，苏格兰产生了数量惊人的侨民和移民。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英属北美殖民地、加勒比地区、英格兰、爱尔兰和欧洲而背井离乡。还有数千人则为殖民服务或遥远的商业公司工作。相比之下，米勒从未去过巴黎（许多苏格兰知识分子，包括休谟和斯密，都喜欢去那里），只去过伦敦两次；在他漫长的大部分生命中，他都待在格拉斯哥（Glasgow）和他的家人身边。

1771 年，当 36 岁的法学教授米勒（Millar）首次出版《观察》（*Observations*）时，他刚刚开始在全英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法学教授。他被期望详细讲授《查士丁尼法典》（Digest of Justinian，罗马法）、封建法、教会法和苏格兰法。后来他又加入了英格兰法。他学生的课堂笔记显示，他以罗马法作为广泛比较的起点。关于斯密（Smith）的道德情操论以及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与斯密的异同的讨论，都出现在他对查士丁尼法典的讨论中。即使在出版了《观察》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之后，米勒仍继续在他的讲座和书中添加新材料。27

米勒（Millar）在讲堂里保持着友善的氛围，这无疑得益于他选择用英语而非拉丁语授课。他让学生们清楚地知道他对他们的期望，甚至鼓励学生提问或提出异议，这在当时是罕见的非正式教学方式——与许多以枯燥乏味讲座闻名的法学教授截然不同。28

他的两名寄宿生，弗雷德里克·兰姆（Frederick Lamb）和威廉·兰姆（William Lamb）写下的信件，让我们得以一窥他的家庭生活。他们的母亲墨尔本夫人（Lady Melbourne）在 1799-1800 年将 20 岁的威廉（未来的首相）送到米勒那里学习，因为这被认为是为威廉未来的英国律师生涯做好了很好的训练。17 岁的弗雷德里克写信给母亲，描述了另外三名也是学生的寄宿生。考虑到米勒自己孩子的数量，家里的气氛一定很活跃。弗雷德里克向母亲抱怨“这个家里除了学习什么也听不到”，而且“这里所有的女士都被哲学和学问所感染”。他承认“米勒小姐们中有一个很漂亮，但她们都是哲学家”。29

当时苏格兰最受欢迎的女孩行为手册建议：“如果你碰巧学识渊博，务必将其深藏不露，尤其是对男人，他们通常对才华横溢的女性抱有嫉妒和恶意。”显然，对米勒（Millar）而言，女性地位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学术问题。他鼓励自己的女儿学习，即使这意味着在家学习。（女性直到 1878 年才首次被伦敦大学录取，1889 年才被苏格兰大学录取。剑桥大学直到 1948 年才允

许女性获得完整学位。）他经常就自己的著作征求妻子的意见，并经常向全家人朗读段落。威廉·兰姆（William Lamb）没有像他弟弟那样评论女性对知识的渴望，但他确实注意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饮茶仪式的相似之处："我们吃饭时敬酒，喝茶时传递蛋糕，当我们不想再喝时，就把勺子放进杯子里，这与我们在哈特菲尔德（Hatfield）、伊顿（Eton）和剑桥（Cambridge）时的行为完全一样。"30

米勒（Millar）并非唯一关注女性角色的苏格兰人，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苏格兰知识分子如此强调女性作为文明的先驱。法国女性被认为擅长交谈，许多苏格兰知识分子曾去过巴黎并亲身见证了这一点。女性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更容易获得公众关注，尤其作为小说家和画家，这仅仅是因为她们在那里更容易接触到印刷商和展览空间。然而，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的哲学家，都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发展文明叙事。

"进步"与"落后"的独特结合似乎培养了苏格兰人对文明、商业和女性角色的关注。虽然苏格兰人总是回顾英格兰，并在那里找到他们有时渴望的精致水平，但他们也享有比南方邻居一些优势。他们在商业和思想上与欧洲大陆有更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四所大学（英格兰只有两所）在 17 世纪从加尔文主义神学院发展成为 18 世纪以其对自然哲学、医学和法律研究的开放性而闻名的机构。此外，1707 年后与英格兰正式合并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矛盾心理，为苏格兰知识分子开辟了探索自己研究路径的空间。31

苏格兰知识分子也正在经历其经济的快速转型，从一个相对贫困、主要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更具活力的商业社会。1700 年至 1800 年间，居住在人口超过一万的城镇的苏格兰人口比例增加了一倍多，达到 17%；同期，居住在大城镇的英国人口比例仅增加了略多于一半，达到 20%。1728 年至 1771 年（米勒第一版出版的年份）间，苏格兰亚麻产量价值增长了六倍。1755 年至 1771 年间，苏格兰进口量增加了三倍，同期再出口量猛增了五倍

多。糖进口量同期翻了一番，然后在 18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和 90 年代增长更为显著。大约一半的糖被再出口。19 世纪的经济变化将更加剧烈，但 18 世纪的经济变化已足以让知识分子深思。32

没有可比较的茶叶统计数据，因为苏格兰从瑞典、丹麦、荷兰和比利时非法获取了大量茶叶。事实上，茶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之间紧张的关系。走私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更为猖獗，部分原因是它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支持，作为一种对抗英格兰的方式。苏格兰法学家邓肯·福布斯（Duncan Forbes）在 1744 年猛烈抨击这种非法贸易：

当这个国家的商人与在哥德堡（Gottenburg）[原文如此]瑞典公司服务的许多苏格兰人建立联系后，这种“药物”（茶叶）在最底层民众中普遍使用——当糖，作为茶叶不可分割的伴侣，连最贫穷的家庭主妇也能拥有，而以前它曾是稀世珍品……其影响突然而严重地显现出来（消费税收入下降）。

到 1720 年，饮茶在苏格兰已很普遍，到 1750 年更是广泛流行，当时茶叶，有时与白兰地混合，取代了早餐桌上的麦酒，并越来越多地在下午的女士茶会上品尝。“茶桌”（tea table）一词直到 1750 年以后才在英语中普及，当时新的饮茶习俗及其对女性地位的提升开始引起广泛评论。33

即使在最偏远的高地地区，小贩也出售成包的茶叶以及进口的烟草和鼻烟。18 世纪 90 年代登弗里斯郡（Dumfriesshire）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六口人的预算显示，最大开销是穷人的主食燕麦片（是家庭租金的四倍），但茶叶和糖的开销与肥皂、盐和蜡烛的开销相同。茶叶和糖在苏格兰也已成为必需品，尤其是茶叶，它与苏格兰对华贸易的新热情紧密相连。34

一些最重要的广州茶叶贸易商是苏格兰人，但他们不一定是为了英国的商业利益。科林·坎贝尔（Colin Campbell）的经历颇具启发性。18 世纪 20 年代初，被称为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金融危机让他作为投机者背负巨额债务，他不得不逃离伦敦。起初，他于 1723 年加入新成立的奥斯坦德东

印度公司（Ostend East India Company）担任副货船长，到 1731 年公司倒闭时，他已成功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的三位创始董事之一。1732 年，他作为瑞典公司首次中国之行的货船长和国王代表前往中国宫廷，从他的航海日记中我们得知，他仔细研究了茶叶和瓷器的价格和质量差异，并评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支付的价格。他认为他能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获得武夷红茶（Bohea tea），这种茶主要面向普通消费者，但他抱怨英国人拿走了所有优质瓷器。伦敦的英国政府非常担心坎贝尔的活动可能与英国商业利益产生竞争。35

坎贝尔（Campbell）远非个例。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其存在的最初二十年里，大约有五十名英国人加入了瑞典公司，其中大部分是苏格兰人。另一位“船主代表”（supercargo）的通信揭示，他们经常进行大量私人贸易，这些贸易没有在公司或海关的官方记录中登记。1738-39 年，坎贝尔的朋友、来自阿伯丁（Aberdeen）的查尔斯·欧文（Charles Irvine），在中国组装了一批私人货物，包括 273 箱和 48 桶优质茶叶，1424 件从马德拉斯（Madras）运来的印度棉纺织品，223 件中国丝绸制品，以及 70 捆生丝，还有各种其他药物和纪念品。欧文也曾与奥斯坦德公司（Ostend company）有联系，他利用那里的代理人将他的货物销往欧洲大陆。毫无疑问，除了与英国和欧洲大陆批发商的联系外，他还拥有私人的小走私者网络。18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间，瑞典和丹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总量几乎与伦敦东印度公司（London East India Company）相当，据估计，他们 90%的茶叶被再出口，其中无疑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法运往英格兰和苏格兰。难怪福布斯（Forbes）对瑞典公司的进口及其与苏格兰人的联系如此激动不安。36

因此，茶叶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欧洲大陆和更广阔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即使是负责维护茶叶官方垄断的官员也购买走私茶叶。茶叶可以在农村地区由小贩出售，也可以在城镇中由有执照和无执照的零售店出售。

例如，18 世纪末人口不到三千人的集镇克里夫（Crieff），至少有十九家商店出售茶叶。茶叶也促进了女性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穿梭：女性不仅主持超越私人领域的茶桌，她们还为家庭购买茶叶。对 18 世纪 50 年代登弗里斯（Dumfries）集镇一位商人的账簿分析显示，近一半的茶叶顾客是女性。37

女性也通过其他方式进入公共领域：公共音乐会于 18 世纪初形成（爱丁堡音乐协会成立于 1728 年）；识字率不断提高，尽管苏格兰女性的识字率在世纪中叶低于英格兰；戏剧和舞会持续受到欢迎。所有这些都源于苏格兰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茶叶消费在许多方面是这种繁荣最显著的标志，同时也是其推动力。38

尽管女性对话在苏格兰发挥的作用不太可能比英格兰或法国更大，但它似乎特别引起了苏格兰作家的关注，仅仅因为它在苏格兰是一个更近期的现象。大卫·休谟（David Hume）将“美丽的一半”（fair sex）描述为“对话帝国的君主”，而大卫·福代斯（David Fordyce）则在他 1745 年颇具影响力的《论教育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写得不那么轻松：“女性的职责和特殊兴趣在于擅长对话和生活中可爱的得体，并以她们的温柔和说话的精致来取悦和提升男性。”根据福代斯笔下的女性角色克利奥拉（Cleora）的说法，这是她的叔叔兼监护人教给她的观点，他还认为“言语是女性权力最好的工具之一，她们通过它平息激情的风暴，并用魅力将我们粗野的本性转化为更温柔的人性。”39

因此，对话在米勒（Millar）看来，作为文明的标志，占据重要地位就不足为奇了。“早期”的女性“很少被允许与男性进行任何对话或交流”。随着社会能够生产出超过生活必需品的东西，他们变得“品味更精致，生活方式更奢华”。这对女性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女性因其所拥有的宜人品质，以及她们的谈话所带来的乐趣，而受到更普遍的仰慕和追求。她们被鼓励放弃以前被认为与其性格相称的隐居生活，扩大她们的交际圈，出现在混合社交场合和公共娱乐聚会中。她们抛弃了纺锤和纺车，从事其他更符合时尚的职业。随着她们更多地融入公共生活，她们被引导去培养那些适应世俗交往的才能。

然而，并非一切都像看起来那么美好。正如福代斯（Fordyce）的教诲性段落所表明的，女性对话的目的是“取悦和提升”男性；她们的功能仍然由她们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40

因此，女性与文明之间的关联被证明是模糊的。因为文明，就像饮茶一样，现在与女性化联系在一起，女性气质的柔弱（effeminacy）便作为一个潜在的限制因素出现在文明进程中。米勒（Millar）清楚地阐述了这种被感知的威胁：

然而，似乎存在某些界限，一旦超越，财富和富裕所带来的改善就无法继续推进。对享乐的过度追求，往往会削弱和摧毁它试图满足的那些激情；在富裕和奢华的民族中，两性之间的自由交往会导致放荡和堕落的风气，这与社会的良好秩序和更重要的利益不符。

孟德斯鸠（Montesquieu）所说的奢侈、腐败和罪恶仍然像一种威胁一样潜伏着，即使在先进国家也不例外。米勒断言，在“东方国家”，这种放荡导致了一夫多妻制；在西方，则导致了卖淫。最危险的是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在那里“女性地位和修养的进步”已达到顶峰。类似的进步也已传入英格兰和德国，但尚未走得那么远，因为那里的人们关注的是“更必要和有用的技艺”。41

在后来的版本中，米勒（Millar）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但主要是通过参考古罗马历史，从而表明人类历史的周期性观点隐含地与进步叙事相悖。他前面引用的关键段落，在末尾做了修改：

对享乐的过度追求，往往会削弱和摧毁它试图满足的那些激情，并扭曲大自然赋予人类以最有利目的的欲望。因此，极度的奢侈和放荡的自然倾向是贬低女性的地位和尊严，因为它阻止了她们与异性之间关系的任何精致化，并使她们仅仅屈从于动物性享乐的目的。

尽管苏格兰人普遍不喜欢卢梭（Rousseau）完全推测性的社会起源史，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多数人物都支持与卢梭观点非常相似的女性地位观点。女性至少应该接受读写教育，并能够与男性交谈，但她们不应该过于自由。她们的主要作用是教育孩子，并软化男性伴侣更具武力的一面。孟德斯鸠的“习俗的束缚”意味着根深蒂固的约束。42

然而，米勒（Millar）的进化史有一种不容完全否认的逻辑。如果社会的“进步”（米勒最喜欢的词之一）必然影响女性的地位，那么持续的进步可能会导致尚未预见的变化。米勒可能没有在女性问题上抓住这一点，但他确实热切倡导废除奴隶贸易以及各种议会改革。从他著作的第一版（比英国第一个废奴主义协会成立早了十多年）开始，米勒就谴责种植园奴隶制：“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看待奴隶制制度，它都同样显得不便和有害。”他首先从经济论点出发，认为自由劳动效率更高，但他最后提出了关于“良好道德”的论点。奴隶制使被奴役者非人化（“将一个人逐出社会特权，并以耻辱标记其境况”），但它也导致了主人“不人道”。他总结道：“令人遗憾的是，在普遍理解和高度珍视自由的大英帝国领土内，任何形式的奴隶制仍然存在。”43

因此，米勒（Millar）在1792年起草大学支持废除奴隶贸易的请愿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并不令人惊讶。当时，废奴的理由更加明确地建立在道德和权利基础上：

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所公立学府的成员，我们都认为在此关头有必要表达我们对非洲奴隶贸易的不赞同，并谦卑地请求废除它，因为它是

一种无限巨大的现有罪恶；这种罪恶包含了对自然情感、道德规范以及福音所教导的那些构成我们最神圣宗教基础的教义和职责最明显的侵犯。

米勒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为废奴提供宗教论证，但英国的废奴运动，这封请愿书旨在成为其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宗教背景。44

米勒（Millar）的论点现在看来可能显得谨慎温和，但在当时并非如此。许多苏格兰人直接参与奴隶贸易或间接从中受益，很少有苏格兰哲学家在废奴协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早在 1771 年，米勒就已经提到了“人类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奴隶制。也许可以预料，他比他的一些同胞更接受法国大革命。1791 年，他帮助组织了一场公共晚宴，庆祝巴士底狱（Bastille）陷落两周年。45

米勒（Millar）不支持英国境内的革命，但政治温度的升高不可避免地使他的改革主义观点受到质疑。英国当局对苏格兰激进分子，如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进行监视，然后开始逮捕、起诉，并最终将其流放到澳大利亚的罪犯流放地**植物学湾**（Botany Bay）。缪尔是爱丁堡“人民之友协会”（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 in Edinburgh，一个亲法国革命团体）的领导成员，他曾在 18 世纪 80 年代与米勒学习了两年法律，两人一直保持着友谊。

英国因法国大革命而产生的歇斯底里，可以从 1793 年缪尔煽动叛乱审判中，首席法官向陪审团总结证据的方式中窥见一斑：

首先，大英帝国的宪法是自世界创建以来最好的，不可能再改进了……其次，去年冬天这个国家出现了一种煽动叛乱的精神，这让每一个好人都非常不安……然而，缪尔先生却在那时走访了无知的乡村百姓，让他们忘记了工作，并告诉他们，改革对于维护他们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不是他，他们永远不会认为自由有危险。阁下（法官）毫不怀疑，这在他们（陪审团）看来，就像在他看来一样，是煽动叛乱。

米勒曾是缪尔在大学的老师，另一位学生的父亲声称，米勒“确实是一个在年轻人渴望摆脱束缚其狂暴激情的任何枷锁的时代里，最危险的人。”另一个人甚至更进一步：“我宁愿让我的儿子在一个妓院完成教育，也不愿在一个他的政治原则可能被污染的学校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王国公共神学院的老师自称共和主义者。”46

托马斯·缪尔（Thomas Muir）的一位早期传记作者坚称，“每个热爱自由的人都尊敬[米勒]的记忆。”约翰·米勒（John Millar）的名字现在不再以同样的方式回响，而且就他的作品仍然吸引关注而言，它往往是由于他的**欧洲优越论**。虽然毫无疑问，这种优越论在世界上造成了浩劫，但尚不清楚这是否是米勒的本意。他研究了各种法律体系，并考察了旅行文学，以理解其不同习俗的理由，从未忘记“人无处不在都是一样的”，并遵循“相同的原则”。他在奠定社会学基础，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成就，是显著的。米勒没有将这些与茶联系起来，因为他只以最一般的方式讨论食物，根本没有讨论饮料。然而，他确实注意到哪些社会允许女性与男性同桌用餐，并明确评价那些这样做的社会更高。归根结底，米勒最令人瞩目的是他原则的一致性。他对自己的家人（包括女儿）、学生和朋友，以及许多改革事业的关注，都表明他是一个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每天都将自己的原则付诸实践的人。47

第二章

革命意象与社会的揭示

法国的知识分子关注苏格兰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也包括米勒（Millar）的著作。正如许多出版商希望能通过法国官方审查的书籍一样，米勒的《观察》（*Observations*）于 1773 年在阿姆斯特丹以法文出版。一位匿名评论员希望米勒能进一步阐述其研究的政治后果，但他认为这是摆脱“神学精神”（它“用原罪解释所有腐败的来源”）的持续尝试向前迈出的一步。“社会运行的巨大机器”才刚刚开始被理解。1

18 世纪末，社会观念开始浮现，1789 年法国大革命又赋予其新的紧迫性。当时没有人明确表示**社会**这一概念变得更加清晰。但 18 世纪 90 年代法语中对“**社会**”（social）和“**社会**”（society）的引用急剧增加，“**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作为一个术语和潜在学科的出现，以及“**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这一表达的首次使用，都表明作家和政治家之间正在经历概念上的酝酿。其他人则通过艺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贡献。因为社会不仅仅是一

个概念；它是一系列在私人和公共空间中遇到的关系。这些遭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创作的许多版画中突出地呈现出来。作为政治危机时期视觉描绘的本质，版画呼吁观众有意识地关注法国人彼此互动的方式。2

这一时期制作的版画常常描绘社会关系——无论是写实的、纪念性的、滑稽的还是讽刺性的——并通过这样做使这些关系受到质疑。与此同时，革命版画制作者的意图往往模糊不清，因为人们对他们或他们作品的接受情况知之甚少。版画并非凭一己之力使社会变得可见，但它们确实为同时代人提供了一种观察方式，从而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和习俗性社会关系保持距离。视觉化所创造的空间因此促进了思考社会的新方式。3

法国的图像印刷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在增加，但在 1787 年政治危机爆发后急剧扩张。尽管无法精确统计印刷品的产量，但法国国家图书馆（French National Library）现有藏品中的印刷品可视为一个指标：从 18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数量增加了约一半，然后从 18 世纪 70 年代末到 1787-1791 年间，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这种印刷品的突然激增几乎完全归因于与革命决裂相关的图像制作。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六到七千幅与革命事件相关的图像，其中最大的单一收藏是德·温克收藏（De Vinck collection），以收藏家比利时男爵欧仁·德·温克·德·德奥普（Eugène de Vinck de Deux-Orp）（1859-1931）的名字命名，包括 1789-1799 年期间约 5200 幅独特的图像。4

印刷图像的洪流仅仅满足了对各种描绘突然涌现的部分需求。随着审查制度的放松，作家们纷纷投入小册子和报纸的生产。国民议会废除戏剧垄断后，巴黎的剧院数量从 1789 年前的 9 家增加到革命十年间的 50 家；1789 年至 1799 年间，巴黎平均每天有 23 场演出。同样，当议会将两年一度的艺术展览向所有来者开放时，1791 年的沙龙（Salon）作品数量是 1789 年沙龙的两倍，参展商数量是三倍。随着政府的重组，带有新印章和信头的官方信件，

特别是纸币的引入，使得无数新的图像投入流通。可以见到的东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5

尽管审查制度的放宽促成了这种迸发，但图像制作的狂热也反映了意义深层次的危机。传统的君主制和贵族政体是否会让位于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新的政体在形象上和字面上会是什么样子？图像曾支撑着君主制，但一旦闸门打开，它们也可能颠覆君主制。随着君主制让位于共和国，而共和国采取越来越激进的措施，版画反映并解释了这些动荡。报纸和小册子以语言表达了迅速升级的事件所带来的希望和恐惧，而版画则将其压缩、抽象化，并赋予它们一种可能被或可能不被观众有意识地理解的锋芒。因此，版画制作者回应了意义危机，同时也加深了这种危机。视觉化加剧了政治和社会秩序正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变化的感受。通过呈现这些转变，视觉图像表明，支配社会的规则并非固定不变。这种明显的**可变性**激发了知识分子发展**社会科学**。

大量的版画作品证明了政治制度快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所蕴含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震惊和不确定性。一切都必须被描绘出来，以便更全面地理解：涉及的人物（法国大革命数字档案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图像是肖像画）、正在发生的事件、地点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习俗。这些版画不仅仅是描述人物或事件；它们帮助确立了人物和事件的重要性。6

肖像画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流派，为视觉化如何塑造政治理解进而影响政治结果提供了绝佳的例证。正如艺术史学家艾米·弗罗因德（Amy Freund）所展示的，1789 年夏天匆忙付印的代表肖像集，隐含却有力地论证了代表们与国王一样代表着国家。他们通过将代表们与国王框入相同的画框中，从而实现了视觉上的同等地位。国王曾规定了三级会议所有代表的服装。只有贵族才能戴羽毛帽，穿丝绸马裤和夹克，佩戴金色饰边。第三等级的代表则被命令穿无饰边的黑色斗篷、黑色夹克、羊毛马裤和朴素的帽子。王室和宫廷

希望维持社会差异的视觉标志；而代表肖像的版画集则通过将他们的头像置于相同的画框中来强调**相似性**。第三等级代表米歇尔·热拉尔（Michel Gérard），一位自称来自布列塔尼（Brittany）的农民，为他的肖像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自我呈现方式；与许多第三等级代表不同，他在大衣敞开处没有戴假发或领巾。他自然的发型和朴素的穿着，象征着非正式和乡村美德，与贵族式的矫饰截然相反。通过向公众提供这些系列代表肖像，其中既有微妙的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异，雕刻师和版画商人帮助确立了代表们的集体重要性，以及他们在 1789 年 5 月开始的三级会议上代表国家（而不仅仅是各自的等级：教士、贵族、第三等级）的主张。7

通过将第三等级的代表提升到与国王和贵族视觉上的同等地位，这些版画隐含地挑战了君主政体的稳定性，并——虽然不太明确——奠定了新政权的可能基础，在这个新政权中，代表们将为国家争取权力。这些版画并没有直接促使第三等级的代表要求国家主权（而这正是代表们后来所做的），但这些版画确实通过让所有观看者切实感受到代表国家与国王之间的等同关系，从而为之铺平了道路。鉴于这些特定版画的出版商尼古拉-弗朗索瓦·勒瓦谢（Nicolas-François Levachez）聘请了七位艺术家绘制草图，以及十七位雕刻师制作版画，显然他以及像他一样的人，都预见到这类版画将有一个可观的市场。大多数人都感觉到有重大事情正在发生，他们抓住任何可能澄清局势的东西。即使是肖像画，也能促使观众重新思考政治和社会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与他们所处的秩序产生更大的距离。8

尽管由于许多版画没有注明日期，或者仅由法国国家图书馆（French National Library）非常笼统地标注日期（例如，1789-1792 年，1793-1799 年，1798-1815 年），因此无法非常自信地谈论版画制作的时间顺序，但法国大革命数字档案（French Revolution Digital Archive）提供了似乎可信的证据：与

革命事件相关的版画在早期（1789-1791 年）数量最多，随后有所下降，但在该十年剩余时间里数量仍然可观。9

路易十六肖像。蚀刻版画，23.5 × 18 厘米，A. 塞尔让 (A. Sergent) 雕刻，巴黎，1789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米歇尔·热拉尔（Michel Gérard）肖像，布列塔尼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代表。飞尘腐蚀版画（Aquatint），23.5 × 18 厘米，安托万·路易·弗朗索瓦·塞尔让（Antoine Louis François Sergent）雕刻，C. 勒菲弗尔（C. Lefebvre）绘，巴黎，1789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尽管法国国家图书馆（French National Library）藏品中许多版画是彩色的（因为收藏家偏爱它们），但它们通常是手工上色而非通过印刷工艺完成，而且当时出版的大部分版画无疑是黑白的。1793-94 年间，作为政府紧急执行机构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于 1794 年初决定委托制作宣传版画时，它订购了每幅 900 到 1000 份，其中三分之二是黑白的，只有三分之一是彩色的。彩色版画的价格大约是黑白版画的两倍。价格根据制作版画所需的工作量而异，但总的来说，小贩们以 5 到 10 苏（sous）的价格购买最便宜的版画，然后以 10 到 15 苏的价格转售，而当时下层阶级的主食面包每磅花费 1 到 3 苏，普通工人日工资从 20 到 50 苏不等（20 苏=1 里弗）。

尽管许多人偶尔能负担得起购买，但商店外和沿河码头的版画展示仍然具有持久的吸引力。10

关于人们观看这些版画时的感受，证据很难找到，但有两位值得注意的当代评论员，一位来自政治右翼，一位来自中左翼。两人都提到了具体的图像。第一位是记者雅克-马里·布瓦耶-布伦（Jacques-Marie Boyer-Brun），人称**尼姆的布瓦耶**（Boyer de Nîmes），他从一个哀叹反贵族、反教士和反君主制图像腐蚀作用的角度，撰写了关于这些图像最初爆炸性增长的文章。第二位是作家兼代表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他关注的是 1793-94 年激进紧急政权（通常被称为“**恐怖统治**”）结束后几年创作的图像。11

布瓦耶（Boyer）是来自尼姆（Nîmes）的狂热天主教保皇党人，尼姆是法国南部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是加尔文主义温床的城市，即使在加尔文主义被官方禁止时也是如此。1787 年后，当加尔文主义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宽容时，尼姆富裕的新教精英看到了他们的机会。该地区选入三级会议的代表中，超过一半是新教徒。在 1790 年 6 月的地区选举中，武装天主教徒威胁在尼姆投票的人时，紧张局势达到了顶点。作为回应，新教徒组织起来，三百多人死于街头斗争，其中大部分是天主教徒。[1]布瓦耶于 1786 年在尼姆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最初对革命持有利态度。1790 年 3 月，他接受了尼姆副检察长的选举，但在回应 6 月杀戮事件出版反革命和反新教著作后，他逃到巴黎，在那里继续担任报刊编辑，并收集漫画，这些漫画成为他 1792 年关于漫画的书的素材来源。他的宗教信仰增强了他对图像力量的理解，这无疑也源于他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

布瓦耶（Boyer）的《法国反叛漫画史》（*History of the Caricatures of the Revolt of the French*）最初宣布从 1792 年 4 月 1 日开始每周连载。每期应该包括两幅用墨色（灰褐色）洗色法的漫画蚀刻画，以及三十二页的分析。

公布的订阅价格为每年 50 里弗（共四卷），这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实际上，布瓦耶最终在 1792 年 4 月至 8 月期间出版了 51 幅漫画复制品（不包括他最终两卷的扉页）和六百页文字，每幅漫画的分析长度差异很大。订阅者需要自行装订成册，并为此目的寄送了扉页，但这些卷也可以在布瓦耶的报纸《人民日报》（*Journal du peuple*）办公室单独购买。12

尽管他几乎没有为自己在尼姆的报刊委托绘制插图，但布瓦耶（Boyer）逐渐将版画视为“记录民意程度的温度计”，因此，“那些知道如何掌握其变化的人，也知道如何掌握民意。”他的书的序言明确了其目的：“作者将在本书第一部分证明，为了推翻祭坛和王座，各种手段都已被使用，并将表明漫画是其中运用技巧、毅力和成功程度最高的手段之一，以误导和煽动民众。”布瓦耶毫不犹豫地展示了贬低国王和王室的漫画，但始终旨在谴责他所认为的革命者煽动内战和推翻君主制的目标。13

“他们只为我们好。”

*布瓦耶（Boyer）复制的匿名版画“Ils ne vouloient que notre bien”（他们只为我们好），1789-90 年，**墨褐色蚀刻版画**，尺寸 14.5 × 9 厘米（原手绘上色蚀刻版画尺寸为 22 × 33 厘米）。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布瓦耶（Boyer）对版画的心理影响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分析了一幅匿名蚀刻画，标题带讽刺意味：“他们只为我们好”（“They only wanted what was good for us”），画中前景是一个跪着的农民，一个肥胖的主教正在为他施福，以换取两袋钱。第一个农民的右边是另一个更可怜的农民，他被允许亲吻他的贵族主人的手（这位贵族，像主教一样，可以通过他独特的帽子辨认出来）。这个农民没有看到主人正拿着一个铁项圈和铁链，准备让他继续

受奴役。布瓦耶声称，背景中的第三个人物是一个治安官，他正在向一位客户索取钱财，以换取几行文字，而画的总体目的是揭示上层阶级的恶意以及农民的善良和愚蠢。布瓦耶对前两幕的解释是正确的，但背景中的人物看起来更像一个犹太放债人的漫画，而不是法官。他驼背，鹰钩鼻，戴着一顶类似于土耳其毡帽的帽子，这些都是犹太放债人漫画中常见的特征。然而，犹太人权利最著名的捍卫者之一，天主教神父亨利·格雷瓜尔（Henri Grégoire），在他的 1788 年获奖作品《论犹太人的物质、道德和政治再生》（“Essay on the Phys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Regeneration of the Jews”）中，仍旧一页又一页地论述了犹太人放高利贷的罪恶。布瓦耶本人指责法国南部的犹太人与新教徒勾结，鼓励起义，并反对给予犹太人与“穆罕默德教徒、偶像崇拜者、演员和刽子手”一同担任公职的权利。（犹太人于 1791 年 9 月获得政治权利，非天主教徒、演员和刽子手则于 1789 年 12 月获得。）然而，布瓦耶没有看到——或者说不想承认——这幅画中的犹太放债人。14

然而，画中人物是犹太放债人这一事实，并不影响布瓦耶（Boyer）的主要观点。前景中两个农民卑躬屈膝的姿态所描绘的屈辱，与上位者特征的明显粗俗形成了鲜明对比。布瓦耶想象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在看到这幅版画时会“感到羞辱”：“就像这里被嘲笑的那些白痴一样，我曾对神职人员、贵族和高等法院抱有尊敬和信任，但他们可能并不像我所相信的那样值得尊敬，因为有人竟然敢于用一种如果他们不配得到就不会被采用的方式来谴责他们。”15

尽管布瓦耶（Boyer）关于平民所感受到的羞辱的假设可能存在争议，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像这样的蚀刻画是一个视觉传播过程，其中包含了艺术家、雕刻师和出版商的意图（不一定相同）以及观看者的反应。他复制这幅版画又给传播过程增加了一层模糊性，因为他的意图很可能与原始版画制作者的意图不同。布瓦耶希望展示版画如何被用来激怒下层观众，让

他们看到自己从属地位的不公正，而另一位观众可能只是将这幅图像解读为批评这些人的盲目顺从。然而，布瓦耶表明，当时一些观察者认识到充斥公共空间的印刷图像的力量。他最看重的是图像在观看者心中引发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如何促使新态度的发展。看到下层阶级的屈辱，大概会在观众心中激起相反的反应。他们对自己以前对那些现在被嘲讽的人的顺从产生一种厌恶感。上层阶级的粗俗强化了图像的社会归因。如果上层阶级——神职人员和贵族——粗俗不堪，那么下层阶级为何还要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呢?

布瓦耶（Boyer）厌恶平等观念，这正是这幅以及其他类似图像让他不安的原因。他认为新教徒与詹森派（Jansenists，持异议的天主教徒）、重农主义者（Physiocrats，自由贸易经济学家）和共济会（Freemasons）联手煽动法国人反叛，这是“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所设定的不服从的平等原则的必然结果”（原文强调）。自由实际上意味着反教士主义，而平等被大肆宣扬，“是为了暗示国王也只是一个普通人”。权利宣言中承诺的“崇高”平等最终变成了“前后矛盾的幻觉体系的平等，荒谬和怪诞的平等，不虔诚、叛教和反抗当权者的平等”。他抱怨说，这样的漫画在塞纳河（Seine）的所有码头以及几乎每个广场和路口都能看到，它们以书面文字无法做到的方式直接与观众对话。通过操纵情感，这些版画迫使观众审视自己以及自己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位置。通过这种方式，版画不仅仅是呈现事件或塑造人物；它们鼓励观众进行社会思考，批判现状，渴望社会公平，甚至更普遍地反思社会关系的本质。布瓦耶最终将为他的观点付出沉重代价。1794 年 5 月，巴黎的革命法庭以他煽动尼姆（Nîmes）爱国者暴力为由，判处他死刑。16

尽管布瓦耶（Boyer）对版画的关注比其他右翼记者更为持久，但他并非唯一一个抱怨其影响力的人。1790 年末，刻意出格的保皇党刊物《使徒行传》（*Actes des apôtres*）刊载了一则短篇故事，讲述一位亲革命的国民警卫队员为路人解读漫画。这位“漫画爱国教授”指着画中一位正在哺乳狼的女人，

而她的儿子则在一旁受苦。国民警卫队员解释说，狼代表贵族的凶残。他坚持认为，画中用英文标注的“政治情感”（political affection）一定是指**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Polignac），她是王后最臭名昭著的宠臣之一。听众们哄堂大笑，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文章总结道：“在这个层面上，革命没有让人民付出任何代价，但他们最终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然而，画中的狼无疑是一只狐狸，因为这幅版画很可能就是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1784 年同名蚀刻画。它讽刺了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卡文迪什（Georgiana Cavendish, Duchess of Devonshire）对查尔斯·福克斯（Charles Fox，因此是狐狸）和辉格党（Whigs）的支持。这个轶事再次凸显了视觉传播固有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版画可能被重新利用。布瓦耶对反君主制图像的沮丧，在 1791 年 6 月也被反革命的《宫廷与城市报》（*Journ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所认同。它痛斥“图像商人，尤其是巴黎皇家宫殿（Palais-Royal）的图像商人，在每个路人眼前散布的那些残暴的漫画。”17

反革命派并非唯一认识到在许多公共场所出现的版画吸引力的人。1789 年秋天，《欧洲革命杂志》（*Journal des révolutions de l'Europe*）报道说，城里“所有插画师那里，你都能看到无限逗乐大众并维持他们对贵族仇恨的版画。”这位匿名作者接着描述了一对漫画，尽管标题有所不同，但很容易辨认。其中一幅是《我知道轮到我们了》（“I Knew We'd Have Our Turn”），这是众多描绘社会秩序颠倒的版画之一，画中一个农民坐在一个贵族身上，贵族则紧抓着一个神职人员。作者不认为这些图像危险或心怀恶意，但他显然认为它们主要是为文盲设计的，这些人可以通过观看它们而受到情感上的触动。这类图像旨在“触动那些与其智力对话不如触动其眼睛更能激起想象力的那部分公众。”18

亲革命的媒体也报道了图像引发的冲突，无论是在印刷店还是在大街上。《巴黎革命报》（*Révolutions de Paris*），一份每期都附有版画的周刊，在

其 1791 年 7 月 9 日至 16 日的版次中抱怨一位版画销售商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个日期意义重大，因为国王和他的家人在逃跑失败后刚刚被强制带回巴黎。这位商人向地方当局举报了一个人，因为那个人走进他的店里，撕毁了两张他觉得冒犯的版画。但这位商人很快就因出售一张“煽动性版画”而被捕。该周刊的编辑声称，一张嘲讽暹罗宗教的白象版画竟被认为是煽动性的或不尊重当局的，对此感到惊讶。然而，他承认这张版画是基于几个月前《巴黎革命报》上刊登的一张版画，那张版画旨在讽刺国王、巴黎市长和拉法耶特（Lafayette）作为国民警卫队队长的角色。版画可以捕捉和浓缩政治对立双方的情感，因此它们本身也可能成为愤怒的对象。在 1792 年 5 月 30 日的《法兰西信使报》（*Courrier français*）中，指出“关于英国可耻的人肉贸易（奴隶贸易）的漫画贴满了每条街道，但它们刚被贴上就被从人们的视线中移走了。”19

除了布瓦耶（Boyer）之外，另一位对革命图像进行持续评论的人是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一位中立的共和党人，他在 18 世纪 90 年代后期表达了自己对流行版画的矛盾心理。它们可以通过提醒观众恐怖统治（1793-94 年）的恐怖或批评当代时尚中更离奇的版本来发挥宝贵的作用。然而，它们也可能为淫秽书籍作插图，或者仅仅通过对时下风俗的描绘来取悦路人。像布瓦耶一样，梅西耶对版画的关注不同寻常，并且像他的政治对立面一样，他的党派观点只增不减地提升了他对这种描绘力量的欣赏。

梅西耶（Mercier）在 1792 年至 1797 年间担任代表，并于 1793-94 年期间在狱中度过了超过一年，因为他支持吉伦特派（Girondins），即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及其在国民公会中更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同僚的温和共和党反对者。1794 年 7 月罗伯斯庇尔及其亲信的垮台标志着恐怖统治的结束。政治参与让梅西耶亲身体验了不断变化的局

势，他带着剧作家、小说家和巴黎生活观察家的既定声誉投身于这项事业。他 1781 年的《巴黎画卷》（*Tableau de Paris*）出版时并不适合所有人，尤其是一位评论家抱怨说“这是一本在街头构思、在贫民窟写就的书”。在他的书中，梅西耶已经提请人们注意沿码头和林荫大道大量出现的淫秽版画。20

除了对吉伦特派（Girondins）的辩护之外，梅西耶（Mercier）作为立法者并未留下太多显著的印记。像国民公会几乎所有代表一样，他同意路易十六（Louis XVI）有罪，但他投票反对死刑，理由是这位前国王作为一种人质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他的存在将阻止任何其他篡位者登上王位。玛丽-让娜·罗兰（Marie-Jeanne Roland）在 1793 年作为吉伦特派被处决前不久这样评价梅西耶：“好心的梅西耶，平易近人，在社交场合和蔼可亲，比文人通常更胜一筹，在[国民]公会中却只是个零。”21

当在五百人院（Council of Five Hundred）担任代表时，梅西耶（Mercier）在 1796 年 10 月因反对豁免艺术家营业执照而引起关注，他认为艺术家绝不能将自己与科学家、作家或诗人相提并论。随后，他自己也成了漫画攻击的对象。例如，在《M……r [梅西耶]，无与伦比的驴子》（“M . . . r [Mercier], An Ass Like No Other”）中，梅西耶的头像出现在一头打扮成醋制造商的驴身上，桶边写着“醋”。这头驴撞倒了一个古代半身像，扬言要毁坏拉斐尔（Raphael）的画作，并践踏笛卡尔（Descartes）和拉辛（Racine）的作品，显示出他对严肃艺术的蔑视。然而总的来说，梅西耶显然更喜欢写作而非政治，在革命的十年间，他继续创作戏剧和诗歌。他还抽空为各种期刊撰写文章，甚至参与它们的制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似乎患上了一种出现在他 1801 年新词词典中的病症：“涂写狂”（Scribomanie）——“对写作的热情。它有时是一种疾病，但至少它能让患病者快乐。”22

在 1799 年出版的《新巴黎》（*Le Nouveau Paris*）中，梅西耶（Mercier）重访了经历数年革命后的巴黎，他继续抱怨那些“同样令人反感地伤风败俗和

品味低劣”的淫秽书籍及其插图，但他现在将其归咎于革命后的状况：伪造者极力鼓吹无限的新闻自由、离婚制度、暴食、舞蹈以及每天去剧院。（这话出自一位剧作家！）尽管如此，他承认版画《革命委员会内部》（*Inside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能够让观者重温 1793-94 年恐怖与暴力时期“在那些波吕斐摩斯（Polyphemus，希腊神话中野蛮食人巨人）的巢穴中策划的阴谋”的恐怖，当时梅西耶本人正身陷囹圄，面临处决的威胁。23

《一头与众不同的驴子》（An Ass Like No Other）。匿名雕刻蚀刻版画，24 × 27 厘米，巴黎，1798 年。画中文字写道：“我何须理会一切艺术的伟大作品，只要我能碾压一切，抬高自己，而且不缺[药用]蓟。哦，有品味的人们啊，认出这头畜生！”图片放大后会看到驴子后方排出的粪便。蓟（Thistle）的合剂形式曾用于治疗痔疮。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像布瓦耶（Boyer）一样，梅西耶（Mercier）也对一幅描绘某人被当地革命委员会指控的场景进行了心理层面的解读，不过他没有重现那幅插画：

谁看到这位脸色苍白的**主席**不感到不寒而栗？你能听到那位戴着红帽子、肘部撑在桌上、正在宿醉早晨饮酒的**秘书**发出沙哑的鼾声。看到这些标签上写明与外国有可疑关系的罪证的**瓶子**；还有那个不幸的**被告**所感受到的恐惧，他低声重复着，“匈牙利葡萄酒”（*Vin de Hongrie*，奥地利帝国当时正与法国交战）。

《革命委员会内部：最后一幕》（Inside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Last Scene）。蚀刻版画，43 × 59.5 厘米，布莱（Boulet）刻，巴黎，1797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梅西耶（Mercier）引用的标题是查尔斯-皮埃尔·迪康塞尔（Charles-Pierre Ducancel）的剧作，该剧于 1795 年 4 月在巴黎首次演出。梅西耶可能想到的是 1797 年出版的一幅蚀刻画，作为该剧最后一幕的插图。这幅版画展现了梅西耶所描述的舞台场景，只是梅西耶误解了被指控的人物，在剧中是妻子，而非丈夫。24

梅西耶（Mercier）注意到版画的大量涌现，但他并不完全确定该如何看待它们。他赞扬它们捕捉近期恐怖事件的力量，并在他关于“批判性版画”的章节中，赞扬了卡尔·韦尔内（Carle Vernet）的努力，后者讽刺了**不可思议者**（*incroyables*）和**奇妙女性**（*merveilleuses*），这些年轻男女热衷于荒诞不经的服装。然而，他仍然忍不住贬低漫画风潮。他哀叹许可证制度如何摧毁了政治媒体的公信力，并使期刊出版物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无法跟上快速变化的事件。“漫画似乎想要取代它们[期刊]，并增添无限制的新闻自由。”他写道，“路人在版画销售商前挤作一团，观看**不可思议者**、**奇妙女性**、鱼贩、**食利者**（*rentier*，靠投资为生的人）、**当日的愚蠢**（*folie du jour*）、无政府状态、假发的危险。”这些版画只不过是“对我们的荒谬、愚蠢、怪癖、恶习的质朴描绘”，它们“只会引起反复无常的人们的一时笑意，他们通过衡量自己的服装选择来审视自己。”25

尽管梅西耶（Mercier）鄙视这种做法——不断地比较外表——但他仍然发现了视觉图像，特别是时尚描绘的一些重要之处：这是一种人们在镜子中审视自己社会的方式，从而理解他们正在变成什么，甚至变成其他什么。他接着说：“谁会相信呢？**不可思议者**（*Incroyables*）的版画传播了‘狗耳朵’[指脸颊两侧的两缕长卷发]这种发型：这就是无能的报纸，共和主义的**捣乱者**

（*frondeurs*），如何制造出许多共和党人。”梅西耶此话带有讽刺意味，然而在他标志性的逆转之一中，他随后赞扬了许多描绘法国将军的版画，这些将军“将整个欧洲从国王们为人民准备的可怕的压迫和奴役体系中拯救出来。”他还愉快地报道说，如果人们愿意，可以购买“肥胖的路易和他的女儿”的肖像，或者只是嘲笑它们。26

梅西耶（Mercier）担忧版画的影响，察觉到 1794 年后对社会身份日益增长的关注，并清楚地理解到社会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体系已经动摇到了根基，”他肯定道，但他对取代它的东西并不十分乐观：“我们看到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都出现了**新贵**，随之而来的是**金钱和财富**。”梅西耶使用形容词“社会”（“社会体系”、“社会肌体”、“社会利益”和“社会机制”都出现了）反映了卢梭（Rousseau），并在较小程度上孔多塞（Condorcet）对他的影响。梅西耶曾协助组织出版卢梭的全集，该全集于 1788 年至 1793 年间出版，并于 1791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著作《作为革命作者之一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Revolution*）。他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撰写孔多塞的哲学观点，但当他们都担任国民公会代表并在与吉伦特派（Girondins）密切相关的《每月纪事》（*Chronique du mois*）杂志上合作时，他了解到自己与孔多塞在许多政治观点上是一致的。《纪事》汇集了孔多塞、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和艾蒂安·克拉维埃（Étienne Clavière）等自视为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主要政治家。他们就时事撰写长篇文章——这份月刊通常超过一百页。每期开头都有一位领导人的版画。孔多塞出现在第一期，梅西耶出现在第三期。梅西耶在 1793 年为孔多塞和吉伦特派辩护，因反对逮捕他们而入狱，并在多年后继续颂扬孔多塞的记忆。27

1795 年，梅西耶（Mercier）与其他孔多塞（Condorcet）的追随者一起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部成员，并被分到“**道德**”小组。他的朋友皮埃尔·多努（Pierre Daunou）在“**社会科学**”小组任职；阿贝·埃马纽埃尔·西耶斯（Abbé Emmanuel Sieyès）则被任命到“**政治经济学**”小组。然而，梅西耶对分析人类或其社会的科学方法持怀疑态度。他明白“社会机制”在 18 世纪或多或少仍是“一个秘密”，但他不确定这个秘密是否应该被揭开，如果揭开它会导致“那些想要用身体感官解释一切、想要将一切简化为纯粹物理操作的有罪哲学家”的“统治”。梅西耶担忧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并且不希望参与其中。然而与此同时，作为社会生活的密切观察者，他发现自己在使用**社会系统**和**社会机制**的语言，这种语言的出现伴随着并部分是对社会差异日益视觉化的反应。28

梅西耶（Mercier）没有看到，但当时也没人看到的是，视觉图像如何帮助使社会秩序这一概念本身变得更易理解。例如，考虑梅西耶引用的七幅“天真描绘”荒谬行为的版画。其中四幅是由已知艺术家绘制或基于其画作：《不可思议者》（*Les Incroyables*）、《奇妙女性》（*Les Mérveilleuses*）和《假发的危险》（*The Danger of Wigs*）出自韦尔内（Vernet）之手，而《当日的愚蠢》（*The Folly of the Day*）则出自路易-利奥波德·布瓦利（Louis-Léopold Boilly）。乍一看，它们可能更像是时尚插画，尽管其讽刺意图显而易见。正如版画《奇妙女性》（*Les Mérveilleuses*）所展示的，男性和女性都试图，尽管荒谬可笑，追随最新的时尚；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女性之间力求显得最时髦的竞争，这种野心在 1794 年之后经常受到谴责。《当日的愚蠢》（*The Folly of the Day*），例如，指的是 1795 年上演的一部同名喜剧，它嘲讽一位妻子一心想在音乐会上胜过所有其他人。画中《奇妙女性》（*Les Mérveilleuses*）中的两位女性显得荒谬，因为她们对时尚的渴望与品味或举

止格格不入。她们似乎在互相炫耀脚踝，也许是为了展示她们的拖鞋，因为新风格的目的之一就是露出脚和鞋子。29

《奇女子》（Les Mérveilleuses）。点刻版画，32 × 36 厘米，路易·达尔西（Louis Darcis）刻，卡尔·韦尔内（Carle Vernet）绘，巴黎，1797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然而，即使是这些以追求时尚为重点的版画，也承载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从法国大革命初期，服装就被政治化了：帽徽的颜色代表政治立场，黑色代表保皇党，红、白、蓝代表革命者。1792 年 9 月共和国成立后，

一些政治家将强调服装朴素推向了新的极端，他们佩戴与激进共和主义相关的红色软帽，或模仿下层阶级的服装。1789 年，代表热拉尔（Gérard）坚持留自然发型和穿着朴素是一种例外，但在 1793-94 年间，这却成了常态，尽管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拒绝随大流，仍戴着扑粉假发和刺绣马甲。通过对时尚的实验，甚至夸张化，**奇妙女性**（*merveilleuses*）和**不可思议者**（*incroyables*）在自己与 1794 年 7 月垮台的罗伯斯庇尔政权之间划清了界限。对戏剧《当日的愚蠢》（*Folly of the Day*）传达的信息感到不满的**不可思议者**们，会前往观看演出，并与支持者们大打出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时尚绝非与政治无关。30

梅西耶（Mercier）特别提及的其他版画则利用社会暗示来传达露骨的政治信息。他提到了关于鱼贩和**食利者**（*rentier*）的版画，这些在约瑟夫-劳伦特·朱利安（Joseph-Laurent Julien）1797 年的版画《可怜的破产食利者——要炸的鱼，要炸》（*Poor Ruined Rentier—Fish to Fry, to Fry*）中可以一同找到。这位可怜的破产债券持有人被迫接受一位卑微的鱼贩的施舍，因为政府在 1797 年废除了三分之二的国债。他的口袋里是他在 1793 年设立的**公共债务大账簿**（Great Book of the Public Debt）上的登记收据，这张凭证现在的价值只剩下原始的三分之一。梅西耶经常提及**食利者**的悲惨命运，他们投资了国家债券，却发现共和国甚至无法支付到期利息。作为一个形象，这位债券持有人代表了梅西耶所担忧的那种腐蚀性的社会变革。债券持有人的上流社会身份，或者至少是自称上流社会，通过他的假发、手腕和脖子上的褶边、佩剑和带扣的鞋子来体现。（佩剑是旧制度下贵族的特权。）但他的外套肘部已经磨损，极度的瘦弱暗示着他窘迫的处境。相比之下，下层阶级的鱼贩妇人则体态丰腴，戴着耳环、项链和拖鞋，而不是常见的木屐。社会身份已经颠倒过来。

《可怜的破产食利者——有鱼要炸，快炸吧》（Poor Ruined Rentier—Fish to Fry, to Fry）。点刻版画，27 × 32.5 厘米，约瑟夫-洛朗·朱利安（Joseph-Laurent Julien）刻，巴黎，1797 年。卢浮宫博物馆，平面艺术部，5816 LR / 正面 © 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大皇宫 / Art Resource, NY。

梅西耶（Mercier）提及的版画中，最具政治色彩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很可能就是西蒙·珀蒂（Simon Petit）的蚀刻画《无政府主义者：我愚弄他们俩》（*The Anarchist: I Fool Both of Them*）。这幅画描绘了一个两面派的人，他的一面在迎合下层阶级女性，另一面则在迎合中产阶级

青年男性。画中左侧的女性衣着很像《可怜的破产食利者》（*Poor Ruined Rentier*）中的鱼贩妇人，但没有佩戴首饰。她正在被一个肤色黝黑、黑发、留着胡须的男人搭讪，这些特征在 1794 年之后描绘罗伯斯庇尔支持者的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版画中很常见。他的下层阶级身份还通过他的短夹克、长裤和脚上的木屐来体现。他是一个**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一个不穿上层阶级马裤的人。在 18 世纪 90 年代后期，将罗伯斯庇尔的追随者斥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少见。每当梅西耶使用这个词时，他指的是那些利用民众压力将民主变成社会瓦解的雅各宾派：“他们想把我们变成全新的人，结果却只把我们变成了近乎野蛮人的东西。”对无政府主义者右侧面孔近乎**种族化**的描绘与梅西耶提及“野蛮人”的说法产生了共鸣。黝黑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和面部毛发都暗示着劣等之人，尽管随着胡须与士兵联系起来，它们的声誉有所提升。31

那个转向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的脸，肤色更亮、更光滑，头发颜色较浅，鼻子更精致。他穿着一件时髦的燕尾服、齐膝短裤或紧身裤，配以袜子和拖鞋，或是罗马式系带靴（buskin）的变体（只有特写镜头才能看出系带）。他正在央求的年轻人衣着相似，但他戴着帽子和踝靴，蓄着从“不可思议者”（*incroyable*）时尚“狗耳朵”发展而来的鬓角。因此，这个年轻人比面对他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时尚。尖头踝靴在 1797 年开始流行，据当时一本主要的时尚杂志称，1798 年末它们仍然流行。这个年轻人拿着一根精致的文明杖，与那个面向平民女性的男子手中的棍棒形成对比。年轻人带着一根文明杖，因为任何穿着像“不可思议者”的人都可能发现自己卷入与共和党人的街头斗殴。32

《无政府主义者：我愚弄他们俩》（The Anarchist: I Fool Both of Them）。蚀刻加点刻版画，32.5 × 38 厘米，西蒙·珀蒂（Simon Petit）刻，巴黎，1797 年。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梅西耶（Mercier）在对雅各宾派（Jacobins）的看法上可能保持了一致，他将他们的会议描述为“人间地狱”，因为有“乌合之众的女人”参与，但他还是忍不住将对他们的漫画与时尚版画一同归为法国人弱点的“天真描绘”。鉴于梅西耶的文笔常常草率，他有时前后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韦尔内（Vernet）的版画可能在一页上是批判性描绘的典范，而在另一页上又成了法国人荒谬的例证。然而，最终看来，它们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即既是新时尚痴迷的写照，也暗示了对社会变革速度和方向潜在的不安。33

对社会风情的狂热具有一种并非立即可见的逻辑，即使对于像梅西耶（Mercier）这样敏锐的观察者也是如此。时尚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指标，包括社会身份的重塑和混淆，但它也仍然预示着社会地位，正如《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所展示的那样。如果这幅版画没有对服装和外貌的描绘，就不会有政治信息。时尚传达了社会身份，当它在《可怜的破产食利者》（*Poor Ruined Rentier*）或《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这样的版画中被描绘时，它呼吁观众以新的方式思考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显然正在改变，正因为它在改变，其规则也受到了质疑。

法国大革命期间，富裕阶层女性的时尚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变化，但男性的外貌则发生了更根本的转变。男性正朝着更统一的自我展示风格发展，不再戴假发，而是穿燕尾服，最终穿长裤而不是齐膝短裤。正如梅西耶（Mercier）所指出的，在整个欧洲法庭上流行的经典法式三件套服装，“已不敢再亮相了。”取而代之的是，“老人和青少年都穿上了短款的**骑马服或燕尾服**（*frac*）。”这种风格持续了下来，尽管拿破仑（Napoleon）执政期间，齐膝短裤有所复兴，他渴望效仿宫廷的华丽服饰，而且随着体重增加，他发现紧身长裤不舒服。虽然男性的发型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每年都在变，但假发失宠了，男性越来越多地不扑粉，佩戴自己的头发，尽管女性仍然戴假发，男性在某些正式场合也会戴。与此处呈现的图像合作的画家和雕刻师们几乎无法跟上这种变化。他们的作品表明人们正在注意到这些变化并试图理解它们。每一个小细节都具有意义，而且一个人的外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34

一位流亡英国的法国保皇党评论员谴责梅西耶（Mercier）的书充满了“亵渎、淫秽、陈词滥调和重新拼凑的针对宫廷和朝臣的抨击”，但他仍忍不住引用梅西耶的一些更精彩的段落，特别是那些反对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以及谴责淫秽书籍和版画泛滥的段落。大多数书评都集中在梅西耶的政治立场上。梅西耶特别指出的版画没有得到其他人的详细分析，但其中许多确实产生了回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哲学、文学与政治旬刊》（*La Décade philosophique,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该刊名为“旬刊”，因为其出版周期为新的十天一周）在 1797 年 1 月评论道，韦尔内（Vernet）刚发布了一幅“漫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幅我们当今**不可思议者**（*incroyables*）的精确肖像，这幅画非常流行。每个人都在购买这幅版画。作者已经宣布将有其配套作品，即一幅我们**奇妙女性**（*merveilleuses*）的肖像。”一个月后，同一杂志上的一封读者来信指出，“韦尔内的《不可思议者》和《奇妙女性》使漫画风靡一时，我们看到了大量其他漫画的出现。”写信者接着抱怨说，如果艺术家们能效仿英国漫画家的做法，他们可以做得更多：“漫画不必局限于时尚的怪癖；它们可以成为政治讽刺。”他不明白为什么在法国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这一点尚不清楚。1797 年，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在法兰克福逗留期间，收集了许多当时法国漫画的笔记。其中包含了梅西耶在《新巴黎》（*Le Nouveau Paris*）中特别引用的每一幅版画。不出所料，这位德国作家将一些归类为时尚版画，但清楚地认识到其他版画的政治和社会意义。35

然而，英法漫画的对比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版画在法国的社会视野发展中扮演了如此关键的角色，为什么它们在英国却没有产生同样的效果呢？英国的社会和政治漫画历史更为悠久。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社会科学首先在法国发展起来？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托马斯·罗兰森（Thomas Rowlandson）和艾萨克·克鲁克香克（Isaac Cruikshank）在数量和可能的公众曝光度上，以及他们的讽刺范围上都超越了法国同行。早在 1789 年之前，来伦敦的外国游客就曾评论过英国讽刺作家攻击本国精英的自由程

度，而在 1789 年之后，这种自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西班牙外交官、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的朋友莱安德罗·费尔南德斯·德·莫拉廷（Leandro Fernández de Moratín）于 1792 年和 1793 年访问英国，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见过像英国漫画那样对王室如此猛烈的抨击：欧洲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无论他多么令人畏惧和强大，能够逃脱被嘲笑并以两三雷亚尔（reals）的价格为伦敦民众提供娱乐。"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藏品仅在 1793-1800 年期间就包含了近 9,700 幅讽刺版画。36

社会科学首先在法国兴起，主要原因只有一个：法国大革命。与此前英格兰的几次革命（17 世纪 40 年代和 1688-89 年）不同，法国大革命实现了与过去的彻底决裂。这种决裂是否像革命者想象的那样彻底无关紧要；通过宣称从头开始并有意识地改造未来，革命者为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治制度及其社会基础开辟了空间。版画帮助他们认识到政治制度依赖于社会体系。如果"社会机制"的"秘密"（回到梅西耶的话）能够被发现，那么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就能开启。

18 世纪 90 年代末和 19 世纪初，法国人没有像米勒（Millar）等苏格兰思想家那样，仅仅依靠书本阅读旅行记录来分析"文明"，而是旨在进行一项既更具理论性又更具经验性的社会研究。西耶斯（Sieyès）、孔多塞（Condorcet）和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引领了更具理论性的理解方式，这主要基于法国的经验。这一思潮最终体现在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有助于为社会学奠定模板。德斯蒂·德·特拉西还协助启动了第二个、经验性的思潮，他于 1799 年与其他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成员共同组建了**人类观察者协会**（Society of the Observers of Man）。尽管该协会昙花一现，但它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它提倡甚至组织以远征形式进行的实地考察，以调

查人类生活的各种生理、道德和智力方面，这些方面被它认为是“人类学”的一部分。37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些合作制作版画的画家、绘图员、雕刻师和出版商并不知道自己正在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但他们对图像市场的敏锐感知促使他们制作出能够以新方式将社会视觉化的版画。社会成为一种组织体系或一种机制——一个被视为拥有自身运行规则的研究对象。尽管这项工作部分是由思考已发生事件、已发生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的知识分子完成的，但大部分工作也由那些无意撰写论著或组织远征的插画师完成。他们对人物、事件和社会关系的描绘使观众能够产生新的情感和新的思想。

第三章

艺术、时尚与一位女性的经历

从没有人将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或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称为男性艺术家。“女性艺术家”或“女艺术家”的提法暗示着女性艺术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人意料的。在 1750 年至 1850 年间的英国，“女艺术家”（female artist）一词曾有一定流行度（在美国英语中直到 1800 年后才出现），而“女性艺术家”（woman artist）则在 20 世纪的普通英语中变得更常见。这两个词在 1970 年后获得了更大的关注，这或许是因为女权主义在那时开始渗透到艺术史和艺术评论中。在法语中，“女性艺术家”（femme artiste）的提及似乎与 1789 年和 1848 年的政治动荡有更明确的关联，因为使用高峰出现在 1800 年和 1850 年，尽管 1950 年左右后法语的使用模式与英语相似。简而言之，“女性艺术家”并非一个中性词，其出现频率的波动揭示了兴趣和态度的变化。18 世纪，女性的自主能力日益受到关注，而在法国，

1789 年后，无论是在艺术还是政治领域，这种能力都变得尤为显著。女性艺术家在她们的作品中并非唯一关注社会的人，但她们作为艺术家所面临的必然的不稳定状况无疑使她们对社会关系的力量变得敏感。1

18 世纪的一些女性艺术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瑞士艺术家安杰丽卡·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曾在伦敦和罗马工作，以及法国画家伊丽莎白·维吉·勒布伦（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和阿德莱德·拉比勒-吉亚尔（Adélaïde Labille-Guiard）在当时都名声显赫，并自那时起一直是研究对象。直到最近，18 世纪后半叶英国和法国女性艺术家日益增多的现象才开始受到重视。历史学家帕里斯·斯派斯-甘斯（Paris Spies-Gans）的一项里程碑式研究表明，在 1760 年至 1830 年间，超过一千名女性在伦敦和巴黎展出了她们的作品。在伦敦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公共展览，但在巴黎，女性作品在展出作品中所占的比例更大（超过沙龙参展作品的 10%）。18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女性在这两个城市的参与度都表现出最显著的增长。在法国，这种增长的原因显而易见；1791 年 8 月，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结束了皇家学院（Royal Academy）对两年一次的沙龙（Salon）展览的垄断。随着艺术界的开放（1789 年沙龙和 1791 年沙龙之间展出作品的数量翻了一番），女性的参与稳步增加。斯派斯-甘斯发现，在 18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至少有 52 名女性在巴黎公开展出，但在 1791 年至 1814 年间，这一数字超过了 200 名。2

其中一位女性是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Marie-Gabrielle Capet，1761 – 1818），一位名气不大的画家，她的经历值得关注，因为她出身低层——她的父亲是一名仆人——然而却取得了中等成功的职业生涯。卡佩与她同姓的王室家族无关，她必须在一位女艺术家所面临的限制下工作，她从未拥有足

够的声誉或财富来建立完全的经济独立。尽管如此，她仍被认为是“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最好的法国微缩画家之一”。3

卡佩（Capet）1761 年出生于里昂，不知何故来到了巴黎，并在阿德莱德·拉比勒-吉亚尔（Adélaïde Labille-Guiard）的画室学艺，后者是 18 世纪 80 年代皇家学院仅有的四位女性成员之一。她与拉比勒-吉亚尔的关系，以及在她老师于 1803 年去世后与拉比勒-吉亚尔的第二任丈夫、画家弗朗索瓦-安德烈·文森特（François-André Vincent）的关系，对她的事业乃至生存都至关重要。她是他们字面意义上的被监护人，因为她与他们同住，他们对她而言是代理父母。她甚至在遗嘱中要求与她的“父亲”文森特合葬。她的导师们为她画了肖像画，而卡佩自己最雄心勃勃的画作则描绘了拉比勒-吉亚尔的工作室。4

卡佩（Capet）在 18 世纪 80 年代开始展出作品，并像她的保护者们一样，在 18 世纪 90 年代留在了法国。她在拿破仑时代也进行创作，因此有机会捕捉到当时一些最重要的发展，特别是对社会角色多变性的日益关注以及服装时尚不断变化的波动性。卡佩追随她的老师的脚步，专注于肖像画，但在她的案例中，这通常意味着微型画，包括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绘画的微型复制品。肖像画是 18 世纪 90 年代法国女性艺术家主要的画种选择；18 世纪 90 年代沙龙中女性展出的画作中，超过一半是肖像画（所有展出画作中肖像画的比例不到三分之一）。大型历史画被认为是男性画种，而肖像画和花卉画则被认为适合女性。5

各种形式的艺术对于使社会变得可见至关重要，法国大革命在其中发挥了催化作用。版画、报纸、小册子和戏剧作品的爆炸性增长——1789-1799 十年间有三千七百部戏剧和九万场演出（一个十年内的总数是前半个世纪总数

的两倍）——证明了政治和社会意义上日益加深的危机以及描绘社会关系的需要。西耶斯（Sieyès）的亲密伙伴查尔斯·泰雷曼（Charles Théremin）在1797年观察到，“每个人普遍都已脱离了他们原有的处境，没有人是1789年的自己，也不是在他人生总结中期望在1796年成为的自己。”6

卡佩（Capet）的“原始境况”最广为人知的是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的《自画像与两位学生》（*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这幅画于1785年在沙龙（Salon）展出，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画中，卡佩（Capet），即右侧的学生，凝视着她的导师正在创作的画作，而非观看者。另一位学生玛丽·玛格丽特·卡罗·德·罗斯蒙德（Marie Marguerite Carreaux de Rosemond）与拉比勒-吉亚尔的目光平行，都看向观看者或画作的主题。卡罗·德·罗斯蒙德可能来自一个上流家庭，因为姓名中的贵族冠词“de”常表示贵族身份，或至少是对此类地位的伪装。关于她的信息不多，因为她于1788年死于难产。尽管可以说拉比勒-吉亚尔选择将卡罗的容貌描绘得比卡佩更明亮、更精致，但关于卡罗的服装却无法推断太多，因为它大部分被遮挡了。她和卡佩都没有穿像拉比勒-吉亚尔那样时髦的服装，也没有戴帽子。她们在椅子后面的位置使她们成为观察者而非积极参与者。尽管如此，拉比勒-吉亚尔并非必须描绘她的两位学生，而且画作的大尺寸（7×5英尺）也给了她们相当大的空间。她既强调了自己作为年轻女性教师的角色，同时也突出了她作为画家的技艺和作为社会时尚女性的地位。

*阿德莱德·拉比耶-吉亚尔（Adélaïde Labille-Guiard），《**自画像与两位学生**》（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1785 年。布面油画，尺寸 83 × 59.5 英寸（210.8 × 151.1 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图片版权©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片来源：Art Resource, NY。*

1783 年和 1784 年，卡佩（Capet）在巴黎面向有抱负画家的当地青年画展上展出了她自己的自画像。在第二幅自画像中，她穿着与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肖像中相同的连衣裙。然而，在这里，她的帽子是黑色的，

头发上略施粉末，头巾是白色薄纱。与拉比勒-吉亚尔笔下的她相比，卡佩在自己的自画像中显得更加自信和直率。像拉比勒-吉亚尔在《自画像与两位学生》（*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中一样，卡佩手持调色板，戴着帽子，并直接与观者互动。7

在 18 世纪 80 年代，女性艺术家创作的自画像，描绘她们自己在工作状态，其存在本身就具有政治宣言的意味。法国的女性艺术家直到 18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开始描绘自己作画，而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女性艺术家早在 16 世纪就已经这样做了。法国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女性获得了更多展览机会，即使这些机会仍然有限，她们也因此开始将自己视为不仅仅是二流艺术家。维吉·勒布伦（Vigée Le Brun）和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走在前列，她们在 1782 年展出自画像时，创作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心理冲击”。8

即使在描绘自己作为画家的同时，这两位艺术家也强调了她们的时尚感，而不是绘画中不可避免的凌乱。她们自画像中的连衣裙看起来几乎不像是在画布上涂抹颜料的人会穿的服装，尽管在这些早期的自画像中，这种效果不像拉比勒-吉亚尔的《自画像与两位学生》（*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中那么引人注目。艺术史学家劳拉·奥里奇奥（Laura Auricchio）指出，拉比勒-吉亚尔 1785 年自画像中的优雅服饰是基于当时流行的时尚版画。18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加剧，时尚杂志在法国兴起。1794 年至 1796 年间，由于政治言论和不确定的战争局势使它们显得轻浮，这些杂志大体上消失了，但在 1797 年又重新兴起，因为时尚和社会区分开始重新确立。时尚媒体记录了社会身份的混乱，甚至通过使时尚更广泛地被消费，并强调和可能加速时尚的频繁变化，从而增加了不可预测性。9

*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Marie-Gabrielle Capet），《**自画像**》（Self-Portrait），1790 年。黑色和红色粉笔画，以白色粉笔提亮，绘于棕褐色纹理纸上，尺寸 34 × 29.4 厘米。霍维茨收藏馆（The Horvitz Collection），威尔明顿。*

卡佩（Capet）无疑也看到了同样的时尚版画，这使得她 1790 年的自画像尤为引人注目。画中她再次穿着同样的连衣裙，但没有了之前两幅肖像中的头饰或帽子，也没有了两者都有的领饰和袖口。因此，这幅 1790 年的画作

突出了卡佩作为一位**独立艺术家**的形象。她也宣扬了工作、生产力和个体性的新价值，即使是对于出身低微的人而言。时尚，无论是服装还是家具，主要以其**缺席**而存在。10

卡佩（Capet）似乎正在积极思考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秩序**，以及她在其中可能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已经剥离了旧的社会秩序，或者说将其简化到了最基本的状态，并且她清楚地知道时尚如何标识社会地位。凭借一条简单的缎带、没有帽子、朴素的连衣裙和一把非常普通的椅子，她占据了一个几乎永恒的空间，我们的目光在她的表情、淡淡的微笑、即将开始绘画的右手以及表明已完成大量作品的画夹之间不断流转。毫不夸张地说，她将自己呈现为第三等级的女性代表，像 1789 年画像中的代表热拉尔（Gérard）一样，她能干而勤奋。当她工作时，她显然不关心传统上女性对仪容和装饰的关注。或者说，她致力于表明这些是可以被暂时搁置的。她可以没有帽子、领饰或袖口，任由头发自然垂落，依然具有吸引力。卡佩还预示了一个重要的趋势：1791 年沙龙向所有女性艺术家开放后，**女性艺术家描绘女性**的作品数量急剧增加。11

1789 年作为版画出版的革命代表肖像（见第二章）有效地重塑了权力语言。艺术史学家艾米·弗罗因德（Amy Freund）认为，“它们以谦逊、亲密和透明的语言来表达权威。”尽管这种效果部分来源于肖像的集体性，暗示主权正从国王转移到国家的代表手中，但个别肖像，例如代表热拉尔（Gérard）的画像，与旧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艺术家和大概被画者都选择刻意剥离了常与君主制和贵族特权联系在一起的仪式性虚饰。弗罗因德所用的“谦逊、亲密和透明”这些词语，似乎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卡佩（Capet）1790 年的自画像。艺术家的选择并非随意；她的发辫中系着一条微红的缎带，未施粉黛，

戴着耳环和戒指。她以开放坦诚的表情看着观者，但她并非在为观者摆姿势。她的画夹鼓鼓囊囊，证明了她的努力。她正在工作。12

1789 年之后，卡佩（Capet）继续与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同住，两位女性都试图适应事件带来的迅速变化的环境。1789 年 9 月底，她们都在组织女性艺术家为新政府做出爱国贡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拉比勒-吉亚尔未能成功敦促皇家学院接纳更多女性，但她开始通过削弱艺术上的华丽，追求肖像中人物最准确的相似度来改变自己的美学。她曾以与国王姐妹们的交往而闻名，现在她为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中的十四位代表作画，其中包括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卡佩则为这些肖像制作微型画。大部分肖像画和微型画现已失传，但仍存有一幅：阿曼德-德西雷，艾吉永公爵（Armand-Désiré, Duke of Aiguillon）的肖像和微型画，他是最早支持第三等级建立国民议会的贵族之一。一些人将卡佩（以及拉比勒-吉亚尔）解读为捕捉了旧制度贵族的漫不经心，但这幅肖像画显然强调了他克制的着装。与公爵作为代表的版画不同，拉比勒-吉亚尔和卡佩的肖像画描绘了他没有戴假发，而是他自己的扑粉头发。卡佩在 1791 年和 1793 年为两位未具名年轻男子绘制的微型画显示，他们穿着非常相似的**长礼服**（redingotes）和**领巾**（cravats）。简而言之，女性对他的描绘中没有任何一点使这位贵族公爵看起来与非贵族代表有所不同。13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是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画中人物的例外。大多数人物，例如艾吉永公爵（Duke of Aiguillon），都来自自由派贵族，这导致人们猜测拉比勒-吉亚尔和卡佩（Capet）骨子里是保皇党。如果她们是，那也是那种支持君主立宪制的保皇党。画中人物包括路易-菲利普，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Duke of Orléans），他投票赞成处死他的表兄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并支持新共和国，直到他自己也上了断头

台。与 1789 年离开法国的维吉·勒布伦（Vigée Le Brun）不同，拉比勒-吉亚尔从未随贵族流亡。1792 年 3 月，在情人文森特（Vincent）的陪伴下，并得到卡佩和另一位学生的资助，拉比勒-吉亚尔投资了一处乡村住宅，在那里他们一起度过了对异见者最严酷镇压的时期（1793-94 年）。在此期间，拉比勒-吉亚尔利用新法律与丈夫离婚，一旦情况允许，一家人便返回巴黎，住进了卢浮宫的官方住所。在那里，拉比勒-吉亚尔、文森特和卡佩描绘了新的中产阶级共和社会中的律师、知识分子、演员和艺术家。14

尽管卡佩（Capet）作为油画和粉彩肖像画家赢得了声誉，但她现在最著名的是她的象牙水彩微型画，比如**安娜·弗朗索瓦丝·伊波利特·布泰·萨尔维塔**（Anne Françoise Hyppolyte Boutet Salvetat）的画像，她被称为**玛尔斯小姐**（Mlle. Mars）。然而，这幅画与其他许多作品不同，它是椭圆形的，尺寸也比通常的大；她大部分圆形作品的直径都在 2 到 3 英寸（6 到 8 厘米）之间。这幅画的尺寸之所以是 5 英寸乘 4 英寸，或许是因为它旨在吸引 1800 年沙龙的观众注意。评论家们反复称赞卡佩的肖像画真实而逼真，她的描绘也捕捉到了人物的存在感，正如这幅画所示，人物似乎即将开口说话，无论是在练习她手中剧本的台词，还是在向观众或艺术家发表评论。这种捕捉瞬间的感觉也来源于艺术家对时尚的密切关注，就这幅画而言，是白棉细纱裙和似乎是羊绒披肩。15

*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Marie-Gabrielle Capet），《**女演员玛尔斯小姐肖像**》（Portrait of the Actress Mlle. Mars），1800 年。象牙微型画，13 × 11.2 厘米。卢浮宫博物馆，平面艺术部，RF 30675，正面© 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大皇宫 / Art Resource, NY。*

艺术家们不仅仅是时尚的描绘者。他们帮助塑造了时尚，正如维吉·勒布伦（Vigée Le Brun）为**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绘制了一幅看似简单的薄纱衬裙（chemise dress）肖像。这幅画在 1783 年沙龙（Salon）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女王穿着过于随意，艺术家被迫替换了这幅画。作为玛尔斯小姐（Mlle. Mars）所穿古希腊式束腰外衣的前身，衬裙震惊了观众，因为在法语中，**衬裙**（chemise）当时是指贴身穿着的内衣。玛丽·安托瓦内特欣然接受了这种飘逸、轻薄的裙子，因为它传达了自然和行动自由的新价值，与裙撑和紧身胸衣的僵硬形成对比。她在凡尔赛宫的小特里亚农宫（Petit Trianon）招待最亲密的朋友时就穿着它，在那里她首次建造了一个

英式花园，然后是一个模型村庄，包括一个仍在运作的奶牛场。英式花园旨在重现一种未经驯服的自然感，与通常的法式花园那种几何图案和精确修剪植物形成对比。16

玛尔斯小姐（Mlle. Mars）所穿的古希腊式束腰外衣是如何从带褶边的衬裙演变而来，尚不清楚。回溯到 19 世纪 30 年代，作家阿尔贝蒂娜·克莱门特-埃梅里（Albertine Clément-Hémery）声称，艺术家让-巴蒂斯特·雷诺（Jean-Baptiste Regnault）的学生们开创了希腊式束腰外衣的时尚。她曾在 1793 年夏天的一个日子里到访画室，当时她的朋友兼同学阿黛勒·图内齐（Adèle Tournezy）说服她和其他学生穿着带亮红色腰带和丝带的希腊式束腰外衣在巴黎市中心游行，从而引发了一股热潮。克莱门特-埃梅里放弃了绘画，并于 1797 年成为最具影响力且流传最久的时尚杂志《女士与时尚杂志》（*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的首批编辑之一。17

古希腊式束腰外衣流行的最普遍解释是新古典主义在艺术，特别是绘画和建筑方面的影响。18 世纪 50 年代以来，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庞贝（Pompeii）的新考古发现激发了人们对希腊和罗马艺术的 renewed interest。新古典主义提供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替代巴洛克（baroque）和洛可可（rococo）风格的选择，因为它强调希腊和罗马艺术的简洁、直线和宏伟，与前辈风格的繁复形成对比。在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1800 年未完成的朱丽叶·雷卡米耶（Juliette Récamier）肖像中，这位法国新古典主义领军画家描绘了这位社会潮流引领者穿着一件白色薄纱束腰外衣，这与他 1784 年画作《霍拉蒂兄弟之誓》（*Oath of the Horatii*）中一位女性人物所穿的服饰相似。在较早的画作中，这件裙子是典雅地指代古代历史；到 1800 年，它已成为上流社会女性的时尚潮流。18

白色连衣裙出现在革命节庆活动中，特别是1793年11月声名狼藉的**理性节**（Festival of Reason）和1794年6月由大卫（David）策划的**最高存在节**（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这两个节日都与对基督教的攻击有关。在理性节中，一座山（罗伯斯庇尔的支持者被称为“山岳派”，因为他们坐在会议室的最高席位）被搭建起来，挡住了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cathedral）唱诗班和祭坛的视线。山上设有一座小型希腊神庙，上面刻有“致哲学”（To Philosophy）的铭文。神庙前坐着一位活着的自由女神，她穿着白色连衣裙。她被一群同样穿着简单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环绕。当时的版画显示这些连衣裙是高腰的，但并非束腰外衣式样。大卫设计最高存在节旨在说明无神论的消灭（与理性节相关）和一种自然宗教的建立。此时，自由女神是一个雕像，而不是女演员，她也不再是盛典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大卫的计划，白色连衣裙象征着贞洁的青春。19

最新研究指出，古希腊式束腰外衣流行的其他来源包括：伦敦名媛着装中高腰设计的采纳；维吉·勒布伦（Vigée Le Brun）本人作画时穿着这种裙装的决定；艾玛·哈特（Emma Hart，即汉密尔顿夫人 Lady Hamilton，后来成为海军英雄纳尔逊勋爵 Admiral Lord Nelson 的情人），她于1787年至1799年间在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Sir William Hamilton）的住所以及巴斯（Bath）和其他欧洲首都进行了古希腊女性姿态的表演；最后，是法国督政府时期（Directory period）时尚引领者之一**泰蕾兹·塔利安**（Thérèse Tallien）的影响。塔利安原名泰蕾齐亚·卡巴鲁斯（Thérézia Cabarrus），出生于马德里，但在法国长大，她与波尔多有联系，她的叔叔在那里积极参与奴隶贸易。1793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搬到那里，很快便与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争议性特派代表让-朗贝尔·塔利安（Jean-Lambert Tallien）建立了关系。尽管泰蕾兹直到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倒台

后（同时她在巴黎监狱获释）才以穿着透明的希腊式白色连衣裙而闻名，但波尔多为白色薄纱连衣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联系，因为它似乎是来自殖民地的时尚影响进入法国的港口。20

简单的白色薄纱长袍最初在加勒比群岛的被奴役女性中流行开来，她们很可能是用从印度进口的薄纱制作的。这种薄纱不一定便宜，而且通常是被奴役者自己攒钱购买的。1794 年以后，希腊式薄纱束腰外衣的时尚有时被追溯到克里奥尔（Creole）女性，例如约瑟芬·德·博阿尔内（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她是马提尼克（Martinique）一家糖种植园主人的女儿，于 1796 年嫁给了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位前往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的旅行者报告说，那里的克里奥尔女性日常穿着是在透明薄纱长袍外面套一条裙子。约瑟芬于 1794 年在巴黎监狱与泰蕾兹相遇，她们很快成为挚友，并在获释后共同成为时尚的仲裁者。因此，这种裙装的流行可能也与监狱经历本身有关，因为在监狱里几乎不可能穿其他衣服。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穿着白色连衣裙上了断头台，在让-路易·拉纳维尔（Jean-Louis Laneuville）1796 年的一幅肖像画中，塔利安（Tallien）被描绘成在牢房里穿着一件高腰白色连衣裙。拉纳维尔的肖像画在 1796 年沙龙展出后几乎立即被撤回，因为泰蕾兹与日益 discredited 的代表塔利安的婚姻。作为代表，塔利安在推翻罗伯斯庇尔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他本人也被认为是罗伯斯庇尔政权镇压的主要代理人。泰蕾兹在获释几个月后嫁给了塔利安。21

尽管白色薄纱束腰外衣式的连衣裙只在法国本土被玛尔斯小姐（Mlle. Mars）等上流女性所采纳，但它在时尚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798 年 12 月，一本时尚杂志坚持认为“白色仍然是主导色。最漂亮的印度薄纱，无论是素色还是刺绣的，都受到我们富裕优雅女性的青睐，胜过所有其他面料。”1799

年，另一本杂志宣布“几乎看不到其他面料”用于连衣裙，并且“这种连衣裙的款式就是束腰外衣，低胸，不言而喻。”薄纱将一直流行，直到波拿巴（Bonaparte）掌权后成为一个国家问题。他希望振兴法国丝绸工业（丝绸与旧制度贵族相关），并阻止英国从其对孟加拉的控制和对薄纱生产的主导中获利。他几乎立即开始鼓励使用丝绸和羊毛，而不是薄纱。他的继女奥尔滕斯（Hortense）报告说，每当她或约瑟芬（Joséphine）穿着一件优雅的连衣裙走进房间时，他都会立刻问是不是薄纱。如果他怀疑她们声称是亚麻时在撒谎，他就会把它扯下来。她们放弃了，改穿缎子或天鹅绒。最终拿破仑（Napoleon）颁布法令，规定帝国宫廷和法庭的所有成员必须完全穿着丝绸。22

如果玛尔斯小姐（Mlle. Mars）的披肩是羊绒的，她可能也采用了另一种流行风格。当波拿巴（Bonaparte）的军官们从埃及带回这些备受珍视的披肩时，它们立即成为城中热议的话题。这些披肩产自克什米尔，进口价格不菲，对羊绒的追捧立即促使法国科学家研究克什米尔的畜牧和制造方法，以尝试仿制，就像英国当时对印花棉布和薄纱所做的那样。学者们争论这种布料是来自绵羊还是山羊，以及法语中应该用哪个词来指代披肩，因为这个词最初来自印度（“schall”在法语中让位给了“châle”，因为前者被认为过于英语化）。据说约瑟芬（Joséphine）拥有数百条这样的披肩，所有时尚潮流引领者都请人为自己画肖像时穿着它们，通常颜色与玛尔斯小姐所穿的非常相似。当女性穿着轻薄暴露的白色束腰外衣时，披肩提供了保暖，或许也暗含了对礼仪的尊重。23

玛尔斯（Mars）小姐的发型也有多种解读。她似乎没有戴假发，头发很可能是卷曲的。到 1798 年末，时尚杂志宣布对短而平的“提图斯式”（Titus cut）发型（在男女中都很常见，包括波拿巴本人）的偏爱已经结束，新的时

尚是卷发。波拿巴最初是留着长而蓬松、脑后系带的扑粉发型，但从 1797 年开始采用了“提图斯式”发型。即使时尚变化，他也保留了这种发型的一个版本。“提图斯式”发型象征着对罗马式共和主义的忠诚，因为它最初因演员弗朗索瓦-约瑟夫·塔尔马（François-Joseph Talma）扮演罗马皇帝提图斯而流行起来。他根据提图斯半身像的造型剪短了头发。塔尔马是画家大卫（David）的亲密伙伴，而玛尔斯（Mars）和塔尔马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末都是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收入最高的演员。24

然而，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末，假发，即使是卷曲的金发，又重新流行起来，尽管这些很快就被深色假发取代。金发假发宣示了对前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政权压迫的抗议，当时金发被一些人视为贵族和反革命（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据说是天生的金发，但她戴着各种颜色的假发）。据说泰蕾兹·塔利安（Thérèse Tallien）有三十顶假发，都是金色的。无论玛尔斯（Mars）的发型真相如何，它显然是为了与她裸露的颈部相配。白色薄纱束腰外衣和裸露颈部（有时也包括裸露手臂）的组合引起了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Louis-Sébastien Mercier）等评论家的注意。1799 年，他在《新巴黎》（*Nouveau Paris*）中评论冬季舞会时，嘲讽了与**不可思议者**（*incroyables*）相关的时尚，但无法完全忽视她们女性同伴的吸引力：

在这个迷人的地方，一百位女神，浑身散发着香油的芬芳，头戴玫瑰花冠，身着雅典式长裙翩翩起舞，轮流吸引并跟随那些头发蓬乱、穿着土耳其拖鞋的**不可思议者**的目光；她们与那幅刻画她们名字的带刺新版画[见第二章《奇妙女性》(*Les Mérveilleuses*)]如此惊人地相似，以至于我实在无法将其视为一幅漫画……所有女性都身着白色，白色衬托着所有女性。她们的颈部裸露，手臂外露。

玛尔斯（Mars）并非**奇妙女性**（*merveilleuse*），但在 18 世纪 90 年代末，希腊式白色薄纱束腰外衣和裸露颈部已不再让观众感到惊讶。25

卡佩（Capet）向公众展示她为玛尔斯小姐（Mlle. Mars）绘制的微型画那一年，也是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最终与文森特（Vincent）结婚的那一年。1802 年，他们全部搬到了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的新住所，这是分给文森特的，他于 1796 年被任命为国家研究院的创始成员之一。女性被排除在成员资格之外。1803 年，拉比勒-吉亚尔去世。在这些动荡时期，她展现了非凡的适应能力，能够根据政治时刻调整自己的美学，而这种适应性也将贯穿卡佩在拿破仑政权时期的作品。26

大多数评论员都强调了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和她的学生卡佩（Capet）之间紧密的联系，并引用了拉比勒-吉亚尔描绘卡佩的画作中的元素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拉比勒-吉亚尔 1785 年自画像中对卡佩的突出描绘被认为表达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冲动，即强调才能而非出身，因为卡佩的背景比另一位学生更为普通。许多学者关注拉比勒-吉亚尔最后一件已知作品之一，即她 1798 年创作的油画《卡佩手持小调色板制作微型画》（*Capet holding a small palette while working on a miniature*）。卡佩穿着与拉比勒-吉亚尔 1785 年自画像和卡佩自己 1790 年自画像中相同的连衣裙，尽管这次连衣裙有一个相当大的白色衣领和白色袖口，卡佩戴着一顶深色天鹅绒帽子。拉比勒-吉亚尔的这幅画被解读为表达了“师生之间令人心酸的认同”，并“因其真诚的执行而引人注目”。画中卡佩转向艺术家，她的眼神被解读为“开放而愉悦，她想必就是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她敬爱的老师面前的。”这很可能是拉比勒-吉亚尔的意图，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卡佩的反应。拉比勒-吉亚尔描绘卡佩绘制微型画似乎并非偶然，因为卡佩确实创作了许多拉比勒-吉亚尔画作的微型版本以及她自己构思的微型画，但卡佩也从事粉彩和油画创作。然而，在

拉比勒-吉亚尔眼中，卡佩永远是那个制作老师肖像微型版本的学生。许多其他以油画和粉彩闻名的画家在 18 世纪 90 年代他们的潜在贵族赞助人逃离法国后，也转向制作微型画。27

因此，卡佩（Capet）1808 年油画《画室场景》（*Studio Scene*）中似乎流露出对老师的些许不满，这并不令人惊讶。这幅画尺寸不大，为 27×33 英寸，但人物众多，尽管据称以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为中心，但卡佩却让自己成为观者关注的焦点，与她的老师不相上下。卡佩手持调色板，直视观者。她是画中唯一一个直视观者的人物，仿佛在说："看我，这是我画的，我才是画家。"她占据了前景，与画中其他人完全分离；其他人要么看着某个人，要么专注于画作。将这幅画室场景视为对拉比勒-吉亚尔 1785 年轰动性自画像的迟来反击，并非牵强附会。28

卡佩（Capet）的这幅画打破了人们的预期。画室场景中，助手通常不会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卡佩没有看向画作，也没有看向她的老师，更没有看向她的父亲般的人物文森特（Vincent），文森特的手放在拉比勒-吉亚尔的椅子上，正指着画中某个可能需要拉比勒-吉亚尔注意的地方。卡佩征求我们的看法，但意图不明。卡佩为 1808 年沙龙（Salon）撰写的描述相当冗长，但只有有心发现隐藏动机的人才能从中看出端倪。她称拉比勒-吉亚尔为"已故的文森特夫人（她丈夫的学生）"，并说这位年长的女性正在为帝国伯爵、同时也是文森特老师的约瑟夫-玛丽·维恩（Joseph-Marie Vien）参议员绘制肖像。卡佩指出自己正在调色板，并且在这幅画中加入了文森特的主要学生。她还在最右侧描绘了维恩的儿子和儿媳站在维恩身后。卡佩才是建立从维恩到文森特再到拉比勒-吉亚尔的艺术传承之人。尽管这位年长的女性据说是画作的主题，但拉比勒-吉亚尔实际上被取代了。相反，她变成了文森特的妻子和学生。29

*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Marie-Gabrielle Capet），《**画室场景**》（Studio Scene），1808 年。布面油画，69 × 83.5 厘米。慕尼黑新绘画陈列馆（Neue Pinakothek, Munich），bpk Bildagentur / Art Resource, NY。*

卡佩（Capet）将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描绘成一个戴着白色帽子、穿着长而松垮的白色连衣裙的幽灵般的存在，这与玛尔斯小姐（Mlle. Mars）所穿的束腰外衣大相径庭。尽管女性艺术家有时在工作时会被描绘成这种服装，但她们总是比拉比勒-吉亚尔在此画中显得更时尚。作为助手的卡佩穿着更正式、色彩更鲜艳的服装。拉比勒-吉亚尔的幽灵般的特质暗示了这幅画有意错位的时空维度，因为这幅画是在拉比勒-吉亚尔去世五年后展出的。拉比勒-吉亚尔唯一一幅维恩（Vien）的肖像画是 1782 年展出的一幅粉彩画，

但卡佩并非在追忆那个时刻，因为 1808 年仍然在世的维恩穿着拿破仑帝国参议员的正式服装，画中所有人物的着装风格都属于 19 世纪第一个十年。卡佩在自己的描述中称维恩为帝国伯爵，这个头衔是维恩在 1808 年被授予的，远在拉比勒-吉亚尔去世之后。30

卡佩（Capet）对当时时尚的社会意义的兴趣在对维恩（Vien）和文森特（Vincent）的描绘中尤为显著，他们都穿着正式的机构服装。维恩穿着 1804 年拿破仑加冕皇帝时规定的参议员服装：蓝色天鹅绒外套、斗篷和马裤，斗篷镶有金色饰边，蕾丝领巾，以及一顶饰有白色羽毛的黑色毡帽。他那顶带有羽毛的帽子，放在他身后的桌子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789 年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贵族代表的官方服装包括带羽毛的帽子，这是非贵族代表被禁止佩戴的。然而，到 18 世纪 90 年代末，羽毛已被中产阶级作为一种荣誉标志：共和制督政府（Directory government）的官员将它们作为其官方服装的一部分，希望它们能为努力确立其合法性的政府增添权威。拿破仑为他的新精英阶层规定了羽毛装饰。拿破仑对官方和宫廷服装的规定着迷，部分原因是他出身军旅，部分原因是他知道自己的政权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31

文森特（Vincent）作为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成员的服装不如维恩（Vien）的那么显赫，但他显然比画中其他人更引人注目。像他的老师维恩一样，文森特也戴着假发，并且他的外套绣有学院成员所需的刺绣。卡佩（Capet）在大约同一时间画了一幅文森特的小油画，可能是作为习作，画中他穿着与学院成员相同的刺绣燕尾服和马甲。他的荣誉军团勋章（他于 1803 年获得此殊荣）佩戴在他的左驳领上，就像在画室场景的画中一样。维恩也佩戴着他的勋章。卡佩在表达的是，在维恩之后，文森特是画室中级别最高的人物。32

卡佩（Capet）对时尚的关注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但在她这幅画室场景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仅仅是因为画中有如此众多的男女性人物。她对画中人物从头到脚的精心且多样的选择，阐明了几点：她以绘制老师画作的微缩画而闻名，在此画中她展示了自己能够完成更大的油画作品；她作为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的学生而闻名，她既承认了这份恩情，也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通过选择描绘文森特（Vincent）的学生们，她既将自己置于他们之中，又通过她在画面中的位置将自己与他们区分开来。与他们不同的是，她正在参与一幅作品的创作，这是对她作为画作创作者身份的间接提及。

卡佩（Capet）对时尚的描绘也特意突出了**代际变化**。文森特（Vincent）的两到三名学生留着扑粉的头发，这看起来比年长男性头上的假发自然得多。维恩（Vien）九十二岁，文森特（Vincent）六十二岁，三位留着扑粉头发的人，从左到右分别是五十一、四十四和四十二岁。其余六名学生的平均年龄是三十三岁。年轻男性都留着当时流行的发型，没有扑粉，头发向前垂落，是“提图斯式”（Titus cut）的变体，通常还留有从 18 世纪 90 年代末**不可思议者**（*incroyables*）首次流行的“狗耳朵”演变而来的鬓角。他们穿着 1800 年后流行的**燕尾服**（frock coats），配以宽大的薄纱或亚麻**领巾**（cravats）或**褶边**（jabots）。由于她在 1801 年沙龙上成功展出了她的微型画，卡佩一定见过罗伯特·勒费弗尔（Robert Lefèvre）备受推崇的画家皮埃尔-纳西斯·盖兰（Pierre-Narcisse Guérin）肖像画，画中人物也留着相同的发型，穿着燕尾服和领巾。33

卡佩（Capet）无疑旨在通过这种方式将文森特（Vincent）的杰出学生们聚集在一起，从而提升文森特画派的价值。画中所有人当时都赫赫有名，其中一些，如左起第二位身穿蓝色外套、背对观众的查尔斯·梅尼耶

（Charles Meynier），更是家喻户晓。她强调了文森特与维恩（Vien）的联系，维恩的另一位著名学生是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大卫长期以来一直是文森特的竞争对手。卡佩实际上为自己宣称了至少三个角色：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无所不知的助手，文森特的狂热拥护者，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够策划这复杂场景的画家。她没有将自己置于构图的中心，中心被画架占据，但她无疑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她在维恩传承中位置的模糊性：她是拉比勒-吉亚尔的学生，拉比勒-吉亚尔是文森特的学生，文森特是维恩的学生；但像她的导师们一样，她也成为了独立的画家。事实上，她正在绘制维恩、文森特和拉比勒-吉亚尔的肖像，以及文森特学生的肖像。在她余生中，她一直与梅尼耶以及文森特圈子里的其他人保持着密切联系。34

由于卡佩（Capet）在 1798 年的沙龙（Salon）上展出了许多微型画，她无疑亲眼目睹了路易-利奥波德·布瓦利（Louis-Léopold Boilly）的《让-巴蒂斯特·伊萨贝工作室中的一群艺术家》（*Group of Artists in Jean-Baptiste Isabey's Studio*）所受到的热情公众反响。尽管伊萨贝（Isabey）以微型画家闻名，但布瓦利选择不描绘绘画动作，而是展示艺术家们与文化精英中的其他男性（包括作曲家、诗人、建筑师和演员）交谈的场景。他描绘了一个男性社会的世界；没有女性在场。艺术家中包括查尔斯·梅尼耶（Charles Meynier），卡佩曾在 1799 年为他绘制了微型画和粉彩肖像。布瓦利工作室场景的尺寸比卡佩的大，但幅度不大：他的画是 28×44 英寸；她的画是 27×33 英寸。卡佩在产量或商业成功方面无法与布瓦利竞争，但她为自己的画室场景带来了独特的女性视角。35

《女士与时尚杂志》（Journal des dames et de modes）第 20 期插画 608，1805 年 1 月。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事实上，她可能将维恩（Vien）的儿子和他妻子罗斯-塞莱斯特·巴什（Rose-Céleste Bache）也包含在构图中，以使第三位女性出现在画面中。像卡佩（Capet）和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一样，与画中大多数男性不同，巴什积极参与其中，指着维恩的一幅画。维恩的儿子，小约瑟夫-玛

丽·维恩（Joseph-Marie Vien the younger），也是一位画家。他师从其父和文森特（Vincent），他将手放在父亲的椅子上，清楚地表明了他与父亲的联系。他四十七岁，与卡佩同龄，其发型和着装清楚地表明他是年轻一代。他的头发卷曲并带有鬓角，穿着与画中其他一些年轻男子相同的时尚剪裁双排扣外套，如同 1805 年时尚插画中的模特，他也戴着与其他男子相同的**蕾丝领巾**（jabot de point）。他穿着靴子，这种鞋款随着军事风格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受到男士青睐，而其他一些男士则穿着拖鞋，正如 1805 年时尚插画中的模特一样。除了维恩老先生穿着老式的齐膝短裤外，腿部可见的男士们都穿着紧身**棉布长裤**（nankeen trousers），这种裤子在 18 世纪 90 年代部分取代了齐膝短裤。1805 年时尚插画中的模特穿着齐膝短裤，但与袜子融为一体，不像维恩的那样。

维恩（Vien）的儿媳罗斯（Rose）穿着一件时髦的白色连衣裙。她的披肩可能是羊绒的，酷似卡佩（Capet）微型画中玛尔斯小姐（Mlle. Mars）所穿的款式。和一些男士一样，罗斯和卡佩的头发都卷成了卡拉卡拉式（Caracalla，一位罗马皇帝），或者是那种风格的假发，这是 18 世纪 90 年代末首次出现的另一种时尚。1798 年 9 月，《巴黎品味、时尚与服装总览》（*Tableau général du goût, des modes et costumes de Paris*）声称："对古典的品味开始影响发型：喜欢整洁和舒适的人很高兴看到短发、不扑粉、平直或卷曲的提图斯式（à la Titus）或卡拉卡拉式（à la Caracalla）发型越来越多。"另一本时尚杂志在 1806 年 12 月解释了为什么很难区分真发和假发："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让假发模仿真发，让真发看起来像假发。"36

女性艺术家可能对时尚的变化特别敏感，因为她们既是艺术家又是女性，但在这方面男女之间的差异不应被夸大。1800 年之后，时尚日益成为女性的专属领域，但从未完全如此。男性将越来越多地穿着相似；所有阶层的男性

最终都会穿长裤并抛弃假发。卡佩（Capet）1808 年的画作正处于性别与服饰问题的关键时刻。例如，她捕捉到了齐膝短裤与长裤之间的拉锯战。长裤最终会胜出，但并非一蹴而就。齐膝短裤将成为拿破仑宫廷和复辟波旁王朝宫廷对传统的依恋的标志。

女性对新古典主义束腰外衣的渴望，其轻盈的面料和飘逸的造型，以及摆脱紧身胸衣和裙撑束缚的自由，可能被证明是富有远见的，但在 1800 年，它的保质期相对较短。紧身胸衣、裙撑和束身连衣裙将会重新流行起来，至少对于富裕阶层的女性而言是如此。拿破仑（Napoleon）希望女性回到她们的传统位置，在他倒台后复辟的君主制也是如此。卡佩（Capet）通过描绘自己穿着一件几乎不暴露的连衣裙，也预示了这一变化。尽管她的内衬裙是白色的，但她穿着一种新风格的女性长**骑马外套**（redingote）版本，这种外套早在 1802 年 3 月的《女士与时尚杂志》（*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中就能看到。卡佩衣领的一个版本也可以在同年份的时尚版画中看到。简而言之，卡佩所做的每一个美学选择都是深思熟虑的。37

尽管拿破仑的妻子约瑟芬（Joséphine）抵制他限制英国薄纱的禁令，但时尚确实发生了变化，而且他并非唯一希望这种变化的人。就在 1799 年 11 月波拿巴（Bonaparte）上台的政变几天后，一家报纸抱怨督政府（Directory government）的官方服装，坚称董事们穿着的服装让他们看起来像街头杂耍艺人（un vêtement de saltimbanques）。人们敦促新任执政官们穿着里昂产的天鹅绒、缎子和刺绣。因此，正如预料的那样，在当时时尚的描述中，缎子、塔夫绸、天鹅绒和羊毛制品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尽管白色薄纱并未消失，但它正被法国制造的彩色面料所取代。38

《女士与时尚杂志》（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第 33 期插画 369，1802 年 3 月。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时尚并非彰显社会差异的唯一方式。在 1808 年的画室油画中，卡佩（Capet）着重强调了助乐手在艺术界的重要性，这往往也意味着女性角色的转变。雕刻师的妻子和女儿常常负责收尾工作。在画家家庭中，她们负责

准备调色板，很可能也参与了绘画本身。卡佩抓住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契机，揭示了助手的角色，并评论了她在社会中的地位；她在画室场景中将自己描绘成助手，但通过将自己置于前景并与他人分离，她提醒观者：画者是她，而不是拉比勒-吉亚尔（Labille-Guiard）。即使出身贫寒，助手也能跻身顶尖行列。卡佩并未永远位居顶峰。她继续绘画和展览，直到文森特（Vincent）于 1816 年去世。之后，她被复辟的君主政府从他们共住的公寓中驱逐，并失去了文森特为她安排的政府养老金。文森特的生活方式依赖于对女性关闭的官方任命的保障。卡佩于 1818 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她曾要求与文森特合葬。39

在其漫长的绘画生涯中，无论是微型肖像、粉彩还是油画，卡佩（Capet）都让人们以新的方式审视社会关系，进而审视社会。她描绘了不断演变的时尚，并帮助它们栩栩如生。她刻画、概括并赋予了个体性以价值，包括她自己的个体性。审视社会不仅仅是发展对雇主与工人、地主与农民、富人与穷人，甚至是夫妻之间关系的批判性视角。它也关乎画家与他们的老师、学生以及被画者。社会关系无处不在，但常常被视为日常生活的背景而理所当然。像卡佩这样的艺术家在将这些关系推向前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以新的方式使其可视化，从而使其能够被分类和概念化。

第四章

革命军队与战争策略

发现人类和系统的新潜力可能是一把双刃剑，这在法国革命军队的案例中尤为突出。1792 年 4 月，当法国政府对奥地利宣战时，法国仍由国王统治（尽管时日无多），其武装部队面临瓦解。海军中，9 名海军中将只剩下 2 名，18 名海军少将只剩下 3 名，170 名上尉只剩下 42 名。三分之二的陆军军官已经移民，其中许多人打算加入反革命军队。尽管国王试图逃跑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将加入 1791 年已经挺身而出的 10 万人，但滑膛枪、子弹和军服极度短缺。常备军依靠约 60 万支滑膛枪的储备，但在 1792 年初，只有 16 万支可用。志愿者如何与常备军合并仍不清楚。政府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武装人员。1

战争的爆发源于相互强化的误判。法国代表们认为，鉴于奥地利公然的敌意，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兄弟统治奥地利直到

1792 年 3 月，随后由她的侄子继位，他们无法避免战争。代表们还认为他们可以将战争限制在奥地利。奥地利人反过来认为，如果受到恐吓，法国人就会退缩，并且在 1792 年 2 月通过结盟获得普鲁士的支持后，他们相信，鉴于法国军官团的瓦解，如果战争爆发，将很容易获胜。早在 1791 年，一名英国军官就从法国报告说："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法国军队目前的状态不适合作战。"根据法国政府 1789 年自己的估计，法国陆军 23 万人的兵力将少于奥地利陆军 30 万士兵的兵力，如果再加上普鲁士 20 万人的兵力，则会更加不堪重负。路易十六（Louis XVI）同意法国宣战，因为他认为，如果那些与法国结盟的国家获胜，他们就会恢复他的全部权力；如果他们失败，法国将军们就会调转军队返回巴黎，驱逐代表们。当路易十六要求代表们宣战时，法国陆军 153 名将军中有 135 名是贵族。2

战争一旦开始，似乎就证实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预期。奥地利人轻易地击退了法国入侵比利时的企图，普鲁士人则攻占了隆维（Longwy）和凡尔登（Ver 敦）的边境要塞，于 9 月初打开了从东方通往巴黎的路线。在北部，法军惊慌失措地溃逃，而不是有条不紊地撤退，这进一步提振了盟军的信心。此外，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在 8 月路易十六被废黜时投奔了奥地利，这使得人们对留下的贵族将军们更加担忧。

1792 年 9 月 20 日的**瓦尔密战役**（Battle of Valmy）打破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预期，并立即扭转了法国的命运。法军在关键的战场上人数多于普鲁士人（法军 4 万人对普鲁士人 3.4 万人），因为奥地利人和法国反革命移民未能及时赶到，然而普鲁士人的火炮数量是法军的两倍（200 门火炮对 100 门）。双方都进行了猛烈炮击，普鲁士人甚至一度炸毁了三辆装满弹药的法国马车，造成了一时恐慌。当普鲁士纵队齐步前进时，法军步兵（其中近一半是志愿者）并未失去勇气。相反，他们跟随弗朗索瓦·凯勒曼（François

Kellermann）将军的领导，尽管他的战马已被击毙，他们仍忍住不发，高喊“**国家万岁！**”（Vive la Nation!），并准备好刺刀冲锋。普鲁士人在抵达法国火炮射程内时停止了前进，因为害怕遭受巨大损失。此时双方仅相隔数百码。在又进行了一些炮火交锋后，普鲁士人决定撤退。3

双方伤亡人数不多，但一切都已改变。陪同普鲁士军队的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声称在营地对士兵们说：“从这里和今天起，世界历史上将开启一个新纪元。”法国志愿者们可以与欧洲最优秀的士兵一较高下。普鲁士人背对巴黎作战，是为了切断法军与首都的联系，但现在法军阻碍了他们的食物运输。雨水、疾病和饥饿迫使他们撤退。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交锋变成了法国军队和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场鼓舞人心的胜利。4

法军很快就势如破竹。到 10 月底，所有敌军都被逐出法国领土，法军向南推进到萨瓦（Savoy）和尼斯（Nice），向东推进到莱茵兰（Rhineland），并再次攻入比利时，这次取得了成功。这次逆转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特别是 1793 年战争的致命性扩大，但考虑到军队的弱点，其成功仍然令人震惊。个别士兵和军队作为一个整体正在发现新的能力，因为战争的紧迫性与革命思想产生了爆炸性的结合。

旧制度的改革者，例如准将兼军事改革倡导者**雅克·吉贝尔伯爵**（Count Jacques Guibert），已经预料到组织和战术上的许多变化。他 18 世纪 70 年代的论著启发了人们努力清除一些臃肿的高级军衔，并逐步消除卖官鬻爵（venality），即购买军职的行为。吉贝尔似乎预见到一支公民军队，但鉴于贵族对军队的控制，他认为这几乎不可能实现，于是他主张对军官进行更多的技术教育，并在作战中提高机动性和大胆性。为了实现更快的行动，他敦

促部署师级编队（将步兵、骑兵和炮兵组合成独立单位），并依靠乡村供应部队，而不是笨重的补给车队。为了鼓励大胆，他主张将军们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并在开阔的纵队中进行灵活机动，然后再部署成火力线。5

这些思想大多只有在革命者扫除军官团的贵族统治后才能付诸实践。1789 年，军队中十名军官中有九名是贵族。1789 年 8 月废除卖官鬻爵（包括授予贵族地位的官职）；1790 年 6 月取缔所有贵族头衔；以及贵族军官的大规模移民，为军队沿着功绩和爱国主义路线进行全面革新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这些改革几乎立即开始，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开花结果。1790 年 2 月，国民议会代表要求每位士兵宣誓效忠国家、法律、国王和宪法，从而挑战了国王的最高权力。他们宣布士兵为公民；体罚，特别是用剑面进行羞辱性打击，被取缔。外国雇佣兵团解散，国民自卫军的志愿者们，带着选举军官的习惯，开始与老兵们合并。

如今，在选择上校及以上军衔时，资历变得重要起来。上校以前是购买其团级指挥权的，但此类购买主要留给在宫廷中露过面的贵族。政治现在也变得重要。军官们已经因其政治忠诚度而受到监督，政府保留了任命大多数将军的权利。到 1792 年，常备军比 1789 年的皇家军队更年轻、经验更少，只有 15%到 20%的军官是贵族（到 1794 年，这一比例降至 2%到 3%）。随着贵族军官的逃离，其他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到 1794 年，上校以下军官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来自中产阶级，无论是职员、艺术家、外科医生还是商人子弟；四分之一来自工匠和店主家庭；四分之一来自农民阶层。海军引入了竞争性考试来寻找潜在军官，这同样为社会晋升打开了大门，尽管不如陆军那样引人注目。1792 年至 1800 年间，海军招募的军官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贵族家庭、前海军军官或官员家庭，然而近一半的父亲是中产阶级，五分之一来自工匠家庭。即使在海军中，社会变革也在进行中。6

军队，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革新需要时间，而法国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海军的情况尤其困难，因为海军军官的培训需要数年。尽管海军的声誉因其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成功而得到提升，但它从未像陆军那样受到重视。1789 年，法国政府声称拥有 72 艘**战列舰**（sailing warships）和 63 艘**护卫舰**（frigates），但估计英国拥有 108 艘战列舰和 80 艘护卫舰。为了赶上，法国在 1783 年至 1793 年间下水了 38 艘新的战列舰，但英国则以 44 艘回应。兵变、纪律崩溃和贵族军官的逃离使海军处于特别绝望的境地，使得法国倾向于陆上作战。7

面对一支正在重组的军队，法国必须寻找新的方法。在激烈的战斗中，在完全解体的威胁下，他们发现了庞大人数的力量和民族的激励作用。法国常备军，不包括国王的各种私人部队和民兵，在 1789 年约有 15.5 万人。1791 年和 1792 年有多达 20 万人自愿参军，1793 年 2 月的征兵又征集了 15 万人。1793 年 8 月发布总动员令后，军队规模膨胀到 75 万人，至少官方是这样宣称的。招募过程远非顺利和有序：数千名最初的志愿者很可能是常备军的士兵，他们离开常备军，“自愿”参军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薪水和更短的服役期限。1793 年 2 月征兵后入伍人数之少，凸显了招募的困难；这次被称为“30 万征兵”的行动，由于逃避兵役甚至暴力抵抗，只招募到 15 万新兵。一个年轻人可以被宣布不适合服役，与他人一起暴动反抗当局，结婚，或花钱找人顶替。1793-94 年官方逃兵率在 4%到 8%之间徘徊，但在一些省份，逃避兵役率可能高达 50%。8

军队的迅速扩张给纪律带来了新的压力，纪律是对个人自主权的制约训练。随着贵族统治（以及因此而来的指挥权）的瓦解，常备步兵的普通士兵已经表现出不安。1790 年，兵变震惊了皇家军队；士兵们要求查看财务账目，并聚集讨论上级军官的优缺点。志愿兵的加入，他们将自己所谓的临时士兵

角色从属于永久的公民角色，只会增加讨论和解释的压力。当地的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s）邀请士兵参加他们的会议，1791 年 5 月后，代表们允许他们在下班后参加。尽管骑兵在 1789 年至 1794 年间规模也增加了两倍，并保留了君主制下的习惯更长时间，但步兵现在不仅可以质疑他们的指挥官，甚至可以质疑政府本身。9

在这种情况下，士兵们必须获得新的激励。爱国主义、对战友的忠诚以及与上级之间更私人化的关系使他们免于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瓦解。一位来自法国西北部的年轻志愿者，在瓦尔密（Valmy）战役后被派去跟踪普鲁士人，他哀叹敌人如何摧毁了乡村，但也感受到了他们政治侮辱带来的屈辱："他们殴打那些佩戴三色帽徽的贫苦农民，拔掉自由树[种植以表达对革命的热情]。"他报告说他和他的弟弟一切都好："我们为祖国服务的热情使我们能够勇敢面对一切，我们中没有人，无论付出任何代价，会希望没有离开家园。"他们的指挥将军，"公民杜穆里耶"（Citizenizen Dumouriez），祝贺他们表现出的勇气，并作为"奖励"选择了他们去征服比利时。10

然而，普通士兵与将军之间的关系只能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普通士兵渴望与他们的领导人建立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只能怀疑那些长期以来坚持其社会优越感的贵族们的政治忠诚度。一位名叫路易·布里卡尔（Louis Bricard）的巴黎志愿者回忆说，瓦尔密战役一周后，杜穆里耶（Dumouriez）带着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的两名代表来到他们的营地，宣布代表们已经废除了君主制并建立了共和国。部队以"共和国万岁！"（Vive la République!）和"杜穆里耶万岁！"（Vive Dumouriez!）的呼声迎接他们。到 11 月中旬，这支志愿营在比利时村庄里种植自由树，并与当地居民跳舞。但在 1793 年 4 月，当杜穆里耶叛逃到奥地利并试图带走他的军队时，布里卡尔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追随他。他们零散地返回巴黎，并在途

中被捕，但随后被释放，重新加入军队。1793 年 7 月，国民公会的代表向部队宣布逮捕了北方军新司令库斯蒂纳将军（General Custine）；布里卡尔确认军队“保持着最阴沉的沉默，[并]在面对敌人时，对自己不断被背叛感到悲伤和沮丧。”11

库斯蒂纳（Custine）出身伯爵，是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和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的老兵，他被解除了指挥权，因为他未能解除一座主要要塞的围困，这似乎证实了人们对他忠诚度的怀疑。他于 1793 年 8 月被判叛国罪并被送上断头台。他并非个例。1793 年，不少于 198 名将军和海军上将被捕，其中 31 人被送上革命法庭，16 人被判刑，15 人被无罪释放。1792 年至 1815 年间，共有 2200 多名男子担任将军或海军上将；其中 124 人被判处死刑，其中一半发生在 1793 年和 1794 年，正值对贵族军官不信任的最高潮。因此，将军们有时试图拒绝晋升，例如从准将晋升为少将，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担心增加的责任也会使任何缺点更容易被政治当局发现。12

布里卡尔（Bricard）的叙述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初期士兵经历的三个关键方面。他认同“军队”整体，尽管他自己的决定受他身边亲近之人的反应影响（他们一起逃离）。他对国家忠诚，但难以理解这意味着什么。面对许多将军的不可靠，像他这样的普通士兵不得不依赖谣言或国家政府派出的官员提供的解释。为了解决像布里卡尔这样的士兵的不确定性，专门为特定军队印刷的廉价报纸于 1792 年 4 月开始出现，1793 年春季，政府开始向士兵分发国家政治期刊的副本。为了表达他们对部队的个人关怀，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的代表们命令将他们的官方《公报》（*Bulletin*）在士兵中传阅，并经常张贴在营地公告板上。但即使战争部购买了数百万份不同的爱国报纸并将其送往前线，令人惊讶的是，仍有大量报纸从未到达士兵

手中，部分原因是邮政系统困难以及军队不断调动，但也有一些指挥官不满这种干预。13

战争几乎总能提升平民的爱国主义，但与敌人作战对士兵来说却具有更强大的激励作用，因此，尽管政府的宣传努力必然未能完全达到目的，但那些在前线作战的人却将保卫国家视为他们的生存理由。一位来自法国东北部的园丁之子、身经百战的志愿兵**雅克·弗里卡斯中士**（Sergeant Jacques Fricasse），通常只在他的日记中记录战斗的起伏，但在 1794 年 5 月下旬，他却能雄辩地谈论战友们的爱国主义："我看到在这场战斗中，勇敢的共和党人身负重伤，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仍聚集所有力量，向前扑去亲吻帽徽，那是我等所征服之自由的神圣象征。我听到他们向天堂献上对共和国军队胜利的炽热祝愿。"14

一位来自法国东部的志愿者**弗朗索瓦-泽维尔·若利克莱尔**（François-Xavier Joliclerc），在强调自己爱国情感的同时，也捕捉到了周围人更复杂的情绪。1793 年 12 月，他有些恼怒地写信给他的寡母，因为她不惜一切代价要他退伍。他列出了三个无法退伍的障碍：很难找到替代者，即使你出高价；征召年龄很快就会从 18 到 25 岁扩大到包括 35 岁以下的人，所以无论如何你都会损失为替代者支付的钱；最后："当祖国召唤我们保卫它时，我们应该像我跑向一顿美餐一样飞奔而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技能都不属于我们自己。所有这些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他承认他的家乡有许多人并不抱有同样的情绪，但对他而言，"我是在信仰和思想自由中长大的，即使被迫生活在君主制下，我的精神上也一直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这些对祖国、对自由、对共和国的热爱原则，不仅铭刻在我心中，而且已深深扎根，只要那位主宰一切的至高存在乐意维持我一息生命，它们就将永远存在。"15

若利克莱尔（Joliclerc）可能试图超越许多战友们矛盾的情绪，但在许多战斗人员的信件中，那些积极的表述之下，隐藏着一系列必然冲突的情感。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多德曼**（Thomas Dodman）最有力地指出，普通人不可能轻易或毫无压力地完成将自己重新塑造为革命公民的过程。他们一生都是国王的臣民，是受贵族特权支配的社会成员。虽然俱乐部、报纸，甚至在全国选举中投票的新奇体验无疑影响了法国国内人民（包括女性）的观念，但志愿者们从他们的军队经历中学习到的东西同样多，甚至更多。他们与八到十名战友分享食宿，一起训练，并肩站岗和战斗。他们的观点在与战友、军官、当地人、来自巴黎的特工和信件交流中，以及与家人书信往来中逐渐形成。16

尽管如此，他们仍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局势感到焦虑。1792 年 7 月 17 日，来自法国中部一个志愿营的军官**吉尔伯特·法维耶**（Gilbert Favier）写信给他的母亲，抱怨对拉法耶特（Lafayette）日益增多的攻击，拉法耶特因其早期对革命的支持而受到许多志愿者的钦佩。“我希望能看到证据表明拉法耶特有罪，”他坚持道：“我们军队的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对将军抱有最大的信心，我们不想要两院制[立法机构]，我们根本不想要共和国，我们想要我们的宪法，我们宁死也不会让任何人损害它；如果他有能力考虑改变它，我们自己也会反对拉法耶特。”拉法耶特直到 8 月 19 日才投奔奥地利，此前 8 月 10 日的起义导致国王及其家人被软禁。情绪迅速转变。一旦部队得到 9 月宣布共和国的消息，法维耶在他的信件中添加了一个新的标题；现在“自由第四年”与“共和国第一年”并列。几个月后，法维耶准备相信杜穆里耶（Dumouriez）最坏的一面，杜穆里耶于 4 月 5 日投奔了奥地利。他将共和国面临的每一场灾难都归咎于他。到那时，法维耶已经采纳——或者至少声称已经采纳——了“正在被揭露的可怕阴谋”这种日益普遍的措辞。17

在这种情况下，新晋将军们，尤其是那些迅速晋升的军官们，很快就明白了以新方式与部下保持联系的必要性，他们与拉法耶特（Lafayette）和杜穆里耶（Dumouriez）不同，与部下几乎没有区别。**拉扎尔·奥什**（Lazare Hoche）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他是一个在凡尔赛宫皇家狗舍卫兵的儿子，由卖菜的姑姑抚养长大，1784 年十六岁时入伍皇家军队的法国卫队，五年后仍是一名卑微的下士。1789 年后，他从下士晋升为上尉（1792 年），然后是副将（1793 年），这一切都在二十五岁之前完成。1793 年底，他被任命为摩泽尔军团（Army of the Moselle）的师长。他在 1793 年 11 月的一封信中向军官们阐述了他的原则："每天视察部队，提供他们最迫切的需求，重燃信心，维持纪律并加速其进展，提高当前的爱国主义程度——我相信，这些是我们必须不懈努力的事情。"他强调要关心士兵们。"友善地听取士兵的抱怨：这个受人尊敬的阶层是军队中最纯洁的，[所以]要公正行事，并在任何情况下严惩任何级别的罪犯。"18

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贵族，如库斯蒂纳（Custine），也很快学会了赢得部队的喜爱。库斯蒂纳的一位参谋人员**洛朗·德·古维翁·圣西尔**（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多年后回忆道，库斯蒂纳在 1792 年和 1793 年的战场成功为他赢得了"部队的完全信任"。库斯蒂纳激发了真正的感情："他向他们训话的方式，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军人风范，即使因为他那巨大的胡子显得有点滑稽，都对激发士兵们对他本人的热情贡献不小。我从未见过如此受人爱戴的将军。"圣西尔在 1792 年秋天，在画家和演员事业失败后，自愿入伍。他几乎立刻被选为少尉，不久后升为上尉。一年之内，他晋升为副将。后来，他作为拿破仑麾下的一名将军声名显赫，被封为帝国伯爵和元帅，并在路易十八（Louis XVIII）复辟后被提升为侯爵和战争大臣。19

最普通的士兵获得了多种晋升机会。对于像圣西尔（Saint-Cyr）这样早期选择军官的志愿者来说，晋升立即开始。例如，在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地区，1792 年 9 月一个营的军官选举中，33 岁的**纪尧姆·吉尤**（Guillaume Guiut）被选为中校，他曾在皇家军队服役 15 年，但从未超过中士军衔。一个营由两名中校指挥，下辖九个连。榴弹兵连连长选举产生了 37 岁的退役士兵**皮埃尔·韦尔热**（Pierre Verger），他曾在皇家军队服役 10 年，于 1784 年退役。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一年内被任命为少校，随后晋升为副将。他曾担任过多种不同的总参谋部职务，最终于 1797 年晋升为准将。虽然 1792 年从志愿者中选出的中校有一半有军事经验，但另一半则没有。例如，吉尤的副手是 23 岁的**让-雅克·迪布瓦**（Jean-Jacques Duboys），他是一位公证人的儿子，唯一的经验是国民自卫军，这是一支 1789 年在法国各地自发组建以维持秩序的民兵组织。20

1795 年 3 月初，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首席军事专家兼前陆军工程师**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以充满溢美之词的口吻总结了法国的成功：

所有旧的惯例，所有军事偏见都在这场战争中被推翻了。看到共和国最重大事件的记录中，那些武装简陋、不习惯军事训练、除了信心之外没有任何训练、常常缺乏衣物或食物的新兵，是如何阻止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针对他们的军团洪流的；那些只想爱与坦率的好农民，被迫为保卫家园而战，由他们中间选出的领导人带领，齐声歌唱自由之歌，如何战胜并驱散了那些由所谓的军事科学精英贵族所驱动的沉默而狡猾的乌合之众，这将是一幅美丽的画面。

法国的胜利部分依赖于其将军们的领导，“这些谦逊的人，出身于一个曾经被鄙视的阶级”，但他们却“突然超越”了前几个世纪所有伟大的将军。毋庸置疑，将军们及其部下之所以能获胜，部分原因在于像卡诺这样的人的组织能力。21

然而，这不仅仅关乎信心、同志情谊或领导力。战略和战术都在不断演变，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日益增长的兵力。这种演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发生的，新任命的军官们试图应对一支由志愿者和旧政权留下的常备军**不稳定组合**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军队。然而，鉴于当时局势的不确定性，新的共和政府经常干预战略甚至战术问题，并在 1793-94 年的危机年代干预最为频繁，当时代表们被派往各军队，监督从物资到将军们做出的决策的一切事务，这或许不足为奇。政府的干预导致了一个悖论。将军们必须向那些常常彼此矛盾的政治家和行政人员负责，从而造成混乱和无序。但尽管存在动荡，或者也许正因为这种动荡，政府官员能够对军事决策施加前所未有的权力。

由于 1792 年 9 月选出的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没有用替代行政权力来取代国王，军事事务可能落入一系列不同官员的管辖范围，包括由公会任命的**战争部长**；由公会 12 名代表组成的**公共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军事委员会**（1792 年 9 月后并入战争委员会）；被派往各地的代表；以及在巴黎全体开会的代表。1789 年 7 月至 1794 年 4 月期间，法国共有 13 位不同的战争部长。由于管理军事事务的人手众多，军队组织多年来仍处于不断完善中，这毫不奇怪。最基本的安排不断被辩论，并逐渐确定下来。吉贝尔（Guibert）关于军队应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独立单位组成的师级编队的重要建议，在 1789 年之前只部分实行，1789 年他仍不得不为其辩护，以对抗军官团的抱怨。22

一旦君主制被共和制取代，统一最终得以实现。1793 年 2 月初，曾是士兵的代表**埃德蒙·杜瓦-克兰塞**（Edmond Dubois-Crancé）阐述了战争委员会重组军队的“精确形式”计划。这意味着将常备军的每个营与两个志愿营合并，组成一个“**半旅**”（demi-brigade），每个半旅都将配备一个炮兵连。之所以称为半旅，是为了避免旧制度中“**团**”（regiment）的含义。每个旅将设有一名准将，每个师将设有一名中将、一名副将、两名副官和一名战地督察。这些军官负责确保上级命令的执行。最重要的创新是将炮兵连附属于半旅，而不是将它们集中在军队指挥官的控制之下。23

杜瓦-克兰塞（Dubois-Crancé）的报告还呼吁将**骑炮连**（horse artillery）扩编至二十个连，这是革命扫除先前改革障碍的又一例证。骑炮兵由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于 1759 年引入，但法国官员直到 1792 年才批准其设立。骑炮兵的数量迅速增加，从 1792 年 1 月的两个连（每连六门炮）到 1793 年夏天达到三十个连。骑炮兵比传统步炮兵具有多项优势。炮组人员骑马或乘坐弹药车，而不是徒步随行，因此装备可以更快地机动，从而可以在战斗中调动备用火炮，就像瓦尔米（Valmy）战役中发生的那样。24

骑炮兵使得**让-巴蒂斯特·瓦凯特·德·格里博瓦尔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Jean-Baptiste Vaquette de Gribeauval）推出的所有火炮改进更加有效。格里博瓦尔自 1764 年担任炮兵总监后，通过改变火炮的制造方式，在不牺牲射程的情况下，减小了大多数野战火炮的口径和重量。他还引入了榴弹炮并改进了迫击炮。尽管他偏爱骑炮兵，但他并没有力推，因为他其他的改革多年来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革命消除了这一障碍，尽管骑炮兵本身存在问题——最初使用几乎没有炮兵训练的骑兵军官——但它很快赢得了辉煌的声誉，尤其是在对抗敌方骑兵方面，敌方骑兵在数量和训练上几乎总是优于法国骑兵。

事实证明，由于所需的准备工作，替代移民的骑兵军官很困难，而且一旦战争切断了外国市场，为骑兵征用马匹就尤其具有挑战性。1792 年，当**约阿希姆·缪拉**（Joachim Murat，未来的波拿巴助手和那不勒斯国王）加入一个轻骑兵团（chasseurs）时，他不得不支付 2000 里弗尔（livres）来装备自己，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费用。骑炮兵也被证明对法国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步兵志愿者缺乏在预定顺序中开火所需的训练。正如库斯蒂纳（Custine）在 1792 年底抱怨的那样："我们的步兵火力毫无作用，我们的大炮和刺刀，才是我们唯一的武器。"25

围城战和阵地战被运动战所取代，后者依赖于当地的补给来源。这一变化得到了瑞士军事理论家**安托万-亨利·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最好的解释，他曾在拿破仑和俄国人手下担任将军。他写道，从中世纪到法国大革命，阵地战——庞大的军队营地围攻或防御固定的、通常是设防的地点——一直主导着军事战略。1792 年战争以同样的精神开始，但当法兰西共和国在 1793 年发现自己受到国内外多线攻击时，战争突然改变了。拥有百万大军（若米尼的夸大之词）和多支没有帐篷、没有补给站、没有钱的军队，机动性的必要性反而变成了优势。战术也发生了变化：相对紧凑的纵队优先于广泛分散的阵线，部分原因是可以利用散兵线掩护纵队的行动。"这个系统，"若米尼总结道，"就这样因环境而生，最初的成功超出了所有预期；它打乱了普鲁士和奥地利有条不紊的军队。"26

瓦尔米战役（Valmy）中最为明显的防御，似乎已不再足够，1793 年，巴黎的官员们开始坚持将军们采取攻势。1794 年 4 月的一封信，极有可能由**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执笔，其中的思想清晰可见："防御姿态对法国的价值观来说始终是有害的，因为那是懦弱军队或懒惰民族的表现。进攻姿态是唯一适合民族气质的姿态，而'**法兰西之怒**'（*furia francese*）不能仅限

于防守堡垒和固守阵地。”“法兰西之怒”并非新词——它可追溯到 15 世纪末——但现在它被期望以新的形式呈现。27

尽管若米尼（Jomini）坚持认为法军主要依靠纵队，并辅以散兵掩护，但即便他们的对手也认识到，法军会根据快速变化的战况交替使用战术。德国军官**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von Scharnhorst）惊叹道：“法军被迫处于自身境地，并得益于其民族天赋，发展出了一套实用的战术体系，使其能够在开阔或崎岖的地形上，以疏散或密集队形作战，但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种体系。”与冯·沙恩霍斯特对法军缺乏认识的评估相反，一些法国军官掌握了这种战术交替体系的必要性，这在多年前就被吉贝尔（Guibert）预见到了。圣西尔（Saint-Cyr）将对散兵的重视解释为，鉴于新兵无法适应传统的三线射击实践，这是合乎逻辑的回应。他批评了 1791 年 8 月的《步兵操练与机动条例》（*Regulation concerning the Drill and Maneuvers of the Infantry*），该条例一直沿用到 1831 年，因为它“更适合在阅兵式上让部队出彩，而在面对敌人时则不实用。”28

根据 1791 年条例，第一线士兵应跪姿射击，第二线士兵站立在其后方射击；第三线士兵则负责为第二线重新装填枪支。根据规定，装填标准滑膛枪需要十二个步骤。圣西尔（Saint-Cyr）坚称，在激烈的战斗中，所有这些规定都抛诸脑后：“在战争中，士兵们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开火，不会把枪交给战友，也不会跪下。”结果，“在最初的几次战役中，我们只进行了散兵战，……[而且]这种新系统取得了一些成功。”士兵们，尤其是志愿者们，抱怨对操练的过度关注。一位来自法国东部的志愿者**加布里埃尔·诺埃尔**（Gabriel Noël）写信回家说：“我不认为他们有助于发展那些一生都在练习的人的智力。”他形容他的少尉，一位老兵，是个“好小伙子”，但坚称尽管这位军官“肯定知道如何进行操练……但他只知道这些。”29

然而，灵活性，无论是疏散队形还是密集队形，或不同形式的密集队形，并不意味着缺乏协调。在对 1792 年至 1794 年间北方军战术的详细研究中，历史学家**约翰·林恩**（John Lynn）指出，这支关键的军队利用了所有可用的工具，并根据情况选择了最合适的工具。这包括散兵的独立行动，也包括支援密集队形的部队，例如，杀死敌方炮兵的炮手，或为大规模刺刀冲锋开辟道路。但选择并不仅限于散兵；线阵、纵队和方阵都得到了部署，正如吉贝尔在他坚持务实的“混合阵型”时所主张的那样。步兵在防御或等待交战时呈线阵。方阵需要训练，用于击退骑兵（有时也可由炮兵组成）。纵队排列有利于快速推进。刺刀冲锋的攻击纵队用于扭转战局，但只有在纵队能够到达敌人阵地并避免致命的炮火攻击之前，才能取得成功。30

尽管法国人可能依赖即兴发挥和个人主动性，但最敏锐的观察者能够看到所需：一场**大规模战争**，即发展一支庞大的军队，其中士兵可以单独和集体地做出反应。1792 年末或 1793 年初，皇家军官**菲利普·德·格里莫阿德伯爵**（Count Philippe de Grimoard）向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提交了他的评估。鉴于许多代表希望将英国、荷兰共和国和西班牙列入敌人名单（他们于 1793 年初做到了这一点），法国必须想办法利用那些缺乏训练、纪律、帐篷和给养的人员，去对抗拥有 75 万人军队。格里莫阿德认为成功的途径是“**进行一场群众战争，即始终将尽可能多的部队和炮兵集中在攻击点上**。”他坚持认为，将军们必须留在他们的部队前方，以身作则激励他们。鉴于缺乏训练，线阵射击和常规机动将毫无用处。士兵们必须“**用刺刀猛然扑向敌人**。”即使士兵们获得了训练，刺刀突击仍然是核心。31

“群众战争”的理念最初可能模糊不清，但很快就在将军、代表和部长中获得了追随者，因为它与革命原则产生共鸣，同时也满足了作战的即时挑战。例如，1793 年 8 月下令的全国总动员，就以“**大规模征兵**”（*levée en masse*）

闻名。在 1793 年 10 月 10 日的一次重要演讲中，代表兼罗伯斯庇尔的狂热追随者**路易·德·圣茹斯特**（Louis de Saint-Just）明确提到了法国的“战争体系”：“如果在这场战争中，法兰西民族被所有强大而慷慨的激情所推动，对自由的热爱，对暴君和压迫的仇恨；如果，相比之下，其敌人是雇佣兵奴隶，是没有激情的自动机器；那么法国军队的战争体系必须是‘**冲击秩序**’（*l'ordre du choc*）。”32

尽管圣茹斯特（Saint-Just）没有明说，但法军现在经常进行**大规模刺刀冲击**，作为弥补骑兵不足的一种方式，直到 1794 年骑兵仍效率低下。起初，将骑兵编入师级部队稀释了其力量，直到 1794 年才逐渐恢复其侦察功能和快速冲锋敌人的能力，刀剑在手。当新步兵招募缺乏滑膛枪时，政府甚至暂时恢复了长矛，法国军队早已放弃了长矛。卡诺（Carnot）在 1792 年 7 月作为立法议会代表时主张这一举措。他提醒他的同事们，长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都同样有效，因为它比刺刀更长，并且他坚持认为它特别适合法国人，因为他们比射击滑膛枪更能熟练地使用刀刃武器（arme blanche）。随着滑膛枪供应的改善，长矛消失了，但刺刀冲锋的使用仍然是法国战术的关键。33

面对未经训练的部队和日益扩大的作战距离，将军们不得不设法应对，战术上的临时应变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自旧制度末期以来，火炮并未改变；改变的是心态。临时应变可以在新兵的训练方式中找到痕迹。更快的行军速度将使得更大的机动性成为可能，因此教官们几乎立即从 1791 年条例规定的每分钟 76 步，提高到每分钟 90 步，使其成为常规行军节奏。每分钟 120 步的冲锋速度一直被规定用于冲锋敌人，但现在也被命令用于变换阵地或组成纵队。34

战术创新和个人主动性在**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身上达到了顶峰，他 1796-97 年的意大利战役（Italian campaign）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在此之前，他已在 1793 年秋天的土伦围城战（siege of Toulon）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炮兵上尉。波拿巴出身于科西嘉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曾在法国军事学校学习，于 1785 年被授予少尉军衔。他曾梦想在海军服役，选择炮兵部分原因在于，在旧制度下，炮兵是少数几个可以凭才能而非裙带关系和财富获得晋升的军事部门之一。革命开始后，波拿巴确实受益于政治关系，特别是他与某些特派代表和巴黎政治人物的联系。但如果他没有展现出卓越的能力，这些联系作用甚微。在土伦，他在前任负责炮兵的上尉受伤后接管了指挥权；当时波拿巴正带着一支军用物资车队经过附近。通过巧妙地部署炮台，他打破了英国对港口的控制，并迅速晋升为准将。在行动中两次负伤，他的领导力与格里莫阿德（Grimoard）关于指挥官应以身作则激励部下的主张相符。35

1796 年 3 月，在晋升师长仅五个月后，波拿巴（Bonaparte）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总司令。他曾在早前意大利军团的考察中仔细研究过地形，现在他制定了自己标志性的战役策略：尽早发起决定性战役，以阻止敌军（本例中是奥地利人和皮埃蒙特人）会合；分别击败他们以保持兵力优势；快速行军，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并无情追击败兵。几周之内，他率领一支不到 4 万人的乌合之众，征服了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奥地利首相**图古特**（Thugut）在 1796 年 11 月抱怨道：“当人们意识到波拿巴，一个 27 岁的年轻人，毫无经验，军队只是一群强盗和志愿者，兵力是我们的一半，却击败了我们所有的将军，人们自然会为我们的衰落和堕落而悲叹。”36

成功将给法国军队和政府带来新的问题。随着他们击退敌人，法国人承诺将以法兰西共和国的模式解放被征服土地上的人民，但这一承诺很快就变

得空洞。尽管法国军队努力镇压士兵随意进行的抢劫，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征用艺术品或索要现金、黄金和白银，常常扣押当地人质直到付款。征用马匹、骡子、牛和粮食经常激起农民反抗，尤其是在 1796 年的意大利各邦。法国士兵自己也认识到他们的通过造成的损害。那位报告 1792 年在比利时与当地人跳舞的炮兵志愿者，悲伤地评论了 1796 年军队推进莱茵兰（Rhineland）造成的损害："我们的行军摧毁了已经长势良好的庄稼；我悲伤地看到，掠夺使当地居民变成了我们的敌人，这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挫折。"37

只要不满演变为武装抵抗，法国的严酷镇压就会造成长期的怨恨。1798 年 10 月，开罗人民起义，杀死了约 300 名法国士兵，法国人随即用炮火反击，至少造成 3000 人死亡，并砍死了几名重要的囚犯。1799 年 3 月，法国占领巴勒斯坦的雅法（Jaffa）后，处决了 4000 名土耳其俘虏；雅法总督对他们的投降要求的回应是斩断了法国使节的头颅。法国士兵对当地居民几乎没有亲近感，当地居民为那些偷窃法军营地或残害与部队失散的战友的人提供掩护。一位少尉写道："这些狂热而宿命论的人民只听从武力，这是他们的最高法则。"法国在中东的暴行预示了 1802 年勒克莱尔将军（General Leclerc）在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的暴行，他建议对山区的黑人进行一场"灭绝战"，这与在国内旺代（Vendée）对叛乱分子发动的战争如出一辙。38

埃及入侵最终拖垮了法军，但并未拖垮其指挥官。英土联合舰队一离开埃及海岸，波拿巴（Bonaparte）便秘密集结了三位主要将领——**缪拉**（Murat）、**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和**让·拉纳**（Jean Lannes）——以及他新任的马穆鲁克仆人，和大约 200 名士兵，于 1799 年 8 月 22 日乘坐一支小型护卫舰中队启程前往法国。由于逆风造成的延误，他于 10 月 16 日抵达巴黎，沉浸在他刚刚收到的阿布基尔（Aboukir）战胜土耳其人的消息中。他留下的三万士兵两年后才得以返回。

不到一个月，尽管他在推翻督政府的计划中笨手笨脚，波拿巴（Bonaparte）仍在新政府中成为第一执政，他很快将主宰这个政府。1799 年 11 月 9 日和 10 日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件，尽管并非军事政变，但仍是一场政变。文职政府中的一些元素与一些军人结盟，建立了一个由将军领导但几乎完全由文职人员组成的独裁政府。波拿巴因其在意大利和埃及战役后的受欢迎程度而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他通过巧妙地撰写前线公报，美化了自己作为征服英雄甚至救世主的形象。这位在意大利一支被认为是次要军队中相对缺乏经验的指挥官，成为了法国最著名的人物。但波拿巴并非唯一可能的选择，如果没有贝尔蒂埃（Berthier）和缪拉（Murat）的协助（他们帮助争取了巴黎的其他军官），以及拉纳（Lannes）指挥巴黎部队，他不可能上台。39

这场政变将一位将军推上了权力宝座，他将稳步为他的文职政府争取一系列独裁权力。波拿巴（Bonaparte）利用了共和政府的弱点，但他对权力的追求最终源于军队内部发生的变革。1789 年后的最初几年，平民曾担心军队内部可能出现反革命，但 1794 年以后，军队日益认为自己优于被视为受私利驱动的公民社会。40

1791 年至 1794 年间，志愿兵的融合使军队民主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平民化，但随着军队在法国境外和战场上花费更多时间，它变得更加专业，并更认同将军和军事荣誉。到 1798 年，只有 3%的士兵曾在皇家军队服役；28%是志愿兵，而其他人则被征召入伍。尽管有些人，例如波拿巴，可能认为军队需要重建公民社会，但军队的专业化也确保了它在 1799 年 11 月政变中的政治被动性。大多数知道有事情正在酝酿的军官只是等待，看看会发生什么。**威权民粹主义**——依赖公民投票、宣传、警察特务和严格控制新闻而

非蛮力或恐怖——是波拿巴及其最亲密顾问的临时创造，但它的出现得到了军事文化变化的促进。41

波拿巴（Bonaparte）三位最亲密的军事顾问的轨迹，印证了这些观点。缪拉（Murat）在政变关键时刻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手持刀剑，率领部队驱散了那些谴责波拿巴为“暴君”和“独裁者”的立法者。“把那些混蛋赶出去，”他命令道，于是代表们逃散了。一个残余的立法机构任命波拿巴为新政府的三位领导人之一，但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波拿巴已掌控一切。三个月后，缪拉（他于 1799 年 7 月在埃及阿布基尔战役中被任命为师长）娶了波拿巴十八岁的妹妹卡罗琳。

这位三十二岁的将军，出生在法国西南部一个旅店老板的家庭。作为家中十一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缪拉（Murat）本被安排进入天主教会，但他因行为不端被开除后，于 1787 年加入了骑兵队。在修道院接受了扎实的教育后，革命爆发使他回到了家乡，他迅速从列兵晋升为军需官中士。他协助训练了当地的国民自卫军，并于 1791 年重新加入骑兵队，正值许多高级军官移民之际。1792 年晋升为中尉，1793 年晋升为上尉，随后又晋升为少校，缪拉成功地将辛勤工作和战场上的勇敢声誉与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地点的才能结合起来。1795 年 5 月，他的部队平息了巴黎最后一次左翼叛乱，10 月，他在击败右翼起义中提供了关键协助。10 月负责指挥的人正是波拿巴（Bonaparte）。缪拉的奖励是晋升为上校，并在意大利战役中进入波拿巴的总参谋部。在那里，他的大胆和对部下的强大感染力使他获得了持续的关注。波拿巴反复将他用作私人特使，28 岁的缪拉已经是一名准将。42

与几乎没有受过战伤的缪拉（Murat）不同，拉纳（Lannes）浑身是伤痕，最终在 1809 年战死。他是法国西南部一位农民的儿子，1792 年参军时

正在学染布手艺。他立即被选为掷弹兵（步兵精锐部队）的少尉。尽管最初学识甚少，也未经训练，但他几乎是鲁莽的胆量，带领他所被派往的任何部队的先锋，使他也能迅速晋升，于 1796 年成为准将，1799 年成为师长。1796 年 5 月，当拉纳还是上校时，波拿巴（Bonaparte）就开始在他从意大利发给巴黎政府的电报中提及拉纳的勇气，并且他很快就赋予拉纳与准将同等的任务。到 5 月底，波拿巴已将他调到自己的总参谋部，担任安全主管。1799 年政变期间，拉纳负责监视巴黎，之后他被任命为西南部两个师的指挥官，负责镇压任何对新政权的抵抗，但他很快报告称几乎没有异议。43

波拿巴（Bonaparte）自 1796 年以来的参谋长**路易-亚历山大·贝尔蒂埃**（Louis-Alexandre Berthier）的职业生涯，是证明规则的例外。他年纪更大——1789 年时 36 岁——且出身更显赫的家庭。他的父亲虽然不是贵族，但因其在军队中担任地形工程师的职位而与王室关系密切；他曾为路易十五（Louis XV）和路易十六（Louis XVI）绘制地图，并晋升为中校。他的儿子十几岁时参军，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于 1788 年自己也晋升为中校。然而，贝尔蒂埃在 1792 年春季担任拉法耶特（Lafayette）参谋长的经历以及其家族与君主的历史引起了怀疑，贝尔蒂埃在 1793-94 年期间一度被停职。他被恢复为准将，即他被停职前的军衔。

到 1796 年初，当波拿巴选择他担任参谋长时，贝尔蒂埃已经成为一名师长。他把握任何复杂情况的能力，以尽可能推行进攻性战略，使他成为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而他与拉纳（Lannes）和缪拉（Murat）等人的共同战场经历也建立了持久的纽带。例如，在 1796 年 5 月的**洛迪战役**（Battle of Lodi）中，他和拉纳是那些跳到一支轻步兵纵队前头，该纵队在攻击一座关键桥梁时开始动摇。战后，波拿巴向巴黎政府报告称，“无畏的贝尔蒂埃……在这一天是炮手、骑兵和掷弹兵。”在使波拿巴上台的政变中，贝尔蒂埃继续扮演参

谋长的角色，仔细记录那些可能同情政变的人，并在每一个决定性时刻提供精神支持。波拿巴一上台，就任命贝尔蒂埃为战争部长。44

危机中的军队为个人主动性开辟了新的空间，但这些个人能力被导向了新的目标，因为军队在距离和持续不断的战斗中发生了转变。凭借其领导才能和美化形象的技巧，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首先成为其士兵心目中的偶像，然后尽管其科西嘉血统（科西嘉在波拿巴出生那年，即1769 年成为法国的正式省份）却成为了法国可靠的统治者。他能够达到这些高度，是因为法国军队越来越多地在法国境外长期作战，而且在服役多年之后，士兵们，特别是志愿者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暂时拿起武器的普通公民，而是认同为职业士兵。拉纳（Lannes）本人就是一名志愿者，他在 1799 年12 月写给波拿巴的信中捕捉到了一种无疑在波拿巴最亲密的助手们中广泛存在的感觉："雾月 18 日革命[1799 年 11 月政变]的特点之一是只有你能做到这一点。……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人们既不喊'莫罗万岁！'也不喊'西哀士万岁！'而是喊'波拿巴万岁！'！"45

拉纳（Lannes）经常写信给妻子，表达对和平的渴望，但直到 1805 年之后，当他个人对拿破仑（Napoleon）感到失望时，他才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拿破仑对感情朝三暮四，不愿分享自己的荣耀。1799 年之后，法国政府的状况几乎从未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拉纳活得不够久，未能从拿破仑 1808 年授予他蒙泰贝洛公爵（Duke of Montebello）的称号和一笔可观的收入中获得多少好处。拿破仑从不只依靠个人魅力。从他加入意大利军团的第一天起，他就学会了恩庇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恩赐只会越来越惊人。功绩仍然重要，但拿破仑作为最高统治者对其自身合法性的脆弱感需要不断加强。46

在革命军队中，个人主动性和社会归属感常常协同作用，但有时也相互冲突。法国人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功，是因为革命对个人能力产生了新的期望，普通人争先恐后地展示这些能力。然而，归根结底，成功也取决于在特定战役中拥有最大规模的军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主动性和大规模编队作用的战略；以及新颖的征用、制造和人员动员形式。凭借这些新的资源和能力，法国人最终占据了上风，却发现他们无法再控制已被释放的力量。解放变成了占领，保卫祖国演变为帝国扩张，七年近乎不间断的战斗和一百多万人的死亡，最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政治形式的形成：由一位将军——拿破仑·波拿巴——领导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这个新政权将个人主动性和国家资源转移到国家和拿破仑的荣耀上。因此，自主的自我与无处不在的社会制约之间的张力在战时达到了令人痛苦的程度。普通士兵通过发挥个人主动性，可以获得以前无法想象的晋升，但他们对国家和魅力上司新产生的忠诚也促使他们接受日益独裁的权力。

第五章

金钱、私利与共和制的建立

个人自主与社会归属之间的关系，在武装部队的案例中可能最为致命，因为生死往往在此一搏，但在政府财政方面，这种关系（现在也是）更为矛盾。没有人想纳税，然而国家习惯性地以集体利益的名义，通过征收各种税费来侵犯个人。口号“无代表不纳税”捕捉了英属北美殖民者在独立前对他们与大英帝国关系的抱怨，它也指向了一场正在酝酿中的深层民主革命：政府越来越需要通过声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国家并对其负责来证明税收的合理性。强化个人与国家之间这种基本联系的，是**国债**的建立，当国债得到个人购买债券或股票的支持——而不是国家仅仅向银行家借款——并且政府向其公民债权人提供相对透明的资产负债表时。有了普通公民支持的国债，可以说人民拥有他们的政府，或者至少投资于其运作。通过这种方式，个人追求自己的经济私利，同时也通过分担支持国家债务的风险而融入社会归属感。

我们现在认为国债几乎与税收一样理所当然，因为国债已被证明对代议制政府的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大多数18世纪的欧洲人和北美洲人并不认为国债是可取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即使在今天，国债规模仍然是一个问题，这种厌恶可能并不令人惊讶。每个人都希望减少国债，以避免给后代带来负担并限制他们的选择。1752年，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审视了国债造成的各种缺陷：它以牺牲各省为代价将财富集中到首都；公共债券（休谟称之为股票）是一种纸币形式，排挤了黄金和白银，使所有东西变得更贵；为了支付债务利息，税收不得不增加，从而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并压迫穷人；外国人可以购买国债，使国家成为他们的附庸；公共债券的所有权鼓励懒惰，因为它奖励那些拥有纸质资产而不是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他总结道："**要么国家摧毁公共信用，要么公共信用摧毁国家。**"1

休谟（Hume）呼应了法国法学家兼哲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观点，孟德斯鸠在1748年的《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中列举了他自己的一系列"不便"：外国人将债务利息从国家中取出；一个永久负债的国家汇率低下；为支付债务利息而提高的税收通过抬高劳动力价格损害了制造商；以及，在休谟也呼应的一个论点中，债务将国家的收入从勤劳者手中夺走，交给了懒惰者。"这些是不便之处，"孟德斯鸠坚称，"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新成立的美国和革命法国的公民也持有这些观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802年第二次向国会发表年度讲话时，将偿还国债称为"使我们的后代摆脱那种道德癌症"。就法国革命者而言，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时，他们立即开始讨论国王的债务。他们谈论的是其清算、偿还和摊销，很少提及担保。他们希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偿清债务，而不是让其永久存在。2

正如休谟（Hume）的分析所阐明，国债之所以成问题，是因为它需要对某种形式的纸币进行投资。纸币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有着漫长而饱受争议的历史。美国在 1862 年才将联邦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定货币，而且仅仅是因为内战耗尽了国库，从这一经验中可以看出要克服的巨大困难。“法定货币”意味着公共和私人债权人必须接受纸币作为支付。法国在 18 世纪早期曾尝试过纸币，当时一位苏格兰金融家**约翰·劳**（John Law）于 1716 年设立了一家银行。经政府批准，它成为一家发行纸币的国家银行。劳随后试图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金融操作来偿还君主制的债务：他将所有为发展殖民地而设立的商业公司合并为一家巨型公司；该公司随后接管了大部分税收征管权和王室债务，以 3%的股息出售股票，并安排王室每年支付 3%的利息（远低于其通常的利率）。股票起初价值飙升，但随后在 1720 年崩盘，导致公司和银行都破产。对“劳氏体系”（Law system）的糟糕记忆一直困扰着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金融讨论。债务、纸币和投机的爆炸性结合似乎注定会摧毁国王（或国家）的信用。3

然而，某种形式的纸币早已为商人所用。这些被称为**汇票**（bills of exchange）的远程贸易工具，依赖于所涉及的个人和商业公司的信誉。将其兑换成硬币（黄金和白银）时所需的支付，就像国家债券和年金的利息一样，取决于感知到的风险，即发行和交易商业票据者的信用度。汇票并非总是兑换成硬币；它们成为可以从一手转到另一手的独立信用工具。因此，汇票就像纸币，只是它们不是法定货币。它们只在私人商业网络中流通。4

与竞争对手大英帝国相比，法国政府为了进入这些私人信贷市场，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法国为 5%到 6%，而英国为 3%到 4%）。英国王室通过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获得资金，这是一家成立于 1694 年的私人公司，它从私人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向投资者贷款，然后投资者购买政府证

券，并直接向国家垫付资金。1776 年，在数十年的被忽视的提案之后，法国政府批准了巴黎的一家私人出资的**贴现银行**（caisse d'escompte）。作为向王室国库存入 1000 万里弗尔（livre）的交换（这实际上是一笔可分十三年偿还的贷款），贴现银行获得了各种特权：它作为一家股份公司出售股票，兑付汇票，作为个人货币兑换处和银行，并发行自己的票据。在法国，汇票通常以 4%到 6%的利率贴现，具体取决于票据持有人和发行人的信誉，但贴现银行被要求以 4%的利率兑付，以促进整体利率的降低。有些人希望贴现银行能像英格兰银行一样成为国家银行。5

与此同时，即便大多数政治家仍然拒绝永久性国债的观念，风险本身也正成为一种商品，尤其是在新的保险形式中，例如人寿保险。与汇票和海上保险一样，人寿保险起源于意大利城市，最初与放贷和商业风险密切相关。人寿保险被视为一种赌博形式，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区被禁止，但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却扎下了根。1787 年 11 月，法国政府批准了一家人寿保险公司。讽刺的是，铺平道路的竟是奴隶贸易航行中为被奴役者生命投保的做法，这种做法被视为一种海上保险。对社会——此处指人口——趋势的研究对人寿保险至关重要；有进取心的个人学会了通过吸引保费投资并通过精算表计算预期寿命来赚钱。死亡，像税收一样，可能确定无疑，但死亡的时间和方式却并非如此。6

那家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组织者是日内瓦出生的金融家**艾蒂安·克拉维埃**（Étienne Clavière），他辉煌的兴衰为风险与债务、私利与新法兰西共和国财政基础之间的联系提供了特别 illuminating 的例子。他是法国新教布商的儿子，像许多其他法国加尔文教徒一样，在加尔文教在法国被定罪后移居日内瓦。艾蒂安在德国各州与逃到那里的法国加尔文教徒学徒四年后，与父亲一起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和巴黎建立商业联系。早年曾短暂失聪，使他与

大多数社交关系隔绝，因此他将青年时代用于学习。与父亲在一个拥有广泛国际联系的企业工作，意味着他必须学习“银行”的基本知识，即汇票交易。他娶了一位表妹，她是马赛一位富商的女儿。1780 年，他们唯一的女儿嫁给了日内瓦的持牌经纪人**皮埃尔-弗朗索瓦·维厄瑟**（Pierre-François Vieusseux）。7

即使在发展自己的商业利益，作为批发商和金融投资者，克拉维埃（Clavière）也日益深入参与日内瓦政治，并带头推动建立更具代表性的政府。1782 年，他在日内瓦的一次起义中发现自己处于失败一方，于是与家人一起逃往纳沙泰尔（Neuchâtel）。在日内瓦起义的最后几天，克拉维埃与 28 岁的法国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Jacques-Pierre Brissot）关系密切，布里索已因其倡导全面改革法律和政府的激进著作而闻名。布里索曾赶往日内瓦，希望能亲身见证一场起义，他将年长者——47 岁的克拉维埃——视为可能的导师。抵达纳沙泰尔后，克拉维埃恢复了与布里索的友谊，并结识了**米拉波**（Mirabeau）。米拉波和布里索将在法国大革命早期扮演重要角色。据一位日内瓦同事说，克拉维埃胆怯且缺乏个人勇气，但他一生都将自己置于需要大胆的境地：“他喜欢麻烦，他乐于身处焦虑的境地，但他害怕后果。”8

逃离日内瓦并未能吸引足够多的追随者在他提议在爱尔兰建立的钟表匠殖民地之后，克拉维埃（Clavière）于 1784 年决定将巴黎作为他的运营基地。布里索（Brissot）后来形容他“拥有取之不尽的新想法”，很快就在巴黎金融市场中扮演了意想不到的角色，他利用米拉波（Mirabeau）的笔来确保他做空计划的成功，并在经济和政治上支持布里索。他并非金融市场中最大的参与者，但他学习迅速，并迅速掌握了如何利用舆论来实现其财务目标。9

当克拉维埃（Clavière）面临金融崩溃时，他的学习曲线急剧上升。甚至在 1782 年日内瓦起义失败迫使他逃亡之前，他就与**艾蒂安·德莱塞尔**（Étienne Delessert）保持密切联系，德莱塞尔是一位出生于里昂的金融家，来自瑞士新教纺织业家族（克拉维埃的父亲也有类似的企业）。德莱塞尔于 18 世纪 70 年代中期移居巴黎，设立家族企业的法国分公司，但很快将兴趣转向银行业，并成为新成立的**贴现银行**（Discount Bank）的管理者。该银行的许多最大股东都具有瑞士新教背景。1781 年 6 月，克拉维埃写信给巴黎的德莱塞尔，就他根据德莱塞尔的建议购买的贴现银行股份征求意见：他是否应该在派发股息后出售它们，还是保留它们以作抵押借款？当时股息率为 7.17%，但到 1783 年初，贴现银行已发行了价值是其黄金和白银支付能力七倍的票据。1783 年 9 月，当政府下令暂停支付时，克拉维埃发现自己有 27.5 万里弗尔的投资款项到期，但无法偿还，除非以巨大损失出售其贴现银行的股份。10

他设法坚持到政府取消暂停支付，银行信心恢复，但克拉维埃的拖延威胁了他与德莱塞尔（Delessert）的关系。1783 年 12 月 20 日，他写给德莱塞尔一封长长的、颇为自怜的信，揭示了在这些金融交易中相互信任的重要性：

我宁愿过囚犯的生活，不欠任何人，只靠自己的双手，也不愿乞求那些让我付出如此代价的恩惠……你为我做的并没有比你为任何人做的更多，我像一个诚实的人一样与你通信，正确地谈判，平和地通信，我更关心保护你免受任何风险，而不是利用我本可以期待的服务。

1784 年初，克拉维埃在巴黎安顿下来后，他将找到确保自己财富的新方法，同时仍然依赖德莱塞尔提供的服务。11

克拉维埃（Clavière）对法国政府试图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将自己转变为一名**卖空者**和**更道德商业环境的倡导者**；他认为卖空并非不道德，因为它是破坏非理性推高资产的投机行为的一种方式。1785 年初，克拉维埃押注贴现银行的股息会下降，他和一些人认为其估值过高，起初政府似乎倾向于卖空者，因为它坚持股息必须基于实际收入而非投机。但当政府被指控协助卖空者时，它立即取消了所有先前协商的期货和溢价合约。在溢价合约中，卖方向买方支付一笔溢价，这基本上是为卖方在期货合约到期时提供损失保险；卖方不必以不利的价格出售，只需放弃溢价。一些投资者随后拒绝偿还被取消合约的溢价。在围绕股息的骚动中，根据当时最广泛流传的地下通讯，克拉维埃在巴黎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与一位卖空者的反对者发生冲突，要么打了或揍了他一巴掌。克拉维埃的犹豫不决是有界限的，他现在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12

他并不打算默默地离开。1785 年 3 月，米拉波（Mirabeau）同意撰写一篇批判政府干预的文章，其中包含克拉维埃（Clavière）、布里索（Brissot）和法国新教经济学家**皮埃尔·塞缪尔·杜邦·德·内穆尔**（Pierre Samuel du Pont de Nemours，美国杜邦公司创始人的父亲）的贡献。这篇文章成为了城中热议的话题。米拉波阐述了他的合作者们反对过度金融投机的论点，即反对投机导致资产价值超出实际收益。他以饱含热情的方式，奏响了所有关于金融投机的常见警报：

我们深知金融投机这一致命体系给社会幸福和纯真带来了何种代价；我们深知贪婪在轻松获得巨额快速利润的刺激下，能够并且必将产生何种后果；我们深知赌博的狂热，或者说狂躁，如何侵蚀所有阶层，制造混乱，污染道德，使人孤立和冷酷；我们尤其深知，对公共资金的赌博，通过使其更容易

获得贷款，助长了管理者的欲望，夸大、误导、[并]陶醉权力，煽动、收紧、[并]确认奴役，[并]加剧压迫和贬低人类。

难怪米拉波和他的合作者们出版时没有署名地点或出版商。13

克拉维埃（Clavière）现在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接下来是**圣查尔斯银行**（Bank of Saint Charles），这是西班牙建立的第一家中央银行。该银行成立于1782年，拥有西班牙白银贸易的垄断权，很快成为法国投机的主题，该银行在法国的股票价格远高于马德里。克拉维埃卖掉了他在巴黎的股票，并要求德莱塞尔（Delessert）在马德里购买股票，以期股票普遍下跌。米拉波于1785年7月出版了《论西班牙圣查尔斯银行》（*On the Bank of Spain, Called Saint Charles*），但克拉维埃和布里索（Brissot）才是真正的作者，他们再次谴责腐败的投机者和鼓励他们的政府。巴黎的股票价格很快暴跌。克拉维埃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于7月16日写信给位于里昂的德莱塞尔分行："一部非常小的作品即将问世，它很可能会再次引起一些轰动，"由于其影响在里昂会比在巴黎更快、更深入地显现，他要求该分行在圣查尔斯股票达到某个低点时买入（这样他就可以在履行定期合同时代赚取差价）。政府镇压这本小册子的决定，反而引起了更多人对其及后续作品的关注。14

在仍与圣查尔斯银行（Saint Charles Bank）有所牵连的同时，克拉维埃（Clavière）再次通过米拉波（Mirabeau）之笔，将矛头指向了**巴黎自来水公司**（Paris Water Company），这家公司于1778年作为私人特许经营公司成立，负责向巴黎供水。1785年10月出版的《论自来水公司股票》（*On the Shares of the Water Company*）引发了一场与**皮埃尔·卡隆·德·博马舍**（Pierre Caron de Beaumarchais）的小册子战争，博马舍是《费加罗的婚礼》（*Marriage of Figaro*）的作者，巴黎自来水公司的管理人员，也是贴现银行

（Discount Bank）的早期股东之一。事实上，这家自来水公司被证明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因为投机行为一再将其股票价值推高到远超公司实际能力的水平。此外，克拉维埃已经制定了一项建立人寿保险和火灾保险公司的新计划，他将面临来自巴黎自来水公司的直接竞争，因为该公司的创始人也希望进入保险领域。巴黎自来水公司的命运起起伏伏，克拉维埃也时而赚钱时而亏钱，但最终它被推向破产并被政府接管。15

在一些投资上因时机不当而亏损后，克拉维埃（Clavière）认为他找到了更好的方法。他在 1786 年 1 月写信给他新宠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家**彼得·斯塔德尼茨基**（Pieter Stadnitski），他说将来他主要会投资法国政府提供的**终身年金**（rentes viagères）。“它是我的乳母，我的救星，”他肯定道，“我发现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它与所有其他投资相比有多么好。人们让自己被更耀眼的目标所迷惑，但终身年金是乌龟，它的缓慢步伐却能达到目标；而其他的是兔子，在追求热情中迷失。”16

法兰西君主国提供的终身年金是一种特殊的投资。投资者通过放弃家族财富，以换取其一生中每年获得的支付，从而承担风险。支付在投资者去世时停止，因此如果投资者在收回初始投资之前去世，王室将受益。相反，对于寿命较长的购买者来说，终身年金可能是有利可图的，而对于法国王室来说，这在经济上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对作为投资基础的生命或“人头”没有限制。从 1771 年起，日内瓦的投资者开发了一套系统，通过由三十个精心挑选的七岁以下日内瓦女孩的生命组成的辛迪加进行投资。年收入（约 10%）汇集起来，按比例分配给投资者。克拉维埃可以利用他获得的股息来支付他最初为投资终身年金而借贷的较低利息。股票可以在市场上买卖。据他自己计算，截至 1786 年 4 月，克拉维埃已在终身年金上投资了近 150 万里弗尔，但他欠巴黎、里昂、伦敦、阿姆斯特丹、热那亚和日内瓦的债权人 200 万里

弗尔。克拉维埃通过平衡贷款偿还与股息以及进一步的贷款来维持生计。他知道如何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利用风险和债务，但也继续深入研究其运作方式。17

在发行终身年金时，国家当局仅对预期寿命进行粗略估计，因此投资者开始看到更精确知识的优势，这些知识可以通过**精算表**（actuarial tables）获得，特别是理查德·普赖斯（Richard Price）于 1783 年在英国出版的精算表。精算表对于投资终身年金很有用，但对于建立人寿保险公司而言更为重要。克拉维埃（Clavière）迅速抓住了它们的意义以及终身年金与人寿保险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两者都基于预期寿命。18

1785 年以前，除了海运保险之外，法国基本上不知道保险为何物。在巴黎自来水公司提出火灾保险公司之前，一些计划都未能实现，政府于 1786 年 8 月授权了这家公司，但没有给予独家特权。因此，9 月，一个新团体，几乎可以肯定是由克拉维埃（Clavière）组织的，发布了一份类似火灾保险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政府允许其与巴黎自来水公司竞争。巴黎自来水公司随后提出了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以在早逝的情况下为终身年金的支付提供保险。1787 年 11 月，克拉维埃再次抢占先机，王室将其人寿保险公司的独家特权授予了他所在团体的火灾保险公司。六个月前，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根据其两名成员提交的报告，宣布批准了这样一个项目。孔多塞（Condorcet），他将成为“社会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并且已经以其数学才能而闻名，便是其中之一。19

这家被称为“**皇家人寿保险公司**”（The Roy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公司，结合了克拉维埃（Clavière）的个人财务利益和他长期以来的乌托邦情结。他相信商业可以服务于道德目的，并有助于塑造一个更好的社会。他

早期试图在爱尔兰建立一个日内瓦模式的钟表匠殖民地，就是这个方向上的初步尝试。他对新生的美国、对废除奴隶制和共和主义的热情，将与他的人寿保险公司计划同时出现。尽管克拉维埃的公司将在法国大革命的动荡中步履维艰，但他的创新却比此类公司在法国最终成功建立早了三十多年。他对此深信不疑，甚至出版了一本一百页的招股说明书，解释保险的运作方式以及保费如何确定，并附有详细的表格来阐明他的观点。“保险的‘普遍效用’不容置疑，”他坚称，“在每一个关心个人幸福的国家，”发明保险的人都被认为是“社会的恩人”之一。他强调公司努力帮助那些中等收入的人，在公司担任管理者期间，他还在 1790 年提议为仆人建立一个互助会，而当时这种互助会只存在于熟练工匠之间。20

为了获得独家经营权，保险公司承诺通过股票发行筹集 1600 万里弗尔（livres）作为担保，这些资金将存入政府，以换取每六个月支付一次的 5% 利息。克拉维埃（Clavière）被任命为管理者，月薪 1200 里弗尔，一套住房，以及一笔条件优惠的 15 万里弗尔贷款。尽管克拉维埃团体成功抵挡了由强大的瑞士银行家**艾萨克·潘肖**（Isaac Panchaud，贴现银行的原始支持者）领导的成立竞争公司的尝试（米拉波这次也通过小册子支持了潘肖），但这家火灾和人寿保险公司直到 1792-93 年才勉强维持。火灾保险公司面临清算，人寿保险公司则放弃了保险业务部分，两者与所有金融公司，包括贴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都在 1793 年 10 月 8 日被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法令取缔。但这种瓦解在 1787 年是无法预测的。21

由于克拉维埃亲眼目睹了王室不断借款的努力，因此他对国家债务产生兴趣并最终卷入政治并不奇怪。1786 年 4 月，除了他的 150 万里弗尔终身年金外，他还投资了近 70 万里弗尔的法国政府非终身年金贷款。1786 年秋天，他与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卡泽诺夫**（Cazenove）和**斯塔德尼茨基**（Stadnitski）

组织了一个荷兰银行家辛迪加，提议购买美国所有对法国的债务，并将其出售给投资者。他们将支付法国所欠的 2400 万里弗尔中的 2000 万里弗尔，并从销售中获利。最终，经过漫长等待，美国政府决定拒绝他们的提议。这项提议并非异想天开，因为美国依赖荷兰投资者来支付其对法国的利息；美国的政府支出远远超过其国内收入。22

克拉维埃（Clavière）对美国不仅仅是稍有兴趣，他还与布里索（Brissot）分享着这种热情。他们与法国驻纽约领事 **J. 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于 1787 年初共同成立了**高卢-美洲协会**（Gallo-American Society），旨在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关系。几个月后，布里索和克拉维埃发表了一篇小册子，其中他们挑衅性地主张新闻自由对于维持一个国家的公共信用至关重要。法国当时实行出版前审查制度，异议者常常面临流放或监禁。布里索和克拉维埃暗示，尽管他们不敢非常明确地说出来，美国可以作为法国共和美德的典范。他们深受克雷夫科尔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1782 年）的影响，该书极力赞扬美国的道德和习俗，这让人联想到古典共和美德。在他们的论文中，布里索和克拉维埃也为美国人使用纸币辩护，认为只有当纸币不能兑换黄金和白银时才会有问题。克拉维埃将继续在法国革命关于纸币的辩论和政策中发挥核心作用。23

克拉维埃（Clavière）和布里索（Brissot）对美国的兴奋，包括潜在的乌托邦项目。克拉维埃仍然梦想着建立一个日内瓦式的殖民地，布里索则认真考虑移居美国。无论如何，布里索想亲自去看看。他 1788 年在那里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旅行，费用由克拉维埃、卡泽诺夫（Cazenove）和斯塔德尼茨基（Stadnitski）资助，后者要求他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联邦和州债务稳固性的信息，以便他们进行投资。他们还希望他调查购买俄亥俄河西北部新近出售

的土地，并使用基于对美国政府贷款的纸币进行支付。布里索于 1788 年 12 月返回巴黎后，任何搬迁计划都被搁置；法国发生的事件现在将吸引布里索和克拉维埃的全部注意力。24

布里索（Brissot）和克拉维埃（Clavière）因在 1787 年和 1788 年出版了一系列小册子《无破产，或致国家债权人的信》（*No Bankruptcy, or Letters to a Creditor of the State*）而惹恼了法国当局。他们驳斥了王室破产的论点，坚持认为政府必须召开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来考虑新的财政方案，并将英国的财政状况与法国君主制进行了有利的比较："被一场持续七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战争彻底耗尽，以半数人口支撑比我们更大的国债，[英国人]却找到秘密，在土地不那么肥沃、资源不那么多样的情况下，每年偿还一部分债务。"他们争辩说，即使是美国人，尽管问题重重，也能维持公众对他们债务的信心。美国革命"特别启迪了人民的权利"，即所有人民，包括法国人。作者将个人能力的发现归因于美国人："他们认识到，让一个人自由发展就是创造天才、才能、财富，[因此]自由是他们财富的真正来源。"25

作者们总结道，为了摆脱法国的危机，必须满足**高等法院**（parlements）的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审议新税收，向公众揭示赤字的真实程度，并废除**密诏**（lettres de cachet），即用于监禁持不同政见者的法外命令。作者们还要求制定一部国家宪法。布里索（Brissot）担心遭到密诏报复，于是逃往伦敦，克拉维埃（Clavière）于 1787 年 11 月至 1788 年 2 月期间在那里与他会合。布里索在 1784 年曾被关押在巴士底狱（Bastille）几周，并不想再次体验。两人没有浪费时间，立即与英国主要的废奴主义者取得了联系，并加入了**废除非洲奴隶贸易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26

1788 年初，当他们返回巴黎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姐妹团体，**黑人之友社**（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Blacks）。在其开篇声明中，布里索（Brissot）和克拉维埃（Clavière）插入了他们关于在法国背景下发展个人潜力的主题："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受个人利益的驱动，将自己的才能发展到最高程度。"在一个必然受"普遍理性"支配的自由社会中，人们必须认识到奴隶制违反了"最基本的真理：**人人生而自由**"。因此，国家必然会确信"黑人奴隶制是一种罪行"。布里索和克拉维埃在严厉谴责奴隶制的同时，也在之前的著作中赞扬了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这表明他们正在援引自由和权利的新语言，并赋予其社会和经济维度。奴隶制与"人人生而自由"这一基本原则相悖，而自由，一旦得到保障，就能让个人发挥其潜力，从而创造知识和财富。黑人之友社吸引了拉法耶特（Lafayette）、孔多塞（Condorcet）、著名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米拉波（Mirabeau）以及其他各种贵族和神职人员等重要人物。没有黑人之友社，就不会有关于奴隶制的辩论。27

在建立这个政治行动小组时，布里索（Brissot）和克拉维埃（Clavière）显然旨在推动一场国际反奴隶制运动，其中包括美国、英国以及法国。这不仅仅涉及废除奴隶制，尽管这个目标非常重要。在他们支持增加对美贸易、提高法国政府财政透明度以及这项新兴的废奴运动的干预背后，隐藏着一种促进跨国共和美德的根本兴趣。日内瓦是最初的典范，尤其是在卢梭（Rousseau，他本人也是日内瓦人）的著作中所理解的模式，而新生的美国则提供了第二个，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具说服力的典范，因为它成功地争取了独立。布里索和克拉维埃在认识到奴隶制、贸易、信贷获取、宪法以及公民中共和美德潜力之间的跨国联系方面，是真正的远见者。1792 年战争爆发后，他们的跨国愿景将使他们陷入麻烦。28

克拉维埃（Clavière）被选为黑人之友社（Friends of Blacks）的首任主席，并积极参与其讨论。例如，1788 年 4 月，他坚持认为该社无意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其目标，而是希望收集事实并向所有人解释，正义和人道要求废除奴隶制。孔多塞（Condorcet）于 1789 年 1 月接任主席，但克拉维埃仍定期出席并频繁介入讨论。黑人之友社追随布里索（Brissot）和克拉维埃，寻求国际联系，不仅与英国和美国，还与荷兰共和国建立了联系。1789 年 2 月初，黑人之友社投票决定致函所有为选举代表而举行的区域会议，要求他们请求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关注黑人事业，并考虑禁止奴隶贸易，其中少数几个会议确实这样做了。29

黑人之友社（Friends of Blacks）密切关注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随后是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的讨论，尽管获得了一些支持，但在殖民地事务的决策中，它常常处于劣势。早在 1789 年 9 月 1 日，克拉维埃（Clavière）就抱怨自己受到了人身威胁；他敦促黑人之友社派代表团前往海军和殖民地部长处，要求了解该部是否正在散布该协会为英国利益服务的谣言。英国废奴主义者**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在 1789 年 8 月至 1790 年 1 月期间出席黑人之友社会议，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指控。为了应对反弹，黑人之友社将重点放在主张废除奴隶贸易，而非立即废除奴隶制本身。这并没有满足他们的支持奴隶制的批评者。1790 年 3 月，米拉波（Mirabeau）的弟弟谴责他们为“这些法兰西之敌，他们想将我们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置于几乎必死的境地，他们想使那无数的工人、水手、工匠、商人、资本家，甚至农民陷入停滞[并]贫困，而殖民地贸易曾使他们忙碌、致富、[并]繁荣。”30

甚至在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于 1789 年 5 月召开之前，克拉维埃（Clavière）就持续撰写关于国债的文章，反驳**西蒙·林盖**（Simon Linguet）于 1788 年初提出的**拒付**（repudiation）建议。克拉维埃坚持认为，拒付将摧

毁公众对国家信用的信心。在他冗长的驳斥中，克拉维埃显然在维护自己作为法国债务持有者的私利，但他也有更重要的目标，包括从统计学角度为法国偿还债务利息的能力辩护，以及更普遍地思考债务、宪法和法国统治的性质。当时的形势至关重要，因为 1788 年 8 月初，路易十六（Louis XVI）终于同意召开自 1614 年以来从未召开过的三级会议，此后不久，他暂停了所有非必要服务的现金支付，直到 1789 年底，取而代之的是附带利息的纸币。31

克拉维埃（Clavière）现在认为事态将导致君主立宪制的发展，而且新宪法（他坚持认为它绝不能建立在国家破产的基础上）将是一部“民族将发现社会人所有神圣和不可剥夺权利”的宪法。克拉维埃主张，国王并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统治，而是“为了组成其首领所处社会之个人的利益”。君主作为“最高行政官”进行治理，这意味着“他不是可以改变某些法律的主人，这些法律是社会为了自身安全而希望保持不变的，因此已成为基本法”。克拉维埃的共和政治原则，在日内瓦发展并在比较研究英国和美国中得以完善，现在在法国引起了共鸣，因为 1787-88 年间对财政和政治改革的需求沸腾。他已经在使用“社会”和“社群”的语言，将社会视为一个独立实体，与君主制分离并拥有自己的基本法律。他这样做是作为一个反思国家财政和政治经济的人，但他有独特的日内瓦背景，曾支持国内更大的政治参与。对他而言，立宪政府需要债务透明度，一旦其轮廓为国民所知，它才能真正成为国家的债务。32

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开始召开后，克拉维埃（Clavière）位于苏雷讷（Suresnes）的乡村住宅，距离巴黎市中心五英里，很快成为了布里索（Brissot）、米拉波（Mirabeau）和其他制定未来工作计划的人的聚会场所，其中包括讨论权利宣言。米拉波被选为**第三等级**（the commoners）的代表，因为他家乡的贵族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弟弟被选为贵族的代表，后来将反对革命。布里索和米拉波迅速创办报纸，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两份报纸

最初都被查禁，直到 1789 年 7 月巴士底狱（Bastille prison）遇袭后才被允许出版。三级会议于 5 月初开幕，但直到 6 月下旬，在第三等级代表成功地将会议重塑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后，才开始认真审议。三个独立的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将所有代表聚集在一起的议会。就克拉维埃而言，他在 1789 年 6 月又撰写了一本关于财政事务的小册子。他再次反对破产，但现在他还提出了发行纸币作为临时措施的理由，而没有将纸币与国家银行联系起来。纸币将由国家发行。他还坚持对税收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并主张国民议会每年召开会议。33

1789 年秋季，由于国民议会和王室都急于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克拉维埃（Clavière）关于纸币的观点变得更加紧迫。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干脆停止纳税，王室的常客债权人也拒绝认购新贷款。在 1789 年 10 月初致米拉波（Mirabeau）的报纸《普罗旺斯信使》（*Courrier de Provence*）的一封长信中，克拉维埃试图强化他反对由他的老对手——贴现银行（Discount Bank）——发行纸币的论点，当时财政部长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希望将其转变为一家效仿英格兰模式的国家银行。克拉维埃仍然提倡纸币，只要它由国家本身发行。他的纸币将由国家持有的黄金和白银担保，这些黄金和白银将通过公民以餐具或贵重物品形式的贷款来增加。贷款利息将来自天主教会的什一税收入。在他的提议中，随着纸币退出流通和国债偿清，什一税收入将得到补偿。尽管他继续以债务将得到偿还的假设运作，但克拉维埃正在带头思考如何将王室债务转化为真正的国债。34

克拉维埃（Clavière）的观点在众多对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发表截然不同意见的喧嚣中常常被淹没，但 1789 年 12 月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至少部分与他——以及米拉波（Mirabeau）——的观点一致。贴现银行（Discount Bank）不会成为法国的国家银行，尽管其发行的纸币将继续流通六个月。一个由国

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控制的特别金库将发行名为**指券**（assignats）的票据，其价值由从天主教会没收的财产担保。其中一部分将用于偿还贴现银行贷给王室的资金，其余的可以作为利息支付或用于购买教会财产，从而原则上偿还债务。1790 年 4 月，国民议会废除了什一税，将指券的直接责任交给国家，并增加了其流通数量，同时规定它们在任何金融交易中都必须被接受，从而使其成为法定货币。35

然而，分歧远未解决，克拉维埃（Clavière）加速发表自己的观点，部分原因是他希望有一天能成为财政部长。他发展了自己对紧迫问题的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出售教会财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减少社会不平等。因此，他反对任何可能阻碍普通民众获取这些财产的措施。1790 年和 1791 年，他继续为**指券**（assignats）作为纸币辩护，认为与所有以前的纸币实验不同，指券得到了大量教会土地的坚实支持，并且随着土地的出售，它们将被逐步收回。他主张增加指券的流通数量，并坚持认为为了建立国家教育体系，更多的借款是合理的。他坚称，通过发行一笔新的巨额资金，1788 年暂停支付的债权人利息可以恢复，这并非没有私利。36

他甚至直接回应了内克（Necker），内克在 1790 年 8 月拒绝了在已印制的 4 亿里弗尔（livres）之外进一步发行指券。克拉维埃（Clavière）认为，纸币与黄金或白银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即使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也是由其流通量决定的，而不是由金属的所谓内在价值决定的。纸币只有在信用受损时才会失去价值，而这只有在革命的敌人或自私的投机者使其如此时才会发生。即使分发 20 亿里弗尔的新指券，也不会超过从教会没收的物品的价值，他声称这些物品的价值至少等于 24 亿里弗尔。克拉维埃还回应了孔多塞（Condorcet）和杜邦·德·内穆尔（Du Pont de Nemours）公开表达的担忧。简而言之，他正在承担起指券主要辩护人的角色。在此过程中，他特别提到

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及普遍的英国情况，认为英国流通的纸币是黄金和白银的三到四倍，但对其经济没有不良后果。他还引用了英国的例子，主张印制小面额的指券，以便普通民众在日常商业交易中使用。37

到 1790 年 9 月，《普罗旺斯信使》（*Courrier de Provence*）公开称呼克拉维埃（Clavière），这无疑是他看待自己的方式："克拉维埃先生，可以称之为指券的创造者，他远远超越了他的批评者和他的支持者……；克拉维埃先生以不可动摇的勇气捍卫了它们[指券]。"这个判断毫不奇怪，因为这份报纸，尽管名义上是米拉波（Mirabeau）的，实际上掌握在克拉维埃和他在日内瓦的各种朋友和同事手中。38

米拉波（Mirabeau）在指券问题上的作用被证明是决定性的。他此前曾表示保留意见，但在 1790 年 9 月 27 日，即内克（Necker）辞职三周后，他坚决站在了克拉维埃（Clavière）一边，重复了他自己早先源于克拉维埃的论点，即指券不是纸币，而是财政危机所必需的**国家票据**（billets d'État）。在他惯有的修辞手法中，米拉波将现金（他指的是黄金和白银）的缺乏归咎于君主政权的过度："一个吸血鬼般的政府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吸取人民的血液，以求自身奢靡与过度的富足。"两天后，代表们投票决定立即发行 12 亿指券。米拉波写信给一位朋友，称这对他来说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指券将成为"革命的标志"。39

当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努力解决看似棘手的预算问题并开始思考未来税收征收和政府支付的管理时，克拉维埃（Clavière）提出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国家财政的混乱将导致"社会系统"的"分解"。他再次指出英国商业的"巨大优势"，这部分归因于法国保护体制的"愚蠢"，该体制扼杀了人才并侵犯了"神圣的人权"。除了自由贸易之外，法国还需要简化税

收制度和理顺财政管理，从一个公共金库开始。它将是“公共的”，意味着受到国家监督（他承认当时只有美国才真正如此）；受薪官员将向立法机构负责，而不是国王。尽管税收制度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简化，但财政管理在其复杂性方面直到克拉维埃去世后仍是错综复杂。他又一次预言了那些最终被证明不可避免但难以引入的创新。40

克拉维埃（Clavière）继续在反奴隶制方面开展工作，同时处理财务事宜。随着辩论从废奴转向自由有色人种的地位问题，克拉维埃拿起笔，为黑人之友社辩护，以对抗日益激烈的谴责。1791 年 3 月，他签署了两份来自黑人之友社的简短小册子，驳斥了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贵族代表**阿瑟·狄龙将军**（General Arthur Dillon）的指控，即黑人之友社的著作煽动了殖民地的骚乱，并且其中一些成员的记者可能受雇于外国势力，即英国。狄龙反对给予自由有色人种任何权利。此后不久，狄龙在马提尼克的同事**梅德里克·莫罗·德·圣梅里**（Médéric Moreau de Saint-Méry）重申了黑人之友社挑起了殖民地近期骚乱的说法，其中包括法兰西最富有的加勒比殖民地**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的自由有色人种叛乱。自由有色人种于 1790 年 10 月反抗白人种植园主，但他们被击败，其领导人于 1791 年 2 月被处决。41

克拉维埃（Clavière）不仅要回应以捍卫黑人之友社的立场，还因为莫罗·德·圣梅里（Moreau de Saint-Méry）在暗示黑人之友社秘密与英国废奴主义者协调以摧毁法国商业时，点名提到了包括布里索（Brissot）在内的具体成员。在他冗长的反驳中，克拉维埃明确表达了他对奴隶贸易的本能厌恶，而没有质疑奴隶制本身：“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可以支持一种以所有罪行作为必要工具的商业。”他捍卫自由有色人种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然权利”，因为他们与土地有着直接的联系。当时舆论对黑人之友社的反感如此之深，以至于克拉维埃发现自己不得不强调自由有色人种对白人种植园主的潜在用处。作

为财产所有者，白人和有色人种可以联合起来，维持奴隶之间的秩序。他于1791 年 3 月发表了这本小册子，正是在自由有色人种武装起义失败之后，但在 1791 年 8 月大规模奴隶起义爆发之前。1791 年 5 月，国民议会同意赋予自由有色人种政治权利，但随后于 9 月撤销了其决定。42

1791 年 4 月初，米拉波（Mirabeau）出乎意料地去世，年仅四十二岁。克拉维埃（Clavière）的政治命运此后更加依赖布里索（Brissot）以及后来被称为布里索派或吉伦特派（Girondins，因其中一些代表来自吉伦特省或行政区而得名）的政治派别。布里索和孔多塞（Condorcet）被选为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代表，该议会于 10 月开始召开。克拉维埃，此时已正式成为法国公民，被选为候补代表，并与布里索和孔多塞共同创办了新的月刊《月度纪事》（*La Chronique du mois*）。黑人之友社似乎在此期间停止了会议，这可能是因为 8 月下旬开始的圣多明各（Saint-Domingue）大规模奴隶叛乱的消息于 10 月下旬抵达巴黎。鉴于消息抵达巴黎需要两个月时间，此后数月普遍存在混乱和不确定性。布里索试图通过主张等待更多信息，甚至暗示其他岛屿因自由有色人种的武装存在而保持和平，来抑制反弹。随着消息日益令人担忧，那些“慈善家”或被对手讽刺地称为“人类之友”的人，常常受到指责。1791 年 11 月 9 日，布里索坚持回应这些批评者，他表示自己支持殖民地政权的“人道化”和改善黑人境遇，而不支持流血或叛乱。43

那么，克拉维埃（Clavière）随后将所有精力投入到财政状况中，这或许不足为奇。《月度纪事》（*Chronique du mois*）1791 年 11 月的第一页刊登了克拉维埃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第一届议会（1789-1791 年）尚未解决主要的财政问题。仍然需要一份精确的国债数额清单、一份尚未申报和估价的国有土地清单、一份透明的收支账目、**财政管理重组**，以及针对指券（assignats）以外的纸币和针对黄金白银投机的有力措施。在列出清单的同时，克拉维埃

匆忙赶往新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请求其在确定债务数额之前不要再发行指券，并暂停支付所有旧制度下曾被视为财产、现已宣布可偿还的公职。44

此时，孔多塞（Condorcet）已被克拉维埃（Clavière）关于指券的论点说服，特别是生产小面额指券供普通民众日常使用的优点。孔多塞的认同意味着，克拉维埃凭借其众多的著作和与布里索（Brissot）的长期合作，已成为吉伦特派（Girondins）的主要金融专家，该派现在将最强烈地主张对奥地利开战并建立共和国。克拉维埃当然赞成共和国，并迅速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适应战争前景。1791 年 11 月，他申明，为了对抗潜在的敌人，需要对财政状况进行大力整顿："此外，有必要对外国势力时而威胁、时而不确定的政治采取措施，以确保帝国的各个部分安全。"战争在五个月后才宣战，但克拉维埃希望做好准备。他被国债的估算所困扰，担心最常引用的数字要么过于乐观，要么过于悲观，但即使是最悲观的评估，如果指券能得到保护，也仍可应对。45

下个月，克拉维埃（Clavière）再次为自己暂时中止偿还旧政权官员所拥有官职和封建领地使用费的设想辩护，同时主张保护作为偿还国债基础的指券的价值。克拉维埃最初提出的暂停支付的建议极具争议性，以至于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小册子来捍卫这一想法，反驳那些认为这是国家部分破产的人。他驳斥了这种说法，指出偿还金额和到期日期从未确定过。他还认为有必要谴责法国汇率投机，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削弱或摧毁公共信用"的卖空者。克拉维埃当然理解这种做法："这个内部敌人因此以任何可能带来灾难或制造对灾难恐惧的事物为食。[这个敌人]如有必要，会雇佣那些擅长虚假计算的作家，以恐吓公众对金融状况的看法。"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克拉维埃如坐针毡了。尽管布里索（Brissot）一再干预以支持克拉维埃暂停某些偿还的提

议，但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于 1791 年 12 月 9 日投票反对该提议。46

克拉维埃（Clavière）并未停止试图影响财政决策，他的语气也变得日益危言耸听。1792 年 1 月，他猛烈抨击法国银行家和“外部敌人”，点名批评前财政部长**查理-亚历山大·德·卡隆**（Charles-Alexandre de Calonne），后者正与其他流亡的反革命贵族合作，并资助在英国出版的一份主要反革命刊物。克拉维埃还谴责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利用英国资金压低法国指券。他再次坚持认为，指券的贬值只能是由于背信弃义，因为其价值与待售的国有土地挂钩，而没有什么比土地更稳固的了。克拉维埃的战争欲望日益高涨，他希望比大多数同事走得更远，敦促对所有君主而不仅仅是奥地利开战。克拉维埃想到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一位新的财政部长，“一位开明而坚定的爱国者”，“一位民族部长”，其行动可以拯救立法议会和国王，并阻止一场战争。他心中所指之人，读者一定心知肚明。47

1792 年 3 月，克拉维埃（Clavière）终于实现了他长期以来的梦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顺利，许多人认为国王之所以愿意任命他与支持对奥地利开战的其他吉伦特派（Girondins）成员一同入阁，是因为路易十六希望将未来的任何失败归咎于他们。在 4 月对奥地利宣战、首次军事失败以及立法议会与国王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之后，路易十六于 6 月解雇了吉伦特派部长们。1792 年 8 月 10 日巴黎人民起义达到高潮，国王及其家人被软禁，被解雇的部长们被代表们复职。他们在新议会——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选举后继续任职，国民公会正式废除了君主制，并在法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共和国。

克拉维埃（Clavière）最初担任部长的经历已经揭示了将要面对的财政问题的深度：税收收入微薄，而战争开支需要更多资源，因此指券（assignats）的印制稳步增加；无法足够迅速地从教堂没收青铜、黄金和白银，以提供军队所需的货币；小面额指券印制的技术问题为私人兑换经纪人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他的第二次任期中，持续了十个月，克拉维埃理论上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他现在坐在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中，但实际上他的地位仍然脆弱。48

克拉维埃（Clavière）过去的金融诡计并未被遗忘，他与**让·德·巴茨男爵**（Jean, Baron de Batz）的联系也只会令人怀疑，因为巴茨是一位狂热的保皇党人，涉嫌参与各种阴谋，包括 1793 年 1 月 21 日当天阻止处决路易十六（Louis XVI）的注定失败的尝试。吉伦特派（Girondin）代表们一致认为国王犯有叛国罪，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布里索（Brissot），支持除立即处决以外的惩罚。1793 年 4 月杜穆里埃将军（General Dumouriez）的叛变使情况变得更糟。他曾是吉伦特派的外交部长，并曾推动国王任命克拉维埃为财政部长。回到战场后，他不同意巴黎决定的许多政策，杜穆里埃试图将他的军队调转枪口对准共和政府，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当他失败后，他投奔了奥地利人。他的背叛给所有吉伦特派蒙上了一层阴影。49

尽管乌云密布，克拉维埃（Clavière）仍狂热地努力启动他多年来一直倡导的改革。他源源不断地向代表们发送关于他工作的信件，并发表了关于他所面临问题的长篇报告，以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除了指券的燃眉之急，他最根本的关注点在于财政管理本身。由于代表们对国王的动机产生了极大怀疑，他们在 1791 年 3 月任命了六名委员负责国库，并将其与财政部职能分离。1789 年至 1793 年间财政部名称的四次变更以及部长们频繁的更迭——1789 年 7 月 14 日至 1792 年 8 月 10 日期间共有七位不同的财政部长——都表明了

挑战的严峻性。此外，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的各个财政委员会在大多数事务上都必须被征求意见，他们常常拒绝克拉维埃的要求。

因此，克拉维埃（Clavière）的一份报告开篇第一句抱怨道："公共捐款部[财政部的名称]是对前财政部不明智的肢解"，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它负责税收征收，但征收到的资金却流向了国库，而财政部长对此毫无权力。它本应报告税收征收面临的障碍，但由于没有实地人员，部长只能依靠猜测。它本应监督从流亡者手中没收的财产，但这项任务与内政部长共同承担，导致了不可避免的拖延和冲突。财政部负责维护国家森林，但却没有人员来执行这项任务。其他职责清单很长：监督先前包税制的清算、监管国家彩票、维护铸币厂、授权邮政系统的开支、监督硝石和火药收集办公室、管理指券的生产、维护土地登记簿，以及清算君主制王室开支表遗留的债务。50

克拉维埃（Clavière）坚持认为，为了满足所有这些要求，需要一个更专业的行政管理，这意味着要终止允许部长和代表随意安置其亲信的做法。每个行政部门都应负责招聘，才能和品德应是唯一的标准，受雇者不应认为自己的职位是终身制。简而言之，克拉维埃预见了未来几十年将逐步实施的改革。在他短暂的任期内，他未能实现这些改革，其中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追逐未能实现的税收和试图压制对指券的投机上。这项任务是不可能的，正如他公开抱怨的那样，但他仍然坚持不懈。51

新共和国的财政困难迫使克拉维埃（Clavière）绞尽脑汁，从指名道姓批评地方政府未能上报税收名单，到要求美国提前偿还债务。前者未能为他赢得朋友，后者则拖延了数月甚至数年，美国提出了一些预付款，但并非全额，直到 1795 年，也就是克拉维埃离开政坛一年后，才完成偿还，比原定时间提前了一年。由于必须通过立法机关工作，克拉维埃发现他的许多提议都石沉

大海。他建议对富人增税，并要求对商业票据的交换收取注册费。只有后者得以实施。他建议关闭证券交易所，这发生在他卸任之后。他提出了一项硬币重铸计划，其中包括非常精确的图案说明，这些图案将取代国王的形象；例如，20 苏的硬币上将刻有一个代表法国精神的形象，用长矛的末端雕刻宪法。宪法将置于一块青铜板上，放在祖国的祭坛上，所有这些都将呈现在一枚硬币的正面。代表们将提案提交给指券委员会，当他们最终在 1793 年春天决定采取行动时，他们忽略了克拉维埃大部分过于细致的建议。事实上，重铸问题被推迟了，因为代表们希望将其与对度量衡的全面重新评估（最终的公制系统）联系起来，而公制系统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零散地发展起来的，并与铸币系统本身的彻底改革（例如减少铸币厂的数量）联系起来。法郎最终于 1795 年 4 月作为新的货币单位引入。52

所有这一切之上，并给克拉维埃（Clavière）和代表们带来最大痛苦的，是指券的命运。1792 年秋天，克拉维埃说服**皮埃尔·坎邦**（Pierre Cambon），他是财政委员会的思想领袖，也常常是他的对手，引入一项法律，禁止流通除指券以外的任何纸币。由于没有足够小面额的指券，特别是互助会发行了自己的纸币；巴黎市互助会甚至分发了超过 1000 万里弗尔的纸币，尽管他们的金库里远没有那么多。克拉维埃随后徒劳地试图抵制延长使用除指券以外的纸币的期限，这将它们的最终废止推迟到 1793 年晚些时候。53

尽管这位不知疲倦的部长坚称指券的价值可以维持甚至恢复，但他却像推着一块日渐沉重的巨石上山。在战事爆发的几个月内，将军们在普通士兵的要求下，坚持所有对军队的支付都必须以硬币进行。战争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随着政府开支激增，收入无法跟上，尽管税收征收已从 1790 年的低点有所改善。一位学者估计，税收收入与开支的比例从 1792 年的 25%下降到 1793 年的 9.5%，主要原因是开支的增加。由于一切都在同时变化，从政

府结构到硬币上的面孔，因此，如果有什么令人惊讶的话，那是指券竟然保持了如此多的价值。对它们最全面的研究表明，指券的流通量从 1792 年 8 月（克拉维埃开始第二次担任部长时）的 18 亿里弗尔增加到 1793 年 5 月（他卸任时）的 32 亿里弗尔，增长了近 75%，但到 1794 年 10 月，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在同一时期，即 1792 年 8 月至 1793 年 5 月，它们兑黄金和白银的价值从 72%下降到 58%。然而，它们在 1793 年 5 月至 1794 年 10 月期间继续下降，降至 35%。这些总体数字掩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部差异，因为在边境附近，汇率甚至更低。54

仿佛所有这些重担还不够，克拉维埃（Clavière）还关注日内瓦的局势，1792 年秋季法国军队的胜利引发了对法国入侵和吞并的担忧。这位对 1782 年流亡心怀怨恨的人，现在得出结论：对于法兰西共和国而言，中立是一种支持法国敌人的方式——即支持平等的敌人。他总结说，日内瓦必须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克拉维埃反对**安妮-皮埃尔·蒙泰斯基厄-费森萨克将军**（General Anne-Pierre Montesquiou-Fézensac）愿意迁就日内瓦人的做法。作为南方军团司令，蒙泰斯基厄曾占领萨瓦（Savoy），本可以攻占日内瓦。克拉维埃对蒙泰斯基厄（许多贵族将军之一）的指控，导致该将军于 1792 年 11 月初被解职并逃亡以避免起诉。克拉维埃支持那些希望将日内瓦推向更民主方向的人，但并未主张直接吞并，这直到 1798 年才发生。55

克拉维埃（Clavière）急于驳斥一切批评的努力，未能抵挡日益猛烈的炮火。毕竟，他是一个外国人，一个金融家，一个前投机者，是米拉波（Mirabeau，现已被揭露为宫廷特工）和布里索（Brissot）以及吉伦特派（Girondins）的盟友，因此日益成为“山岳派”（Mountain）的目标，那些最接近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支持立即处决国王并现在敦促采取日益激进措施以控制经济和政治局势的代表们。这位日内瓦人因在成为部长后拒绝

放弃其人寿保险公司管理者的职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1793 年 2 月，代表们听到了对他监督指券印制的抱怨。3 月初，巴黎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听到了要求他因“无能或叛国”而被免职的呼声；到 3 月底，他被指控为了浪费国家财政而“因其惰性和疏忽”而恋栈不去。4 月中旬，罗伯斯庇尔谴责他为“我们所有不幸的缔造者，投机的保护者”。6 月 1 日至 2 日夜间，他与布里索和主要的吉伦特派成员一同被捕。9 月 8 日，他被送入监狱；9 月 19 日，他的审讯开始。56

克拉维埃（Clavière）做了他一直以来都会做的事：通过文字为自己辩护。在他的《克拉维埃，前公共捐款[财政]部长行为概要，自述，致其法官、同胞与敌人》（*Summary Account of the Conduct of Clavière, ex-Minister of Public Contributions [Finance], Done by Himself, Addressed to His Judges, His Fellow Citizens and His Enemies*）中，他回应了所有可能针对他的指控，从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会议上提出的那些指控开始。他不可能掠夺法国财政，也不可能利用部里的钱或自己的钱进行投机，因为他无法接触到国库，而且个人信用极低。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部长，并非因为他与吉伦特派（Girondins）的关系，因为他的任命获得了全票通过。他几乎不可能被指控为不作为，因为他工作勤奋，不亚于任何人。至于那荒谬的指控，说他未能就 1793 年 3 月爆发的旺代内战（civil war in the Vendée）向议会发出警报，他怎么可能比地方当局或内政部长的代理人知道更多呢？最后，他也没有权力下令截取邮件。57

他还回应了针对他，并出现在针对其他代表和部长的官方指控中的指控。他没有使用政府资金出版反对 8 月 10 日革命的小册子。他只是支持在 1792 年 9 月奥普联军入侵巴黎的情况下，将国库资金转移出首都以确保其安全的想法。他没有与蒙泰斯基厄将军（General Montesquiou）密谋背叛共和国；

毕竟，他提醒读者，蒙泰斯基厄曾指控克拉维埃是导致他被免职的元凶。克拉维埃进而谴责了那些旨在败坏他名声的各种诽谤：他是一个“联邦主义”支持者，即一些被捕的吉伦特派代表领导的反对国民公会（convention）的叛乱浪潮；他想要一个富人的共和国；他用反革命的钱来充实自己；他在国外投资；他支持黄金和白银的外逃；他是布里索派或吉伦特派的傀儡，并向他们提供指券；以及他故意任命忠诚可疑的下属。他列举了自己著作和行动的所有事实来驳斥这些指控，包括回忆他在要求废除奴隶贸易方面的作用。58

尽管克拉维埃（Clavière）坚决否认在指券问题上有任何不当行为，但他很难否认自己与布里索（Brissot）以及孔多塞（Condorcet）等吉伦特派（Girondins）的关系。克拉维埃坚称，布里索在他成为部长后从未要求过任何帮助；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履行职责。尽管他英勇努力，克拉维埃明白他与布里索的联系很可能会给他带来厄运：“没有人会怀疑我忠于自己，并始终倡导团结，而不是把我视为一个被指控的党派的傀儡，或者是一个密谋反对法兰西人民的统一、不可分割性、自由和安全的人。”59

他的恳求无人理会。12 月 8 日，他看到了针对他的正式指控，并被命令第二天在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出庭。当晚，他用从晚餐餐具中取出的刀自杀了。布里索已于 10 月 31 日被处决；孔多塞于次年 3 月自杀。克拉维埃的妻子服用了过量鸦片，但他的女儿和女婿（随他来到巴黎）幸存下来，于 1794 年 4 月迁回日内瓦。他的兄弟让-雅克（Jean-Jacques），于 1784 年来到巴黎与他会合，于 1793 年秋天被捕，并一直被关押到 1794 年 10 月。**艾蒂安·克拉维埃**（Étienne Clavière）的恶名昭彰，未能逃脱布里索派/吉伦特派的命运。正如他所写：“没有人能否认，革命已经达到了一个必须将自由的首批使徒抛在身后的高度。”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使徒，但他确实像任何人一样努力地预见到这种自由的财政需求。60

尾声

自我、社会与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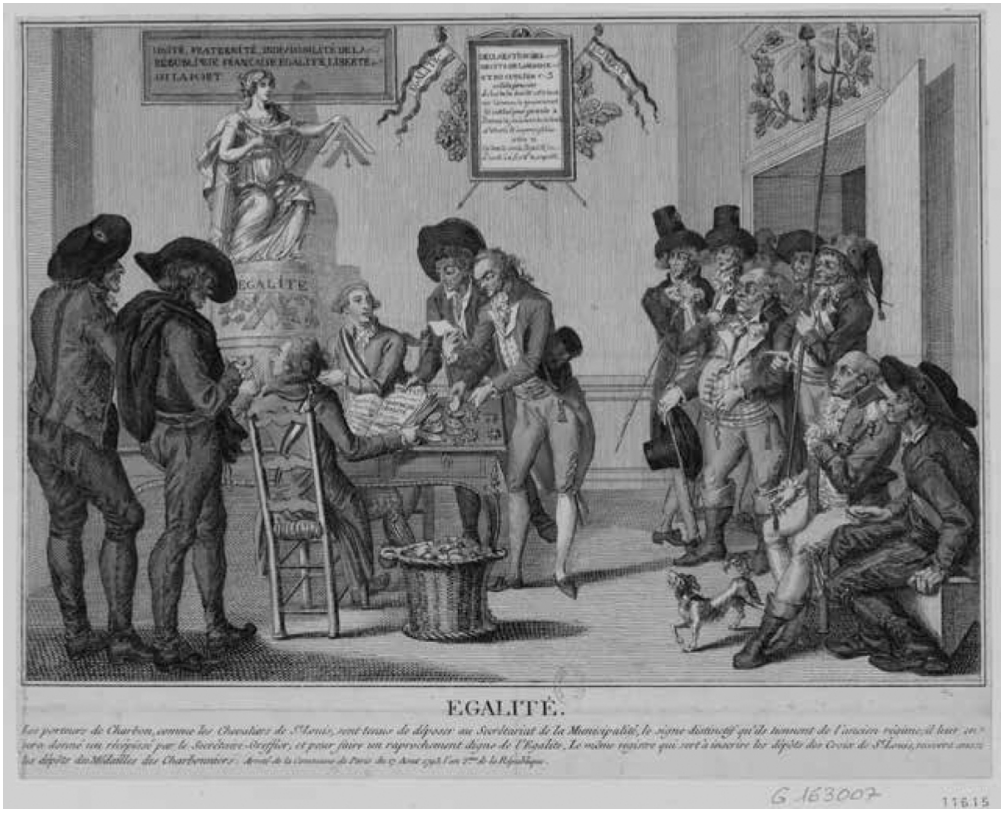
18 世纪，当个人开始将彼此视为潜在的自主个体以及社会的共同参与者和创造者时，平等才成为可能被思考的概念。这个论断看似简单，实则宏大而复杂，因此需要进行一番剖析。在人们记忆所及的漫长历史中，只有精英男性才能作为自主个体行事。儿童、大多数女性、仆人、无产者，以及被奴役者，都无法依据自己的理性和意愿塑造自己的生活。然而，在 18 世纪，随着成年年龄、妇女和无产男性的权利，以及被奴役者对自由日益增长的要求，所有这些议题都进入了讨论、立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引发了反抗，自主的空间得以扩展。社会中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即上层要求下层服从和顺从，日益受到包括平等和权利在内的横向观念的挑战。社会科学的兴起以及社会与社会关系的日益显现，都印证了这一发展并加速了它的进程。

大多数人对这些发展缺乏自觉的认识，尽管他们的行动反映了自主和社会归属与革新这些新观念的内在驱动力。其中包括：坐在茶桌旁，阅读新出版物，塑造社会对话的**英国女性**；**嘲讽上流社会的版画创作者和购买者**；像**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Marie-Gabrielle Capet）这样找到新地方展示作品和新客户购买作品的**女性艺术家**；以及成千上万梦想荣耀和晋升并有时两者兼得的**普通士兵**。更具智识倾向的人，如**苏格兰哲学家**和**法国社会科学的奠基人**，构思了新的概念——文明和社会科学的意义——并帮助促进了对这些发展的更自觉关注。金融家兼财政部长**艾蒂安·克拉维埃**（Étienne Clavière）发现自己介于两者之间，他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而非自己撰写哲学，领会了对个人能力和政治改革必要性的新强调，但他利用自己的见解投身市场，建立新的金融工具，并拼命试图挽救新生共和国的财政困境。

平等往往悄然从后门溜入。法学教授**约翰·米勒**（John Millar）从未提及性别平等，而且以他的文明阶梯论，他当然没有宣扬任何文化平等的观念。然而，他却将女性地位作为其体系的中心支柱，并密切关注不同文化的逻辑。他的思想在当时为他赢得了危险的激进主义者的声誉。

法国革命的版画宣扬平等，最常见的方式是描绘不平等的场景。“平等”概念的拟人化——总是女性形象，因为法语名词是阴性——通常是端庄的，正如版画《**平等**》（*Égalité*）中所示，画面背景中有一尊女性雕像手持象征平等的水平仪。她主持着一个对平等有着更强烈情感的时刻，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走到了一起。在画家的版画中，艺术家**弗朗索瓦·凯韦尔多**（François Quéverdo）展示了穿着长裤和结实鞋子的煤炭搬运工交出他们职业特有的勋章，而穿着及膝短裤、燕尾服和靴子或花哨鞋子的上流社会男士则放弃了他们来自特殊皇家勋章的装饰品。版画的文字引用了 1793 年 8 月的一项法令，该法令要求每个人交出旧制度下分发的任何徽章。这项法律旨在

抹去社会差异的象征，但版画中对服装和举止差异的描绘却提醒观者注意所涉及的不平等。



*弗朗索瓦·凯韦尔多（François Quéverdo），《**平等**》（Égalité），1793 年。雕刻蚀刻版画，21.5 × 31 厘米。图注写道："煤炭搬运工，如同**圣路易骑士团**（chevaliers de St. Louis）成员一样，被要求将他们在旧制度下获得的特有象征物交存到市政秘书处；书记员将给他们开具收据，为了实现一种符合平等的和解，用于记录圣路易十字勋章交存的同一登记簿也将记录煤炭工人的奖章交存。巴黎市法令，1793 年 8 月 17 日，共和国二年。"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就像许多旧制度下的艺术家一样，凯韦尔多（Quéverdo）成功地从 18 世纪 80 年代的书籍插画和王室肖像画，转型到爱国信头和革命场景。**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Marie-Gabrielle Capet）没有留下如此明显的政治作品，

尽管她在题材上也有类似的转变。1789 年之前，她创作王室女性成员的粉彩画和微型画。1792 年，她继续创作贵族的微型画，包括一幅据推测是路易十六之子的肖像画，但到了 1793 年，她转向了更具普遍性的主题，如《**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肖像**》（*Portrait of a Woman and Her Child*）、《**蓝夹克黄马甲的年轻人**》（*Young Man in a Blue Jacket and Yellow Vest*）和《**一个女人肖像**》（*Portrait of a Woman*）。同时，她也为特定个人绘制微型画，包括她的赞助人**文森特**（Vincent）和**拉比耶-吉亚尔**（Labille-Guiard），以及两幅自画像。1

卡佩（Capet）可能没有全心全意地接受新政权的所有价值观，她当然也从未像凯韦尔多（Quéverdo）那样将平等置于核心地位。然而，她个人前往巴黎、投身绘画并进行展览的**大胆举动**，却揭示了同样渴望被视为平等的愿望。她从学徒、助手，再到独立艺术家的晋升之路，类似于无数士兵在军队中迅速晋升的轨迹。卡佩的个性和社会意义感围绕着对时尚的描绘而融合，包括她自己的时尚选择，因为时尚是自我与社会交汇的主要场所。例如，在 1790 年代末的一幅微型自画像中，卡佩描绘自己穿着与**拉比耶-吉亚尔**（Labille-Guiard）1798 年为她绘制的肖像中相同的连衣裙和黑色帽子，头发再次上粉并梳成当时流行的样式。但她描绘自己坐在简单的椅子上，没有摆放她的绘画工具。她没有戴白色领巾和袖口，而是突出了一块与帽子上绿色丝带相配的绿色翻领，以及一条与她 1808 年拉比耶-吉亚尔画室画作中男士们所戴的一些领巾颇为相似的白色颈巾。通过这些变化，她确立了自己的个性和平等。2

士兵们也在处理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从士兵写给家人的信中我们得知，除了思乡、无聊、饥饿和恐惧之外，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在部队中感受到的**平等**，特别是在志愿部队中。一位来自法国东部的志愿兵在 1792 年 1 月

（宣战前几个月，甚至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写信回家说，现在“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祖国[patrie]的士兵。”1793 年 11 月，一名炮兵连连长给他的城镇治安官写信，谈到最近的战斗，最后写道：“治安官公民们，我以对人民治安官应有的尊重，以及在法律上与你们平等的身份。”有时，士兵们在信的开头写上“自由、平等”的口号，甚至“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这样的口号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除非它们是给家人和朋友看的。即使当“平等”已成为节日、演讲和版画中颂扬的官方价值观时，它仍然必须被生活和感受才能有意义，而军队提供了无数感受其影响的方式。平等的体验源于个人主动性的日益增长的潜力，以及属于一支庞大军队的情感慰藉、兴奋和强化。军队内部的这种平等理解不一定转化为承认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平等，但这并没有削弱它的重要性。军队是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学校，因此提供了社会阶层之间日益增长的平等感。3

艾蒂安·克拉维埃（Étienne Clavière）相信平等，尽管他的个人境遇可能另有安排。他富裕，自认为智力超群，并且总是急于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他早年在日内瓦的岁月（毕竟那里是 18 世纪最伟大的平等理论家**卢梭**的故乡），使他走上了反对特权、憎恶贵族制，并积极致力于废除奴隶制的道路。1787 年，他和布里索（Brissot）在他们倡导新美国和法国之间贸易的著作中，加入了一个典型的挑衅性脚注：

单词“贵族”（noble）、“贵族身份”（nobility）、“高贵地”（nobly）应用于涉及共和国的事实时，只会产生错误的观念，因为它们总是以君主制偏见赋予的负面含义呈现。它们唤起人们对某些人或阶层优于其他人或阶层的观念，这会让人相信在仅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共和国中也存在类似的区别。这一反思进一步证实了我们关于为美国共和国发展一套新的政治和道德词汇的必要性。

显然，布里索和克拉维埃也打算最终为法国发展这样一套词汇。4

法国大革命为他们提供了机会，就像它在许多其他领域为其他人提供了机会一样。平等并没有在短期内取得胜利（它现在胜利了吗？），人权也没有。但有些事情确实改变了。女性艺术家获得了新的展览机会，这与女性在其他方面的进步相辅相成：**拉比耶-吉亚尔**（Labille-Guiard）能够在 1800 年与她的丈夫离婚并嫁给**文森特**（Vincent），因为法国历史上首次于 1792 年确立了离婚制度。版画家可以讽刺教士和贵族，因为 1789 年后审查制度取消了。尽管在 1793 年之后，特别是 1800 年之后，审查制度以各种形式回归，但短暂的开放表明，对平等的渴望可以被变革的前景所激发，并可以通过愿意冒险进入新领域的艺术家们得到具体的表达。1792 年战争的爆发，为晋升开辟了巨大的新前景，尽管它也带来了看似无法克服的挑战。在努力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政府的过程中，像克拉维埃这样的人发现自己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思考国家债务和财政，尝试新的程序和新型货币，弄清楚如何使债务真正国有化，以及如何使财政管理更加透明，从而更具公信力。

然而，对自我、社会和平等的新概念并非仅仅来自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巨变。新概念源于新的实践，这些实践可以千差万别，例如在桌边喝茶、阅读报纸或小说、创办时尚杂志、开放新的展览空间、作为女性艺术家绘制自画像、以更快的速度行军、学习驾驶骑兵炮车，或者构想出像人寿保险这样的新金融工具。我们的生活框架既受重大事件的影响，但最终也最持久地受到我们日常行为的影响，这些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有时非常微妙，并带领我们走向新的理解。

致谢

在创作这本书的漫长岁月里，我积累了无数的感激之情，多到甚至无法一一记住。愿所有那些愿意倾听并一路帮助过我的人们，知晓我由衷的谢意。有时，思想在正式的演讲中迸发，但更多时候，知识的火花是在走廊里、午餐或晚餐时、一同漫步博物馆，或者仅仅是在巴黎、爱丁堡、比勒费尔德、洛杉矶、埃文斯顿或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街头漫步时产生的——完整的清单实在太长，会显得乏味。我的前学生们，现在是朋友和同事，通过共同的兴趣，特别是共同的生活，给予了我特别的启发。如果这本书能引起任何读者的共鸣，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在 W. W. Norton 的编辑**艾米·切里**（Amy Cherry）那敏锐的洞察力，她无数次地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能与她合作是我的荣幸。尽管我不会让**佩格·雅各布**（Peg Jacob）提前阅读书稿，因为我很难接受来自亲近之人的批评，但她无处不在地存在于这本书和我的生活中。

注释

Introduction: How the Smallest Things Lead to Big Changes

1.In *The Post-Revolutionary Self: Politics and Psyche in France, 1750–185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an Goldstein emphasizes the react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discusses it in the term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I focus more on cultural practices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itself. I do not offer a definition of "self" in these pages but find Goldstein's discussion of this very illuminating (esp. her p. 2). On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 and autonomy, see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and J. B. Schneewind, *The Invention of Autonomy: A History of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On original sin, see Matthew Kadane, *The Enlightenment and Original S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4).

2.I drew the figures on the slave trade from the database available online at Slave Voyages. For a recent account of resistance among the enslaved, see John D. Garrigus, *A Secret among the Blacks: Slave Resistance before the Hait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3.The transcript of the Thatcher interview with Douglas Keay of *Women's Own* (September 23, 1987) can be found online at the Margaret Thatcher Foundation website.

4.Jean-Jacques Rousseau,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ed. Helena Rosenblatt, with related documents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11), 70 (the quote from *Discourse on . . . Inequality)*, 143 (the quote from *Of the Social Contract*).

5.The growth of the terms "society" and "social" can be traced with Google Ngrams for English and French.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ociology"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English in 1842. Auguste Comte introduced the term in French as a neologism in 1839 in his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vol. 4 (Paris: Bachelier, 1839), 252.

6.On early appearances of the term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crucial developments after 1795, see Robert Wokler, "From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to the Sciences of Society by Wa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Jahrbuch für Recht und Ethik /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Ethics*, vol. 8 (2000): 33–45. See also Thomas

Lalevée, "Three Versions of Social Science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20:4 (2023): 1023–43. I traced the references to Condorcet and social science by Destutt de Tracy using the ARTFL-FRANTEXT database. For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science by Destutt de Tracy, see "Mémoire sur la faculté de penser," in *Mémoires de L'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et arts*, vol. 1 (Paris: Baudoin, Thermidor an VI [1798]), 389. The series of papers on the subject were first read in 1796 and then reformulated in 1798. All translations from the French, unless otherwise noted, are mine.

7. Mill's "Logic of the Moral Sciences" forms Book VI of his *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2 vols. (London: John W. Parker, 1843), 2: esp. 531–624. Mill and Comte exchanged eighty-nine letters in French between 1841 and 1847. In them Mill explains his indebtedness to Comte, but also develops his differences over method. In a letter to Sir Edward Bulwer-Lytton on March 27, 1843, Mill explained, "I do not always agree in his [Comte's] opinions but so far as I know he seems to me by far the first speculative thinker of the age." Francis E. Mineka, ed., *The Earlier Letters of John Stuart Mill, 1812–1848*, 2 vol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 2:579.

8. Emmanuel-Joseph Sieyès, *Qu'est-ce que le tiers état?*, ed. Edme Champion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88), 31. The us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peeches can be traced through the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sec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igital Archive. The first use I could find was in a speech by Maximilien Robespierre in January 1790. The importance of this term was first pointed out to me in the work of William Max Nelson, which I saw in manuscript, *Enlightenment Biopolitics: A History of Race, Eugenics, and the Making of Citize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4).

9. On the life of Millar, see the essay by his nephew John Craig,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Author," which prefaces the 1806 edition of 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Or, An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Give Rise to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in the Different Ranks of Society*,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Author, by John Craig, Esq*., 4th ed.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1806), i–cxxxiv. See also William C. Lehmann, *John Millar of Glasgow, 1735–1801: His Life and Thought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Sociolog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0. For Capet's origins in Lyon, see Christoph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artiste et modèle dans l'atelier des Vincent," in *Marie-Gabrielle Capet (1761–1818): Une virtuose de la miniature* (Caen, France: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Caen, 2014), 11–25.

11. Following the customary practice, Napoleon Bonaparte is called Bonaparte before 1804 and Napoleon when he has himself named emperor (officially Napoleon I).

12. Jean-Marc Rivier, *Étienne Clavière (1735–1793): Un révolutionnaire, amis des Noirs* (Paris: Panormitis, 2006). In the course of writing, I was sent by the author a recent doctoral thesis on Clavière, which has proved invaluable: Mathieu Chaptal, "De Genève à la France, la pensée républicaine d'Etienne Clavière: Réforme financière,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et révolutions (1735–1793)" (PhD diss.,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December 2020). It was an incredible act of generosity to have shared this deeply researched work with me. It has now been published as a book. Mathieu Chaptal,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Étienne Clavière (1735–1793)* (Paris: Éditions Mare & Martin, 2023).

Chapter One: Tea and How Women Became "Civilized"

1.The literature on coffeehouses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since Jürgen Habermas drew attention to their role in fostering public opinion i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9). See, for example, Brian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The quote is from Sir Frederic Morton 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Or, an History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England, 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Period*, 3 vols. (London, J. Davis, 1797), 1:524. Eden was bemoaning the treatment of the enslaved who could not eat with their families at table. I was first alerted to this work by Keith Thomas, *In Pursuit of Civility: Manners and Civiliz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8), 81.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ay women served food in the household appears in G. J. Barker-Benfield,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59. There is a large literature, now, on this subject. On tea tables and the role of women, see Markman Ellis, "The Tea-Table, Women and Gossip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British Sociabili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hallenging the Anglo-French Connection*, ed. Valérie Capdeville and Alain Kerhervé (Rochester, NY: Boydell Press, 2019), 69–88.

3.A Google Ngram of "civilization" in English shows that it takes off as a term in the 1760s.

4.David Porter, *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esp. 133–53.

5.*The Spectator*, no. 10, March 12, 1711, p. 1.

6.The quote is from *The Spectator*, no. 10, p. 1; for the lady's library, see no. 37, p. 1.

7.Erika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How Tea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23–56; Eliza Haywood, *The Female Spectator*, vol. 2 (Dublin: Printed for George and Alexander Ewing, 1746): 63–64. Patricia Spacks concludes that Haywood is against excessive tea drinking. Patricia Meyer Spacks, ed., *Selections from* The Female Spectat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v. For a more nuanced view, see Catherine Ingrassia's analysis of Haywood's earlier work from 1725 in "Fashioning Female Authorship in Eliza Haywood's 'The Tea-Table,' "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28, no. 3 (1998): 287–304. On the tea trade and consumption, see Troy Bickham, *Eating the Empire: Food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20), esp. 28–87.

8.Elizabeth Mure, "Some Remarks on the Change of Manners in My Own Time, 1700–1790," in *Selections from the Family Papers Preserved at Caldwell*, 3 vols., ed. William Mure (Paisley, Scotland: A. Gardener, 1883–1885 [1854]), 1:269, 271. Mure thought that the custom waned lat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en the Scots adopted the English separation of women and men after dinner. In her view, this separation led to increased emphasis on education for women, who could no longer rely on men for knowledge (p. 272). Most scholars who have commented on the diffusion of tea tables have emphasized their role in polite society. See, for example, Katharine Glover, *Elite Women and Polite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Woodbridge, Suffolk, UK: Boydell Press, 2011), 82–87.

9.Annual imports from China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Derek Charles Janes, "Fine Gottenburgh Teas: The Import and Distribution of Smuggled Tea in Scotland and the North of England c. 1750–1780," *History of Retailing and Consumption* 2, no. 3 (2016): 223–38, esp. 226; Cow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75.

10.On Assam, see Rappaport, *A Thirst for Empire*, 85–119, and Carole Shammas, "Changes in English and Anglo-American Consumption from 1550 to 1800," in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ed. 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182. The figures about slavery come from the Slave Voyages online database.

11.Maxine Berg, "Britain's Asian Century: Porcelain and Global Histor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Birth of Modern Europe: Culture and Economy, 1400–1800. Essays in Honor of Jan de Vries*, ed. Laura Cruz and Joel Mokyr (Leiden: Brill, 2010), 133–56, esp. 139, 141, and 145.

12.For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porcelain in Europe, see Suzanne L. Marchand, *Porcelain: A History from the Heart of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and Katherine Eufemia Farrer, *Correspondence of Josiah Wedgwood*, 3 vols. (London: Women's Printing Society, 1903–6), 1:197.

13.Samuel Smiles, *Josiah Wedgwood, F.R.S.: His Personal History* (London: J. Murray, 1894). Smiles was the apostle of "self-help" in his time. On the impact of Wedgwood's marketing, see N. McKendrick, "Josiah Wedgwood: An Eighteenth-Century Entrepreneur in Salesmanship and Marketing Techniqu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2, no. 3 (1960): 408–33.

14.John Locke,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paragraph 49, i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4th ed. (London: John Churchill, 1713), 218.

15.I traced "modernity" in the online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nd in 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s Online; a search of the French language database ARTFL-FRANTEXT shows the term appearing from the 1820s onward. "Modernité" in *Dictionnair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Littré), vol. 3, can be found under the "Dictionnaires d'autrefois" tab in ARTFL-FRANTEXT. A Google Ngram shows that "modernity" only takes off in the 1980s. A Google Ngram shows that "modern times" became more current in English beginning in the 1750s. *De l'esprit des lois, par Montesquieu. Précédé de l'analyse de cet ouvrage par D'Alembert*, 3 vols. (Paris: Pourrat, 1831), 1:191, 205–6. I have translated the original French myself becaus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ssage and the variabilit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16.ARFTL-FRANTEXT gives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civilisation*" in 1755 and a Google Ngram show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1770s and 1780s. O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Montesquieu, see Silvia Sebastiani,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Race, Gender, and the Limits of Progress*, trans. Jeremy Carde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17.For a discussion of various writers' use of stage theory, see Karen O'Brien,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John Millar,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in Society* (London: Printed by W. and J. Richardson for John Murray, 1771), ii. Millar is far from the only Scottish intellectual interested in this question. See, for example, H. M. Höpfl, "From Savage to Scotsman: Conjectural Histor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7, no. 2 (Spring 1978): 19–40.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literature on Millar and a burgeoning one o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My aim is not to cover all those writings or to give a full account of Millar's views but to link together things usually kept apart: tea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ivilizational histories. For a good overview of earlier work, see John W. Cairns, "John Millar's Lectures on Scots Criminal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8, no. 3 (Winter 1988): 364–400. The most recent account, one that emphasizes Millar's interest in family forms, is Nicholas B. Miller, *John Millar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Family Life and World History*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7).

19.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vi–vii, 18, 37, 232. There is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 essential point of departure for me was Jane Rendall, "Clio, Mars and Minerva: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the Writing of Women's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Scotland: New Perspectives*, ed. T. M. Devine and J. R. Young (East Linton, UK: Tuckwell Press, 1999), 134–51.

20.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xii; John Millar,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in Society*, 2nd ed. (London: Printed for J. Murray, 1773), xix–xx, 3; John Millar, *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or, An*

Inquiry into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Give Rise to Influence and Authority in the Different Members of Society, 3rd ed. (London: J. Murray, 1779), 5. The same phrase appears in the editions of 1781 and 1793.

21. For the quote on Montesquieu and Smith, see John Millar, *An Historical View of the English Government from the Settlement of the Saxons in Britain,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To Which Are Subjoined, Some Disserta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Government,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Time*, 4th ed., 4 vols. (London: J. Mawman, 1818), 2:429–30 (footnote). For the influence of Lafitau on Smith, see David L. Blaney and Naeem Inayatullah, *Savage Economics: Wealth, Poverty and the Temporal Walls of Capitalism* (Abingdon, Oxon, UK: Routledge, 2010), 27–57, and Ronald L. Meek,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gnoble Sav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22. For the disinterest of Montesquieu, Voltaire, and Jean-Jacques Rousseau, see the introduction by William N. Fenton and Elizabeth L. Moore to their translation of Joseph-François Lafitau, *Customs of the American Indians Compared with the Customs of Primitive Times*, 2 vols. (Toronto: Champlain Society, 1974–1977), 1: esp. lxxxiii.
23. Joseph-François Lafitau, *Moeurs des sauvages amériquains comparées aux moeurs des premiers temps*, 2 vols. (Paris: Saugrain l'aîné, 1724), 1:106. 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8–12. On p. 8 he has a footnote with a long quote from Lafitau.
24. For Montesquieu on climate, see esp. his books 14–17 of *The Spirit of Laws*; 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2 and iii.
25. John Pinkerton, *An Enquiry into the History of Scotland Preceding the Reign of Malcom III or the Year 1056. Including the Authentic History of That Period.* 2 vols. (London: Printed by John Nichols, for George Nicol, 1789), 1:340; Millar, *Observations* (1773), 249 (footnote). Silvia Sebastiani was kind enough to share her thoughts on this question with me.
26. For Millar's personal life, see John Craig,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Author," and Lehmann, *John Millar of Glasgow*, esp. 7–86.
27. The lecture notes come from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Advocates' MS 28.6.8 (1777–78), esp. p. 94 (I am using the page numbers penciled in).
28. For his expectations of students, see his lecture notes, Advocates' MS 28.6.8, p. 90, and also John Craig,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Author," xviii. In his remarks on the defects of law education of the time, Henry Home, Lord Kames, considered Millar the only exception. Lord Henry Home Kames, *Elucidations respecting the Common and Statue Law of Scotland* (Edinburgh: Printed for William Creech, 1777), viii–ix.
29. The quotes from Frederick Lamb come from Lloyd C. Sanders, ed., *Lord Melbourne's Papers*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89), 5–6.
30. John Gregory, M.D., *A Father's Legacy to His Daughters*, 3rd ed. (Dublin: Thomas Ewing and Caleb Jenkin, 1774), 19. Gregory's manual went through at least six editions in 1774 and many others in the 1770s and 1780s. Craig remarks on Millar's habit of consulting his wife and reading his work to the family in the 1806 edition, John Craig,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he Author," lxxiii. The quote from William Lamb comes from Sanders, *Lord Melbourne's Papers*, 7.
31. The distinctiveness of Scottish intellectual life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See, for example,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and Alexander Broadi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2. R. A. Houston,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500–1750," in *British Population History: From the Black Death to the Present Day*, ed. Michael And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5–190, esp. 122; Henry Hamil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Scot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404–5, 414, 419–20.

33.[Duncan Forbes],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Scotland: In a Letter to the Commissioners and Trustees for Improving Fisheries and Manufactures. To Which Is Subjoined, A Letter from the Annual Committee of the Convention of Royal Boroughs, to the Several Boroughs of Scotland, by Order of the General Convention, for Preventing the Pernicious Practice of Smuggling* (Edinburgh: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Magistrates, 1744), 7. The term "tea table" can be traced through a Google Ngram. On tea drinking in Scotland, see Glover, *Elite Women and Polite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Scotland*, esp. 82–87.

34.Elizabeth A. Foyster and Christopher A. Whatley, *A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n Scotland, 1600 to 180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2.

35.Paul Hallberg and Christian Koninckx, eds., *Colin Campbell's Diary of the First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Expedition to Canton, 1732–33* (Gothenburg, Sweden: Royal Societ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Gothenburg, 1996), xix–xxii, 96, 104. On Scandinavian trade, see Hanna Hodacs, *Silk and Tea in the North: Scandinavian Trade and the Market for Asian Goods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I am grateful to Hodacs for sharing her work with me.

36.Meike von Brescius, "Worlds Apart? Merchants, Mariner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rivate Trade in Chinese Expert Wares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in *Goods from the East: 1600–1800: Trading Eurasia*, ed. Maxine Berg et 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63–82, esp. 170. Figures of Swedish and Danish compan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scale of smuggling are found in Janes, "Fine Gottenburgh Teas," 226.

37.Andrew Mackillop, "A North Europe World of Tea: Scotland and the Tea Trade, c. 1690–c. 1790," in Berg at al., *Goods from the East*, 294–308, esp. 301–3.

38.On literacy, see R. A. Houston, *Scottish Literacy and the Scottish Identity: Illiteracy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and Northern England, 16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esp. 56.

39.David Hume, "Of Essay Writing [1742],"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Grant Richards, 1908), 570; David Fordyce, *Dialogues concerning Education*, 2 vols. (London: n.p., 1745), 2:111.

40.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19 and 75. For attitudes toward women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see Sebastiani,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nd O'Brien, *Women and Enlightenment*.

41.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75–78.

42.Millar, *The Origin of the Distinction of the Ranks* (1779), 123–24. On Millar's views of the family, see Miller, *John Millar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43.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234, 236–37. The modifications of Millar's position on slavery in the various editions are traced in detail in John W. Cairns, "John Millar and Slavery," in *MacCormick's Scotland*, ed. Neil Walk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73–106.

44.Lehmann, *John Millar of Glasgow*, 50–51.

45.Millar, *Observations* (1771), 113; Lehmann, *John Millar of Glasgow*, 68.

46.For the excerpt from the trial, see Peter Mackenzie, *The Life of Thomas Muir, Esq. Advocate, Younger of Huntershill, Near Glasgow, Member of the Convention of Delegates for Reform in Scotland, etc., etc.: Who Was Tried for Sedition before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iary in Scotland, and Sentenced to Transportation for Fourteen Years: With a Full Report on His Trial* (Glasgow: W. R. MacPhun, 1831), 107. For the reactions of parents, see Lehmann, *John Millar*, 69.

47.Mackenzie, *The Life of Thomas Muir*, 1

Chapter Two: Revolutionary Imagery and the Uncovering of Society

1.Maurice Tourneux, ed.,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par Grimm, Diderot, Raynal, Meister, etc., revue sur les textes originaux, comprenant outre ce qui a été publié à diverses époques les fragments supprimés en 1813 par la censure, les parties inédites conservées à la Bibliothèque ducale de Gotha et à l'Arsenal à Paris*, 16 vols.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72–77), 10:313–18.

2.Google Ngrams show the spike of "société" and "social" in the 1790s and the new usage of "organisation sociale."

3.Brian C. J. Singer, *Society, Theor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udies in the Revolutionary Imaginary* (Houndmills, Hampshire, UK: Macmillan, 1986). Singer was interested in visibility but not visualization. Earlier versions of my interest in these questions can be found in Lynn Hunt, "La Visibilité du monde bourgeois," in *Vers un ordre bourgeois?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changement social*, ed. Jean-Pierre Jessenne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07), 371–81; and Lynn Hunt, "Envisioning Equalit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Imagining Unequals, Imagining Equals: Concepts of Equality in History and Law,* ed. Ulrike Davy and Antje Flüchter (Bielefeld, Germany: Bielefeld University Press, 2022), 71–102. For a general consideration of printmak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see Ashli White, *Revolutionary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esp. 181–304.

4.To determine the number of prints at the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hereafter BNF), I used the online search function entering *estampe*, France as the place of publication, and the years. This gave 2,275 as the number of prints for the period 1757–1761, 2,999 for 1767–1771, 3,443 for 1777–1781, and 9,213 for 1787–1791. I compared revolutionary prints within and among different collections using Excel sheets. The eight volumes of the printed catalogue of the De Vinck collection are listed under a maddening variety of titles because their completion required decades and collaboration by many different peopl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rance). Cabinet des estampes. Collection de Vinck, *Un siècle d'histoire de France par l'estampe, 1770–1871*, 8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9–1969).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volumes 2–4 are the relevant ones: *La Constituante* (1914), *La Législative et la Convention* (1921), and the first part of *Napoléon et son temps* (1969). Some 5,700 prints are listed in the De Vinck catalogue but at least 500 of them are duplicates. The other major collection is that of Michel Hennin (also in the BNF): Georges Duplessis, *Inventaire de la collection d'estampes relatives à l'histoire de France, léguée en 1863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 M. Michel Hennin*, 5 vols. (Paris: H. Menu; H. Champion, 1877–1884). The Musée Carnavalet also has many prints, but its collection has not been organized in the same fashion. Some of the prints in these collections were produced outside France, but the vast majority are French.

5.Some newspapers and pamphlets were illustrated, but not many. Most of these illustrations are included in the De Vinck and Hennin collections. John Lough, *Paris Theatre Audience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157; Emmet Kennedy et al., *Theatre, Opera, and Audience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Analysis and Reper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6), 379; Tony Halliday, *Facing the Public: Portraitur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30; Richard Taws, *The Politics of the Provisional: Art and Ephemera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3).

6.The number of portraits is given under the Topic tab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Digital Archive (hereafter FRDA). I limited the dates to 1789–99. The current version of the FRDA has 4,623 images for the period 1789–99, all derived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BNF. The categories are those of the BNF.

7.Amy Freund, *Portraiture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9–80.

8.Freund, *Portraiture*, esp. 54.

9.My conclusions about chronology are based on putting the dates into the FRDA. The highest number of prints is listed for 1790, followed by 1789 and 1791.

10.F. A. Aulard et al., eds., *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avec la correspondence officielle des représentants en mission et le registre du conseil exécutif provisoire*, 37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9–1999), 10 (1897): 187. The figures on the price of prints, bread, and daily wages can be found in Antoine de Baecque, *La Caricatur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Presses du CNRS, 1988), 27. One of the few prints that shows the display of prints on the outside wall of a shop can be found at the BNF online site Gallica under the title *Le Joli Moine*. This print and the general meanings of revolutionary print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in Rolf Reichardt and Hubertus Kohle, *Visualizing the Revolution: Politics and the Pictorial Art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8); see p. 38 for the print in question. Reichardt and Kohle's book was an essential point of departure for me.

11.In her article on the social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Carla Hesse shows that the question of legally defined suspects in 1793–94 created new tensions about understanding social identities. These tensions contributed to the uncertainties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may well have increased the pressure for a "social science," though that is not part of her argument. It is a reminder, nonetheless, that Mercier was commenting in a very different atmosphere from that analyzed by Boyer. Carla A. Hesse, "Law, Suspicion, and Social Hermeneutics at the Inception of the Terror, April 1793," *French History* 38, no. 1 (March 2024): 83–95.

12.The publication of the installments, their length and their cost, is announced as beginning in April 1792 by *Journal encyclopédique ou universel* 1, no. 5 (February 20, 1792): 274. The same journal advertised vol. 1 of the work in its issue of May 10 (vol. 4, no. 13), 127–28 (with no price). The *Journ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 gave 50 livres as the price for four volumes as well as the yearly subscription (no. 48, February 17, 1792), 378–79. The last date cited by Boyer is July 27, 1792. Jacques-Marie Boyer-Brun, *Histoire des caricatures de la révolte des Français, par M. Boyer de Nîmes, . . .* , 2 vols. (Paris: Impr. du Journal du peuple, 1792).

13.Boyer-Brun, *Histoire des caricatures*, 1:10. See also Champfleury, *Histoire de la caricature: Sous la République,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 2nd ed. (Paris: E. Dentu, 1877), 170–93. The prospectus is quoted in the important article by Annie Duprat, "Le Regard d'un royaliste sur la Révolution: Jacques-Marie Boyer de Nîm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337 (2004): 21–39, quote on p. 23. In his *Histoire* (vol. 1, p. 134), Boyer claimed he had inserted a caricature in issue 17 of *Journal de Nîmes* dated February 28, 1790, but the BNF's copy of the journal does not include it. On Boyer, see also Claude Langlois, *Les Sept morts du roi* (Paris: Anthropos, 1993), esp. 146–65. Langlois questions whether Boyer overestimates the mobilizing power of caricatures and the ability to manipulate them, yet Langlois's book is devoted to explaining how caricatures of the king undermined his position and therefore contributed to his demise; see esp. p. 152.

14.*Essai sur la régénération physique, morale et politique des Juifs; ouvrage couronné par la Société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de Metz le 23 Août 1788, par M. Grégoire, curé du diocese de Metz* (Metz: Claude Lemort, 1789); Boyer-Brun, *Histoire des caricatures*, 1:247, 362.

15.Boyer-Brun, *Histoire des caricatures*, 1:69. Although the title does not appear on Boyer's reproduction in the book, he does discuss it in the text, noting that it appeared at the bottom of the image.

16.Boyer-Brun, *Histoire des caricatures*, 1:27–28, 70, 71; 2:72; Henri Wallon, *Histoire du 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de Paris avec le Journal de ses actes*, 6 vol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880–82), 4:12–13.

17. *Actes des apôtres*, vol. 7, chapter 201 (ca. November 1790), p. 12 [pagination and numbering seems to vary by collection]. The Rowlandson print, *Political Affection*, can be viewed online at the British Museum. The fox could easily be mistaken for a wolf. *Journ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 no. 60 (June 30, 1791): 483. The complaint was shared by another royalist journal, *Les Sabats Jacobites*, no. 42 (1791, month unspecified but definitely after June): 270.
18. *Journal des révolutions de l'Europe en 1789 et 1790* 4 (1789): 77–78, 85. The author refers to a hare hanging from the pole of the peasant in one of the images. An example can be seen at BNF Gallica under the title "J'savois ben qu'jaurions not tour."
19. *Révolutions de Paris*, no. 105 (July 9–16, 1791): 33–35; *Courrier français*, no. 151 (May 30, 1792): 240.
20. The critic is quoted in Samuel Lutz, "Quelques échos," in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précurseur et sa fortune: Avec des documents inédits: Recueil d'études sur l'influence de Mercier*, ed. Hermann Hofer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1977), 285–300, quote on p. 289. On licentious prints, see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8 vols. (Amsterdam: n.p., 1783), 6:92;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Tableau de Paris*, 2 vols., ed. Jean-Claude Bonnet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94), 1:1323. Bonnet's team has compared the various editions.
21. On Mercier's role in the trial of the king, see J. Mavidal and E. Laurent, eds.,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première série (1787 à 1799)*, 90 vols (Paris: P. du Pont, CNRS, 1867–1990), 57:374; Marie-Jeanne Roland de la Platière, *Mémoires de Madame Roland* (Paris: Editions de Saint-Clair, 1967), 312.
22.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Néologie, ou Vocabulaire de mots nouveaux, à renouveler, ou pris dans des acceptions nouvelles*, 2 vols. (Paris: Chez Moussard, chez Maradan, 1801), 2:244. For his various publications and reactions to them, see Enrico Rufi,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Paris: Memini, 1996).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Goncourts attributed criticism of Mercier's stand on the arts in the Conseil des Cinq Cents to the fact that he "n'a guère voulu voir d'hiérarchie de genre dans l'art." Edmond de Goncourt et Jules de Goncourt,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e directoire*, 2nd ed. (Paris: E. Dentu, 1855), 279.
23.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6 vols. (Paris: Fuchs, 1798). Although the publication date was given as 1798, it most likely appeared in 1799. See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ed. Jean-Claude Bonnet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94), ccxcvi. Quotations from the work come from the Bonnet edition. For the quote about obscene books, see p. 430.
24.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625.
25. For the discussion of critical prints, see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623–25; for the vogue of caricatures, see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421.
26.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421–22.
27.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266 and 25. On *Chronique du mois*, see Gary Kates, *The Cercle Social, the Girondin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5–220.
28.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868–69. Mercier did not use the term "social science" himself.
29. *Le Concert de la rue Feydeau; ou, La Folie du jour, comédie en un acte, en prose . . . Par les citoyens René Périn et Camille* (Paris: Chez les marchands de nouveautés, an III [1795]). Two different engravers did stippled prints titled *Folie du Jour* based on a painting by Louis-Léopold Boilly. By *The Danger of Wigs*, Mercier no doubt meant the print titled *L'Inconvénient des perruques* (The inconvenience of wigs) because the scene of the woman on a horse is quite precisely described by Mercier in his text. It, too, is a stippled engraving from 1797 based on a drawing by Carle Vernet, etched by Louis Darcis.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Museum, the print *Folie du Jour* by Salvatore Tresca was registered at the BNF in February 1797. The version by J. P. Levilly can be seen in the online collections of the Musée Carnavalet. Both show the same scene in slightly different formats. A colored version of *L'inconvénient des perruques* can be seen in the online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which dates it as 1797.

30.On the fistfights at this play, see Edmond and Jules de Goncourt,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e directoire*, 374–75. On the politicization of women's dres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volution, see Dominique Godineau, "Costume, apparence et identité politique des citoyennes (1789–1794),"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409 (2022–23): 93–116.

31.Petit's etching seems the likely candidate,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title but also because like all the others referenced by Mercier as "naive depictions," it is stippled and dates from 1797. Only two of the prints mentioned by Mercier (*L'Anarchiste* and *Les Incroyables*) appear in the FRDA. For the use of "anarchist," see, for example, Antoine Jean Thomas Bonnemain, *Les Chemises rouges ou Mémoire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u règne des anarchistes*, 2 vols. (Paris: Du Roy, 1799);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44.

32.According to Aileen Ribeiro, ribbon garters like the one worn by the young man on the right in the etching were worn over pants (*pantalons*) to create the illusion of knee breeches. Aileen Ribeiro, *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8), 119; "La Mode des pantalons et des bottines se soutient," *Tableau général du gout, des modes, et des costumes de Paris*, no. II de Brumaire, an VII (October–November 1798): 108.

33.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453. On the political meanings of 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 the invaluable Richard Wrigley, *The Politics of Appearances: Representations of Dress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Oxford: Berg, 2002).

34.Mercier's comment is from a previousl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that is reproduced in the Bonnet edition of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1238. On the *frac*, see Philip Mansel, "Monarchy, Uniform and the Rise of the *Frac*, 1760–1830," *Past & Present* 96, no. 1 (August 1982): 103–32.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the fashion journal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women's dress than to men's, I do not agree with Ribeiro's contention that "with regard to the details of men's dress, there are few changes to chronicle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ibeiro, *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19.

35.Jean-Gabriel Peltier, *Paris pendant l'année 1799* (London: Bayliss, 1799), 394–401. With Peltier we come full circle, since he was one of the original collaborators on *Actes des apôtres*. For an example of a long review focusing on Mercier's politics, see from London *The Monthly Review; or Literary Journal* 30 (September–December 1799): 572–81; *La Décade philosophique,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 2nd trimester an V, no. 12 (January 19, 1797): 175; 2nd trimester an V, no. 14 (February 8, 1797): 305–6;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Werke*, 133 vols. (Weimar: H. Böhlaus, 1887–1919), 47 (1896): 353–60.

36.Quote from Moratín in Amelia Rauser, *Caricature Unmasked: Irony, Authenticity, and Individu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Prints*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131; British Museum, *Catalogue of Political and Personal Satires Preserved in the Department of Prints and Drawings in the British Museum*, 11 vols. (London: British Museum, 1870–1954), 7:1793–1800 (ed. Mary Dorothy George, 1942). It lists 9,692 prints. See also Diana Donald, *The Age of Caricature: Satirical Prints in the Reign of George II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7.George W. Stocking Jr., "French Anthropology in 1800," *Isis* 55, no. 2 (June 1964): 134–50; Jean-Luc Chappey, *La Société des observateurs de l'homme (1799–1804): Des anthropologues au temps de Bonaparte* (Paris: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bespierristes, 2002), esp. 293–390.

Chapter Three: Art, Fashion, and One Woman's Experience

1.The terms can be followed through Google Ngrams.

2.Paris Spies-Gans, "Exceptional, but Not Exceptions: Public Exhibi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Woman Artist in London and Paris, 1760–1830,"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51, no. 4 (2018): 393–416, esp. 406. Paris was kind enough to provide m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1770s and 1780s based on her compilation of lists of all women who displayed their art publicly in Paris in the years 1760–1830. The lists can be found in her PhD dissertation: "The Arts Are All Her Own: How Women Artists Navigated the Revolutionary Era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60–1830"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8), 612–26. Her findings are now available in Paris A. Spies-Gans, *A Revolution on Canvas: The Rise of Women Artists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60–1830* (London: Paul Mellon Centre for Studies in British Art, 2022).

3.The quote about Capet is from Leo R. Schidlof, *The Miniature in Europe in the 16th, 17th,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4 vols. (Graz, Austria: 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1964), 1:126.

4.Laura Auricchio, *Adélaïde Labille-Guiard: Artist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Los Angeles: Getty Publications, 2009), esp. 91 and 107–8. On Capet's life, see Arnauld Doria, *Gabrielle Capet* (Paris: Les Beaux-Arts, 1934).

5.Spies-Gans, *A Revolution on Canvas*, 178.

6.For the figures on theatrical plays and performances, see Emmet Kennedy et al., *Theatre, Opera, and Audiences in Revolutionary Paris: Analysis and Repertory*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6), 379; Charles Théremin, *De la situation intérieure de la République* (Paris: Maradan, pluviôse an V), 11.

7.The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 of the original oil painting (present location unknown), 72 × 58 cm, can be found in Doria, *Gabrielle Capet*, 70, plate II. Doria presumably saw the painting himself, as he describes the color of the dress, the hat, and the kerchief. For him the color is that of a pigeon's throat with variable reflections between violet, rose, and blue. My interest in the connection to fashion was stimulated by Susan L. Siegfried, "The Visual Culture of Fashion and the Classical Ideal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Art Bulletin* 97, no. 1 (2015): 77–99.

8.Marie-Jo Bonnet, "Femmes peintres à leur travail: De l'autoportrait comme manifeste politique (XVIIIe–XIXe siècl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49, no. 2 (2002–3): 140–67; quote is on p. 141.

9.TheVigée Le Brun self-portait from 1782 is *Self-Portrait in a Straw Hat* (1782), held by the National Gallery in London. The Labille-Guiard self-portrait from 1782 can be seen in Auricchio, *Labille-Guiard*, 24 (its location is unknown). For the fashion prints, see Auricchio, *Labille-Guiard*, 45–46. Auricchio says that the prints date from around 1784. On the fashion press more generally, see Annemarie Kleinert, "La Naissance d'une presse de mod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in *Le Journalisme d'ancien régime: Questions et propositions*, ed. Pierre Rétat (Lyo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82), 189–97. See also Annemarie Kleinert, *"Le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ou la conquête de l'Europe feminine (1797–1839)*, Beihefte der Francia, no. 46 (Stuttgart: Jan Thorbecke Verlag, 2001), esp. the graph on p. 16.

10.There is enduring uncertainty about just when the drawing was executed, whether in 1790 or in the mid-1790s as Christoph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has suggested. He argues for the later date (1793–94) on the grounds of her thin face and especially the simplicity of her dress. But since the dress had already appeared in her self-portrait of 1784, I would argue for the earlier date, given the emphasis then on simplicity of self-presentation in the new regime. Christoph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Artiste et modèle dans l'atelier des Vincent," in *Marie-Gabrielle Capet (1761–1818): Une virtuose de la miniature* (Ghent: Snoeck Ducaju et Zoon, 2014), 10–25, but esp. the catalogue entry on p. 59.

11.Melissa Hyde makes a similar point about this drawing in her catalogue entry about it: "The Horvitz sheet thoughtfully engages with Enlightenment concepts of naturalness, transparency, and authenticity; ideas

very much in step with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in which Capet produced it." Alvin L. Clark Jr., ed., *Tradition & Transitions: Eighteenth-Century Art from the Horvitz Collection* (Paris: Horvitz Collection, 2017), 320. On the increase in female depictions of women artists, see Spies-Gans, *A Revolution on Canvas*, 186–99. On the smile in portraiture and its evolution at this time, see Colin Jones, *The Smile Re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Freund, *Portraiture and Politics*, 51, 68.

13.For the reference to nonchalance and reproductions of the painting and miniatures, se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65–67. Capet's miniature is reproduced on p. 65. The prints of the duke as deputy can be found in the FDRA.

14.On the supposed royalism of Labille-Guiard and Capet, se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16.

15.Bern Pappe, "Marie-Gabrielle Capet et la miniature sur ivoire," in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36–44.

16.On the scandal of the Marie Antoinette portrait, see Mary D. Sheriff, *The Exceptional Woman: Elisabeth Vigée-Lebrun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A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165–72. See also Amelia Rauser, *The Age of Undress: Art, Fashion, and the Classical Ideal in the 179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17.Madame [Albertine] Clément-Hémery, *Souvenirs de 1793 et 1794* (Cambrai: Presses de Lesne-Daloin, 1832), 25–26. On Clément-Hémery's editorial role, see Kleinert, "*Le Journal des dames*," 336–37.

18.On the general issue of dress, see Nicole Pellegrin, *Les Vêtements de la liberté: Abécédaire des pratiques vestimentaires en France de 1780 à 1800*, Librairie Du Bi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Aix-en-Provence: Alinea, 1989), 14–18, 151.

19.A full account can be found in François-Alphonse Aulard, *Le Culte de la raison et le culte de l'être supreme (1793–94)* (Paris: Félix Alcan, 1892). For the prints, see FDRA. David's plan for the 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 asserted that the young girls would be daughters who would promise to only marry men who had served the fatherland. M. J. Guillaume, *Procès-verbaux du Comité d'instruction publique de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6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1–1907), vol. 4 (1901), 350. White dresses had appeared in festivals in 1792 even before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republic. See Mona Ozouf, *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976]), 68.

20.On the multiple sources for Grecian-style dress, see Rauser, *The Age of Undress*. Her claim that Tallien wore a white dress as goddess of liberty in Bordeaux (p. 170) is contradicted by evidence provided in Maurice Ferrus, *Madame Tallien à Bordeaux pendant la Terreur: Étud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Bordeaux: Ferret et Fils, 1930), 128. The Bordeaux connection to Creole fashion remains speculative. It is asserted with no evidence provided by Madeleine Delpierre, *Dress in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 Caroline Beamis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09.

21.For what is known about cotton textile use by the enslaved in the Caribbean, see Robert S. DuPlessis, "What Did Slaves Wear? Textile Regimes in the French Caribbean," *Monde(s)* 1, no. 1 (2012): 175–91. See also Robert S. DuPlessis, *The Material Atlantic: Clothing, Commerce,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tlantic World, 165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For the Caribbean origins, see also Naomi Lubrich, "The Little White Dress: Politics and Polyvalence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Fashion Theory* 20, no. 3 (2016): 273–96. On the dress of Creole women in Saint-Domingue, see Albert Savine, ed., *Saint-Domingu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souvenirs du baron de Wimpffen). Annotés d'après les documents d'archives et les mémoires. Illustrations documentaires* (Paris: La Michaud, 1911), 160 (he also reports that enslaved women wore muslin skirts, p. 162). Rauser argue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the Terror was widely aestheticized through fashion," but offers little evidence for this. Rauser, *The Age of Undress*, 173. On the Salon of 1796

reception, see Tony Halliday, *Facing the Public: Portraitur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80–83.

22.The December 1798 quote comes from *Tableau général du goût, des modes et costumes de Paris*, no. 8 (2 nivôse an VII, December 22, 1798): 227. The subsequent quote comes from *L'Arlequin, ou Tableau des modes et des goûts*, 110. There is some uncertainty about the date of this journal, as none are given except on the first page, which indicates fall 1798, but according to Kleinert, "*Le Journal des dames*," it was published between August and October 1799 (p. 16). Muslin was an issue under the Old Regime, too, and the French crown tried to prevent its importation, finally giving up in the face of widespread smuggling in 1759. Hortense's account can be found in Jean Hanotaux, ed., *The Memoirs of Queen Hortense*, trans. Arthur K. Griggs, 2 vols. (New York: Cosmopolitan Book Corp., 1927), 1:33. On Napoleon's decree, see "Décret impérial relatif aux costumes de cour, et à ceux des membres des cours et tribunaux et des députations des colléges [*sic*] électoraux," January 4, 1811, in no. 342 of *Bulletin des lois de l'Empire français*, 4th series (Paris: L'Imprimerie Impériale, 1811), 14:3–4.

23.On the introduction of cashmere in France by the expedition to Egypt, see C. Alexandre Le Goux de Flaix, "Mémoire sur les laines et les moutons de Cachemire et du Boutan," *La Décade philosophique, littéraire et politique*, nos. 13–18 (1801): 389–97, 458–566. See also Susan Hiner, *Accessories to Modernity: Fashion and the Feminin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83–84. For an example of another portrait with the white dress and red or orange shawl, see the portrait by François Gérard of Thérésia Cabarrus (Madame Tallien) ca. 1805 available online from the Carnavalet Museum in Paris.

24.On the Titus cut, see *Tableau général du goût, des modes et costumes de Paris*, no. 1 (1 vendémiaire an VII, September 22, 1798): 14; Edmond-Denis de Manne, *Galerie historique des comédiens de la troupe de Talma; notices sur les principaux sociétaires de la Comédie Françoise depuis 1789 jusqu'aux trente premières années de ce siècle* (Lyon: N. Scheuring, 1866), 111.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alma and Mars can be found on the online site for the Comédie Française.

25.On the replacement of blond wigs with dark-haired ones, see *Tableau général du goût, des modes et costumes de Paris*, no. 7 (1 nivôse an VII, December 22, 1798): 195. For Tallien's blond wigs, see Edmond de Goncourt et Jules de Goncourt,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pendant le directoire*, 2nd ed. (Paris, E. Dentu, 1855), 418; Louis-Sébastien Mercier, *Le Nouveau Paris*, ed. Jean-Claude Bonnet (Paris: Mercure de France, 1994), 404.

26.Auricchio, *Labille-Guiard*, 93.

27.Bonnet, "Femmes peintres à leur travail," 157; Auricchio, *Labille-Guiard*, 105. The portrait, in a private collection, can be seen in a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 on p. 104. Roger Portalis, *Adélaïde Labille-Guiard (1749–1803)* (Paris: Imprimerie Georges Petit, 1903), 93; Doria, *Gabrielle Capet*, 24. I identify it as the same dress because it has a distinctive seam down the sleeve that appears in Capet's self-portrait of 1790 but not in Labille-Guiard's *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 On the turn toward miniatures, see Halliday, *Facing the Public*, 27.

28.Even Auricchio has to admit that Labille-Guiard appears "quite plain," especially in comparison to Capet, who assigns "fashionable femininity" to herself. Auricchio, *Labille-Guiard*, 108. Heather Belnap Jensen wants to see this painting as a portrayal of rather pious father-daughter connections, including those of Joseph-Marie Vien with Labille-Guiard, who is painting his portrait, and of Vincent with Capet. Heather Belnap Jensen, "Picturing Paternity: The Artist and Father-Daughter Portraiture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in *Interior Portraiture and Masculine Identity in France, 1789–1914*, ed. Temma Balducci, Heather Belnap Jensen, and Pamela J. Warner (London: Routledge, 2016 [2011]), 39–41.

29. *Explication des ouvrages de peinture, sculpture, architecture et gravure, des artistes vivans, exposés au Musée Napoléon, le 24 octobre 1808, second anniversaire de la bataille d'Iena* (Paris: Dubray, 1808), 13 (the parentheses in the quote are Capet's).
30. Paris Spies-Gans has helped me make sense of this painting. She shared with me her portfolio of images of women artists wearing white while working and also drew my attention to the disjointed temporal quality of the painting. See, for example, Marie-Nicole Dumont, b. Vestier, *The Author at Her Occupations* (*L'Auteur à ses Occupations*), shown at the Salon of 1793. The downplaying of Labille-Guiard should not be exaggerated, however, since the dress she is wearing has a gauze collar and is not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dress worn by Houdon's wife in Louis-Léopold Boilly's painting of 1804, *A Sculptor's Studio. Picture of a Family*. Emma Drouin has a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of Labille-Guiard's white dress; she finds it the "height of bourgeois fashion." Emma Rodney Drouin, "As the Eye Is Formed: Marie-Gabrielle Capet and the Artist in Her Studio," in *VERGES: Germanic & Slavic Studies in Review* 3, no. 1 (2020): 21, available online.
31. On the 1789 meaning of the plumed hat, see Freund, *Portraiture and Politics*, 64–65.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costume requirements for senators, see Frédéric Masson, *Napoleon and His Coronation*, trans. Frederic Cobb (London: T. Fisher Unwin, 1911), 333.
32. Capet's painting of Vincent, in a private collection, is reproduced in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p. 88. Capet's rendition in the studio scene is not identical, however; in the painting of Vincent alone, he is sitting, not standing, and he wears a strikingly ruffled jabot.
33. Analysis of the paint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figures and their ages can be found in Drouin, "As the Eye Is Formed." The fashion journal *L'Arlequin* claimed in the fall of 1799 that though wigs were still in use, they would soon fall victim to the "*cabal* hatched against [the fashion] by *hair worn in the Greek style*." *L'Arlequin, ou Tableau des modes et des goûts*, 81. Guérin does not have the high-collared vest that is seen on some of the men in the Capet painting. The Lefèvre painting is held by the Musée des Beaux-Arts of Orléans. The *jabot de point*, a fashion imported from England, was known as early as 1777. *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oise. Nouvelle Édition. Tome 1* (Nîmes: Chez Gaude, 1777), 628.
34. On the rivalry between Vincent and David, see Jean-Pierre Cuzin, *François-André Vincent (1746–1816): Entre Fragonard et David* (Paris: Arthena, 2013), esp. 281. On Capet's connection to Meynier, see Isabelle Mayer-Michalon, *Charles Meynier (1763–1832)* (Paris: Arthena, 2008), 102–3.
35. On the resistance of some critics to Boilly's success, see Halliday, *Facing the Public*, 140–42.
36.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complained in December 1807 that "the fashion or rather the rage for cashmere continues to increase: a shawl costs 50, 80, 100 *louis* [1 *louis* was the equivalent of 20 francs], and what is even more surprising, a striped cashmere for a dress fetches up to 5000 francs."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no. 70 (December 20, 1807), 564. Quote is from *Tableau général du goût, des modes et costumes de Paris*, no. 1 (1 Vendémiaire, an VII, September 22, 1798): 8. For a similar waistline and ribbon marking it as shown on Vien's daughter-in-law, see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no. 2 (16 Vendémiaire, an VII, October 7, 1798): illustration 3, facing p. 37. For the commentary on wigs and hair, see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no.88 (December 10, 1806): 702.
37. For the trimmed redingote, see also plate 701 in no. 28 (February 10, 1806). It is called a Turkish-style padded dressing gown (*douillette turque*) and is shown over a white undergarment. For the collar, see plate 769 in no. 86 (November 30, 1806), plate 774 in no. 90 (December 20, 1806), plate 854 in no. 67 (December 5, 1807), plate 856 in no. 69 (December 15, 1807), and plate 858 in no. 70 (December 20, 1807).
38. For the complaint about the directors' costumes, see *Le Citoyen français, Journal politique, commercial, littéraire*, no. 3 (26 brumaire an VIII, November 17, 1799): 4. The emergence and growing dominance of colored fabrics as well as silk and wool can be readily traced in the issues of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39. For Capet's last years, se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artiste et modèle," 23–24.

Chapter Four: Revolutionary Armies and the Strategies of War

1.Some of the material in this chapter first appeared in Lynn Hunt,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ed. Michael Broers and Philip Dwyer, vol. 1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127–45. The essential source is Jean-Paul Bertaud, *La Révolution armée: Les Soldats-citoyens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79).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R. R. Palm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For the figure on reserve muskets, see Georges Lefebvre, "Etudes sur le ministère de Narbonne: Troisième parti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 no. 107 (1947): 193–217, esp. 195.

2.The quote about the state of the army comes from Robert Johnstone, "French Frontier 1790–1791" (folio 8) in British Library, Western Manuscripts, Add MS 69096, Dropmore Papers (Series II), Vol. LIX. He goes on, however, to contest the severity of this judgment. The government estimates are to be found in "Apperçu de la balance du commerce de la France, Année 1789–Ensemble le relevé de la population, des finances, et forces militaires des principales puissances de l'Europe," British Library, Western Manuscripts, Add MSS 74100. Needless to say, these figures were approximations and did not represent the size of armies that would be available for specific campaigns. For the number of nobles among the generals, see Jean-Paul Bertaud, Daniel Reichel, and Jacques Bertrand, *L'Armée et la guerre*, vol. 3 of *Atla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1989), 31.

3.For the number of cannons, see Matti Lauerma, *L'Artillerie de campagne française pendant l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1956), 161. For the range of cannon, see Gunther E. Rothenberg,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Napole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76. On the battle itself, see Emmanuel Hublot, *Valmy, ou la défense de la Nation par les armes* (Paris: Fondation pour les études de défense nationale, 1987); Arthur Chuquet, *Valmy*, 11th ed. (Paris: Plon, 1927); and Jean-Paul Bertaud, *Valmy: La Démocratie en armes* (Paris: Julliard, 1970).

4.My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i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Campagne in Frankreich (23 août–20 octobre 1792)*, ed. A. Chuquet (Paris: Ch. Delagrave, 1884), 93.

5.Because of these anticipations of later strategy, T. C. W. Blanning argues that "revolutionary warfare was not revolutionary." 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87–1802* (London: Arnold, 1996), 17. In this he follows Peter Paret, "Napoleon and the Revolution in War," in Peter Paret, Gordon A. Craig, and Felix Gilbert,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3–42. For the most recent iteration of this view, see Jonathan Abel, *Guibert: Father of Napoleon's Grande Armé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16). On the ambiguities of Guibert's notion of a citizen army, see R. R. Palmer, "Frederick the Great, Guibert, Bülow: From Dynastic to National War," in Paret et al.,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esp. 107–8. Beatrice Heuser shows that Guibert gave up on the idea of a citizen army before his death in 1790; he preferred a small, well-trained professional force. Beatrice Heuser, "Guibert, Prophet of Total War?" in *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75–1815*, ed.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ö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49–67.

6.Some nobles may well have masked their heritage. For the army, see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82–84. For the navy, see Bertaud, Reichel, and Bertrand, *L'Armée et la guerre*, 29.

7.For the estimates of naval strength, see BL Additional Mss 74100. For the naval arms race, see Jonathan R. Dull, *The Age of the Ship of the Line: The British & French Navies, 1650–1815*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9), 119. On the general land-based strategy, see Arnaud Bernard, "Napoléon et la Marine ou l'histoire d'un malentendu," *Napoleonica. La Revue* 8, no. 2 (2010): 53–76. On the general background for the navy, see

Kenneth Johnson, "The French Navy," in *Fighting the Napoleonic Wars*, ed. Bruno Colson and Alexander Mikaberidze, vol. 2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207–28.

8. For the size of the regular army, see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6. On the volunteers and conscription in 1793, see Alan Forrest, *The Soldier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esp. 64–82. On deserters, see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259–60, and Alan Forrest, *Conscripts and Deserters: The Army and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map facing p. 3. For an exemplary local study, see Annie Crépin, *Révolution et armée nouvelle en Seine-et-Marne (1791–1797)* (Paris: Éditions du CTHS, 2008).

9. On the mutinies, see Samuel F. Scott, *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1787–179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In addition to Bertaud, *The Arm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ee Jean-Paul Bertaud, *La Vie quotidienne des soldats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Hachette, 1985). For the size of the cavalry, see Louis Auguste Picard, *La Cavalerie dans l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2 vols. (Saumur, France: 1895–96), 1:1, 28.

10. Ernest Picard, ed., *Au Service de la nation: Lettres de volontaires (1792–1799)*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14), 117–18.

11. Lorédan Larchey, ed., *Journal du cannonier Bricard, 1792–1802* (Paris: Librairie Ch. Delagrave, 1891), 11, 18, 49–62, 69.

12. Georges Six, *Les Généraux de la Révolution et de l'Empire* (Paris: Bordas, 1947), 5, 228–29.

13. Marc Martin, "Journaux d'armées au temps de la Conventi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44, no. 210 (1972): 567–605; John Albert Lynn,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Motivation and Tactics in the Army of Revolutionary France, 1791–94*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4), 124–40.

14. Lorédan Larchey, ed., *Journal de marche du Sergent Fricasse de la 127e brigade, 1792–1802* (Paris: n.p., 1882), 29.

15. Étienne Jolicler, ed., *Joliclerc: Volontaire aux armées de la Révolution, ses lettres (1793–1796)* (Paris: Perrin, 1905), 141–43.

16. Thomas Dodman, "Ordinary Radicalization: Becoming a Citizen-Soldie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4, no. 4 (2022): 751–89.

17. Lucien Duchet, ed., *Deux volontaires de 1791: Les Frères Favier de Montluçon* (Montluçon, France: A. Herbin, 1909), quotes on pp. 55, 77, 93.

18. Letter of November 5, 1793 quoted in Arthur Chuquet, *Quatre généraux de la Révolution: Hoche & Desaix, Kléber & Marceau: Lettres et notes inédites suivies d'annexes historiques et biographiques*, 4 vols. (Paris: Fontemoing, 1911–12), 1:13–14.

19. 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 *Mémoires sur les campagnes des armées du Rhin et de Rhin-et-Moselle, de 1792 jusqu'à la paix de Campo-Formio*, 4 vols. (Paris: Anselin, 1829), 1:7. On Saint-Cyr's career, see Christian d'Ainval, *Gouvion Saint-Cyr: Soldat de l'an II, Maréchal d'Empire, Réorganisateur de l'armée* (Paris: Copernic, 1981).

20. For the three examples, see Xavier de Pétigny, *Un Bataillon de volontaires (3eme bataillon de Maine-et-Loire) 1792–96* (Angers, France: Germain et G. Grassin, 1908), 26–42. For the past experience of lieutenant colonels elected in 1792, see Bertaud et al., *Atla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28.

21. *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 32 vols. (Paris: Bureau central, 1840–63), 23:608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4 ventôse an III reported in the issue of 16 ventôse an III, March 6, 1795).

22. *Mémoire adressé au public et à l'armée sur les opérations du conseil de la guerre, publié en 1789*, in *Oeuvres militaires de Guibert, publiées par sa veuve*, 5 vols. (Paris: Magimel, 1803), 5: esp. 201.

23.Dubois-Crancé presented the report of the war committee on February 7, 1793. *Rapport du Dubois-Crancé, au nom du comité de la guerre, sur l'organisation de l'armé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793), esp. 8, 26.

24.Still essential on these questions is Lynn,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on horse artillery, see esp. p. 204.

25.Especially important on the question of horse artillery is Lauerma, *L'Artillerie de campagne française* (see p. 42 on Gribeauval's unwillingness to take a firm stand on horse artillery and p. 126 on the reputation of the horse artillery). On the introduction of howitzers and improvement of mortars, see Ernest Picard and Louis Jouan, *L'Artillerie français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nd Nancy: Berger-Levrault, 1906), 73. On the cavalry, see Édouard Desbrière and Maurice Sautai, *La Cavaleri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Du 14 juillet 1789 au 26 juin 1794: La Crise* (Paris and Nancy: Berger-Levrault, 1907). For Murat's letter to his father about the cost of equipping himself, see Albert Lumbroso, ed., *Correspondance de Joachim Murat, chasseur à cheval, général, maréchal d'Empire, grand-duc de Clèves et de Berg (juillet 1791 à juillet 1808)* (Turin: Roux Frassati, 1899), 8. For Custine's view, see Arthur Chuquet, *L'Expédition de Custine* (Paris: Librairie Léopold Cerf, 1892), 235.

26.Antoine-Henri Jomini, *Précis de l'art de la guerre, ou nouveau tableau analytique des principales combinaisons de la stratégie, de la grande tactique et de la politique militaire*, 2 vols. (Paris: Anselin and Laguionie, 1838), 1:311.

27.For the April 1794 letter to two deputies on mission to the Army of the North, see Étienne Charavay, ed.,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de Carnot: Publiée avec des notes historiques et biographiques*, 4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2–97), 4:326.

28.The Scharnhorst quote can be found in Peter Paret, *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258 (from an essay of 1811 describing the fighting in 1793–94, emphasis in text); Saint-Cyr, *Mémoires sur les campagnes des armées du Rhin et de Rhin-et-Moselle*, 1:xliii.

29.For the 1791 regulation, see *Règlement concernant l'exercice et les manoeuvres de l'infanterie, du 1 août 1791*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791), esp. 51; Saint-Cyr, *Mémoires sur les campagnes des armées du Rhin et de Rhin-et-Moselle*, 1:xliv. For the comments of Noël, see Dodman, "Ordinary Radicalization," 771.

30.Lynn,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esp. 241–300.

31.My argument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umbers does not mean that I endorse the idea that the French were fighting a "total war" in the sense laid out by David Bell. In any case, my interest here is quite different because I am trying to highlight the inevitable tensions between individual ambitions and the need for collective discipline and undertakings. David A. Bell, *The First Total War: Napoleon's Europe and the Birth of Warfare as We Know I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7). A part of Grimoard's *Mémoire* is cited as the basis of a January 25, 1793, report to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by Edmond Dubois-Crancé on the state of the armies. P. J. B. Buchez and P. C. Roux, eds.,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contenant la narration des évènements . . . précédée d'une introduction sur l'histoire de France jusqu'à la convocation des Etats généraux*, 40 vols. (Paris: Paulin, 1834–38), vol. 24 (1836), 414. The full text can be found in "Mémoire sur la force des armées françaises et étrangères," in Philippe-Henri de Grimoard, *Recherches sur la force de l'armée française* (Paris: Treuttel et Würtz, 1806), 152–57, quotes on p. 156.

32.J. Mavidal and E. Laurent, eds.,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première série (1787 à 1799)*, 90 vols (Paris: P. du Pont, CNRS, 1867–1990), 76:316.

33.On the cult of the bayonet, see Lynn, *The Bayonets of the Republic*, esp. 185–91. On the slow recovery of cavalry, see Desbrière and Sautai, *La Cavaleri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esp. 427–35. For Carnot's speech, see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47:122.

34.According to Ken Alder, "Between 1700 and 1840, the design of the flintlock musket remained essentially constant." Ken Alder, *Engineering the Revolution: Arms and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1763–1815*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2. The lighter Gribeauval cannon had been introduced in the late

1770s and 1780s. Jean-Lambert-Alphonse Colin, *La Tactique et la discipline dans les armées de la Révolution: Correspondance du general Schauenbourg du 4 avril au 2 août 1793* (Paris: Librairie militaire R. Chapelot, 1902), xiv–xv.

35.Still essential on Napoleon's education and early years is Jean-Lambert-Alphonse Colin, *L'Éducation militaire de Napoléon* (Paris: Librairie militaire R. Chapelot, 1901).

36.Karl A. Roider Jr., *Baron Thugut and Austria's Respons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quote on p. 204. On Bonaparte's strategy, see Gabriel Défossé, *Montenotte: La Première Victoire de Napoléon Bonaparte* (Cagnes-sur-Mer, France: EDICA, 1986), esp. 54 for his appointment as commander.

37.Michael Broers, *The Napoleonic Empire in Italy, 1796–1814: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a European Contex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30–62; Larchey, *Journal du canonnier Bricard*, 189.

38.Bruno Colson, "Napoléon et la guerre irrégulière," *Stratégique* 93–94–95–96, no. 1 (2009): 227–58; H. Galli, ed., *L'armée française en Égypte, 1798–1801: Journal d'un officier de l'Armée d'Égypte* (Paris: G. Charpentier, 1883), 81; Paul Roussier, ed., *Lettres du Général Leclerc, Commandant en Chef de l'armée de Saint-Domingue en 1802* (Paris: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Colonies Françaises, 1937), 238 (letter of September 17, 1802, to the minister of the Navy).

39.Isser Woloch, *Napoleon and His Collaborators: The Making of a Dictatorship*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Wayne Hanley, *The Genesis of Napoleonic Propaganda, 1796–179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40.Wolfgang Kruse, "La Formation du discours militariste sous le directoire,"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no. 360 (April–June 2010): 77–102.

41.John A. Lynn, "Toward an Army of Honor: The Moral Evolution of the French Army, 1789–1815,"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16, no. 1 (1989): 152–73. Bertaud, *La Révolution armée*, 275. On the passivity bred by politicization, see Rafe Blaufarb, *The French Army, 1750–1820: Careers, Talent, Meri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3.

42.A. Hilliard Atteridge, *Joachim Murat: Marshall of France and King of Naples* (London: Methuen, 1911).

43.For Napoleon's views of Lannes in Italy, see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1er*: *Publiée par ordr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III*, 32 vols. (Paris: L'Imprimerie Nationale, 1858–70), vol. 1 (1858), 250–51, 261, 338–39; Margaret Scott Chrisawn, *The Emperor's Friend: Marshal Jean Lann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1). For Napoleon's strong feelings about Lannes, see Brian Joseph Martin, *Napoleonic Friendship: Military Fraternity, Intimacy and Sex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Durham: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Press, 2011), 40–67.

44.Victor Bernard Derrécagaix, *Le Maréchal Berthier, prince de Wagram & de Neuchatel*, 2 vols. (Paris: R. Chapelot, 1904–05), 1:107–9, 367–70. For the quote about Berthier, see *Correspondance de Napoléon 1er*, 1:261. See also François Houdecek, *Louis-Alexandre Berthier, Prince de Neuchâtel et de Wagram*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22).

45.Charles Antoine Thoumas, *Le Maréchal Lannes* (Paris: Calmann Levy, 1891), 65 (December 1799 letter).

46.Thoumas, *Le Maréchal Lannes*, 205 (his disenchantment with Napoleon after the capitulation of Danzig in 1807).

Chapter Five: Money, Self-Interest, and Making a Republic

1.On the general issue of debt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see James Macdonald, *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On accountability, see Jacob Soll, *The Reckoning: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For Hume's views, see the essay "Of Public Credit," in *Political Discourses by David Hume, Esq.*, 2nd ed. (Edinburgh: R. Fleming, 1752), esp. 130–35.

2.*The Spirit of Law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of M.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by Thomas Nugent]; with corrections and additions communicated by the author*, 2 vols. (Dublin: G. and A. Ewing and G. Faulkner, 1751 [1748]), 2:86 (book 22, chapter 17); Paul Leicester Ford,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10 vol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2–99), vol. 8 (1801–1806), 185. For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language about the national debt, see FRDA under the rubric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The same terms had appeared in the grievance lists submitted to the Estates General (they are available from the same source).

3.On the issuance of paper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see William Watts Folwell, "Evolution of Paper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Minnesota Law Review* 8 (1924): 561–78, esp. 570. The literature on John Law is extensive. The best introduction is François Velde, "John Law's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 no. 2 (May 2007): 276–79. See also John Shovlin, "Jealousy of Credit: John Law's 'System' and the Geopolitics of Financ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8, no. 2 (June 2016): 275–305. For a full account, see Bertrand Martinot, *John Law: Le Magicien de la dette* (Paris: Nouveau monde, 2015). On the vague character of memories about Law, see Rebecca L. Spang, "The Ghost of Law: Speculating on Money, Memory and Mississippi in the French Constituent Assembly," *Historical Reflections / Réflexions Historiques* 31, no. 1 (2005): 3–25.

4.Francesca Trivellato,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Credit: What a Forgotten Legend about Jews and Finance Tells Us about the Making of European Commerc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5.For the interest rate in Britain, see Nathan Sussman and Yishay Yafeh, "Institutional Reform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overeign Debt: Britain 1690–17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6, no. 4 (2006): 906–35. On the Bank of England, see Patrick K. O'Brien and Nuno Palma, "Not an Ordinary Bank but a Great Engine of State: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British Economy, 1694–184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76, no. 1 (February 2023): 305–29. For the proposals m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ee Shovlin, "Jealousy of Credit." On the Discount Bank, see Robert Bigo, *La Caisse d'Escompte (1776–1793) et les origines de la Banque de Fr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27). His estimate of French interest rates on the debt can be found on p. 43.

6.On the origins of life insuranc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ain and Catholic Europe, see Geoffrey Clark, *Betting on Lives: The Culture of Life Insurance in England, 1695–1775*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Arrêt du Conseil d'État du roi, Qui autorise à perpétuité l'établissement des Assurances sur la Vie, avec Privilege exclusive pendant quinze années, du 3 novembre 1787* (Paris: N. H. Nyon, Imprimeur du Parlement, 1788). A subsequent decree allowed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y to separate from the fire insurance company that provided its original organization. *Arrêt du Conseil d'État du roi, Relatif à la séparation des deux Compagnies d'Assurances, & au dépôt des sommes versées au Trésor Royale par celle des Assurances à Vie, du 27 juillet 1788* (Paris: N. H. Nyon, Imprimeur du Parlement, 1788). These were companies organized by Clavière and his associates.

7.For an overview of Clavière's remarkable life, see Édouard Chapuisat, *Figures et choses d'autrefois* (Paris: G. Cres, 1920), and Jean-Marc Rivier, *Étienne Clavière, 1735–1793: Un Révolutionnaire, ami des Noirs* (Paris: Panormitis, 2006). While I was writing this chapter, Mathieu Chaptal sent me a new doctoral thesis on

Clavière that has proved invaluable: Mathieu Chaptal, "De Genève à la France, la pensée républicaine d'Etienne Clavière: Réforme financière, Souveraineté populaire et Révolutions (1735–1793)" (PhD diss., Aix-Marseille Université, December 2020). It is now published as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Étienne Clavière (1735–1793*) (Le Kremlin-Bicêtre, France: Mare & Martin, 2024).

8.Clavière's political philosophy was first emphasized by Richard Whatmore.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Whatmore, "Commerce, Constitutions, and the Manners of a Nation: Etienne Clavière's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Economy, 1788–1793,"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2, nos. 5–6 (1996): 351–68.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Clavière, see M. J. L. Duval, ed., *Souvenirs sur Mirabeau et sur les deux premières assemblées législatives par Étienne Dumont* (Brussels: P. J. Meline, 1832), 299–300. The more recent work of Rivier, Whatmore, and Chaptal counters the earlier negative judgments of Clavière, such as that found in Herbert Lüthy, *La Banque protestante en France de 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 à la Révolution*, 2 vols. (Paris, 1959–61), esp. 2:715.

9.For Brissot's view of Clavière, see Claude Perroud, ed., *J.-P. Brissot: Mémoires (1754–1793)*, 2 vols. (Paris: Picard, 1911), 2:28. Robert Darnton has examined the indebtedness of Brissot to Clavière, who between the end of 1786 and the beginning of 1789 loaned Brissot more than 24,000 livres. Brissot paid back most but not all of it; he still owed nearly 3,700 livres. Robert Choate Darnton, "Trends in Radical Propaganda on the Ev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2–1788)" (PhD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1964), 416. I am indebted to Sarah Maza for this reference. Clavière figured out how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stock market, which is analyzed by T. J. A. Le Goff, "An Eighteenth-Century Big Bang? The Liberalization of the Paris Stock Market, 1774–1793," in *The Cultural Life of Risk and Innovation*, ed. Chia Yin Hsu, Thomas M. Luckett, and Erika Vause (New York: Routledge, 2021), 123–49.

10.The letter to Delessert of June 27, 1781, can be found in Archives Nationales (herafter AN) T//*/646/1. On Clavière's financial difficulties, see the letter to Jacques-Antoine Du Roveray, one of his fellow agitators from Geneva forced into exile (but who landed on his feet as a professor of law in Dublin), dated November 17, 1783: "The mishap at the Discount Bank has taken from me all of my resources and menaces my fortune with such a reduction that I would be truly close to being ruined." AN T//*/646/1.

11.For the letter to Delessert, see AN T//*/ 646/1, letter of December 20, 1783.

12.Louis Petit de Bachaumont, *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 depuis MDCCLXII jusqu'à nos jours; ou, Journal d'un observateur . . .* , 36 vols. (London: John Adamson, 1781–89), 28:54 (this is dated January 23, 1785, so before the government's decree annulling futures contracts). See also Jean Bouchary, *Les Manieurs d'argent à Pari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3 vols. (Paris: M. Rivière, 1939–43), esp. vol. 1. Considerations of length precluded any consideration of Clavière's investments in the French India Company. On the company, see Elizabeth Cross, *Company Politics: Commerce, Scandal and French Visions of Indian Empire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esp. 112.

13.*De la Caisse d'Escompte. Par le comte de Mirabeau* (n. p., 1785), 82. *Mémoires secrets* says the tract appeared on May 25 (29:45).

14.AN T//*/646/2, letter of July 16, 1785, to Delessert & fils of Lyon. See Bouchary, *Les Manieurs*, I:46–52, for a much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For a defense of Clavière's motives, see Richard Whatmore and James Livesey, "Étienne Clavière, Jacques-Pierre Brissot et les fondations intellectuelles de la politique des girondin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321 (July–September 2000): 1–26.

15.Bertrand Dardenne*, L'Eau et le feu: La Courte mais trépidante aventure de la première Compagnie des eaux de Paris (1777–1788)* (Paris: Editions de Venise, 2005). On the details of Clavière's actions in this regard, see Bouchary, *Les Manieurs*, 1:54–71.

16.AN T//*/646/3, letter of January 13, 1786.

17.O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life annuity, see George V. Taylor, "The Paris Bourse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1781–178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7, no. 4 (July 1962): 951–77. See also Bouchary, *Les Manieurs*, 1:80–88. For the amounts invested and owed in April 1786, see AN T//*/646/5, folios 1–9. These figures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pproximations, as Clavière had mortgaged some of his investments.

18.In April 1784, Clavière volunteered to send to Étienne Delessert a study done by Cazenove in London on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f life annuities based on one life and those based on many. In March 1786, he wrote to Cazenove asking for more precise information about life insurance practices in London. Letter to Delessert of April 25, 1784, in AN T//*/646/1. For the letter of March 23, 1786, see Bouchary, *Les Manieurs*, 1:89. Richard Price,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4th ed. 2 vols. (London: T. Cadell, 1783). The 4th edition's tables were the attraction for British and French investors.

19.This summary can hardly do justice to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negotiations involved. See Jean Bouchary, *Les Compagnies financières à Paris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3 vols. (Paris: Marcel Rivière, 1940–42), 3:9–58. On Condorcet's involvement with financiers and the general issue of life insurance, see Jean-Marie Thiveaud, "Condorcet: Prévoyance, finance et probabilités, entre raison et utopie," *Revue d'économie financière*, no. 49 (1998): 51–77. Clavière's behind-the-scenes role in setting up the competing fire insurance company is revealed by the fact that his son-in-law was named an administrator alongside Etienne Delessert, his banker. Bouchary, *Les Compagnies financières*, 3:15, footnote 12.

20.*Compagnie royale d'assurances, Prospectus de l'établissment des assurances sur la vie* (Paris: Lottin l'ainé, 1788), quote on p. 5. It is clear that Clavière is the author because his name and address are given for all inquiries at the end, on a page with no number. For the mutual aid society for servants, see *Compagnie d'assurances sur la vie, Extrait des registres de l'administration de ladite Compagnie, du mercredi 28 juillet 1790*, "Proposition pour l'établissement d'une caisse de secours en faveur des domestiques de tout age" (Paris: Lottin l'ainé, 1790).

21.On the fate of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see Bouchary, *Les Compagnies financières*, vol. 3.

22.For Clavière's investment in French government loans, see AN T//*/646/5, folios 2 and 3. On US debt issues, see James C. Riley,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Finance and the Amsterdam Capital Market, 174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esp. 188.

23.Étienne Clavière and J. P. Brissot, *De la France et des États-Unis* (London: n.p., 1787); on paper money, see p. 318. The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Considerations on the Relative Situation of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ondon: Logographic Press, 1788). Clavière noted his financial contribution of nearly 1,000 livres to the book's publication in London in his account book, AN T//*/646/5, folio 240 (March 14, 1788). On Brissot, see Régis Coursin, *Jacques-Pierre Brissot: Sociologie historique d'une entrée en révolution* (Rennes, Fran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23). Brissot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and least studied of the major revolutionary figures.

24.See the preface by Marcel Dorigny to *De la France et des États-Unis: Étienne Clavière et J. P. Brissot de Warville* (Paris: Éditions du C.T.H.S., 1996), 7–29. On the utopian dimension, see also Darnton, "Trends in Radical Propaganda," 91–130. On the various networks interested in this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ee Marcel Deperne, "Le Réseau d'affaires francophone dans la haute vallée de l'Ohio et le Kentucky entre 1783 et 1815,"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46, no. 4 (November 2023): 525–58. On the US securities market, see Niccolò Valmori, "Looking for New Markets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The U.S. Securities Market, 1789–1804," in Hsu, Luckett, and Vause, *The Cultural Life of Risk and Innovation*, 43–60.

25.[J. P. Brissot and Étienne Clavière], *Point de banqueroute, ou lettres à un créancier de l'État* (London: n.p., 1787), 5, 17, 18.

26.The question of a constitution is much more prominent in the longer version of *Point de banqueroute* published in London in 1788.

27.Quotes from *Discourse on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in Paris a Society for. . .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and of Negro Slavery* in Lynn Hunt,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A Brief Documentary History*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1996), 58–59.

28.The republican substrate of Clavière's views was emphasized by Whatmore, "Commerce, Constitutions," and Richard Whatmore, *Against War and Empire: Geneva,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then further elaborated in Chaptal,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who emphasizes Clavière's indebtedness to his fellow Genevan Rousseau.

29.The register of the meetings of the society can be found in Marcel Dorigny and Bernard Gainot,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1788–1799: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Paris: Éditions UNESCO, 1998). See pp. 128–29 for Clavière's intervention on April 8, 1788.

30.On the proslavery agitation more generally, see Lauren R. Clay, "Liberty, Equality, Slavery: Debating the Slave Trade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8, no. 1 (March 2023): 89–119. On Clavière's participation and Clarkson's attendance, see the register of the meetings in Dorigny and Gainot,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243–70. In fact, Clavière did not attend much of the time that Clarkson was there, returning in March 1790. The register ends in May 1790, though the meetings continued. For the younger Mirabeau quotes, see J. Mavidal and E. Laurent, eds.,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de 1787 à 1860, première série (1787 à 1799)*, 90 vols (Paris: P. du Pont, CNRS, 1867–1990), 12:76.

31.On the debt more generally, see T. J. A. Le Goff, "Les Crises de la dette nationale en France, 1724–1815," in *Les Crises de la dette publique: XVIIIe–XXIe siècle*, ed. Gérard Béaur and Laure Quennouëlle-Corr (Paris: Comité pour l'histoir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2021), 263–86. I am grateful to the author for sending this chapter to me. [Étienne Clavière], *De la foi publique envers les créanciers de l'état. Lettres à M. Linguet sur le No CXVI de ses Annales par M. **** (London: n.p., 1788). The term "public confidence" (or "public faith") appears over and over again. Public confidence goes along with "all the truths that are useful to the grandeur of nations, to the peace of the human race, to the happiness of peoples" (quote from p. 149).

32.*De la foi publique*, quotes from pp. 76 and 31. The development of Clavière's republicanism is the major theme of Chaptal,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33.The importance of Clavière's residence is noted in M. J. L. Duval, ed., *Souvenirs sur Mirabeau*, 42. For Clavière's economic views ca. June 1789, see Étienne Clavière, *Opinions d'un créancier de l'État, sur quelques matières de finance importantes dans le moment actuel par M. Clavière* (London: n.p., June 1789). There are at least two versions of this pamphlet.

34.*Le Courrier de Provence, servant du suite des Lettres du Comte de Mirabeau à ses commetans*, no. 48 (29 September–1 October 1789), 18–24.

35.The complicated ins and outs of the financial issues are best followed in Marcel Marion,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depuis 1715*, 6 vols. (Paris: Librairie Arthur Rousseau, 1914–31), esp. vol. 2 (1789–1792).

36.For a description of Clavière's ceaseless activity, see M. J. L. Duval, ed., *Souvenirs sur Mirabeau*, 300; Étienne Clavière, *Dissection du projet de M. l'Évêque a'Autun* [Talleyrand] *sur l'échange universel et direct des créances d'État contre les biens nationaux* (Paris: L'Imprimerie du Patriote Français, July 1790); *Le Patriote français* was Brissot's newspaper. At the same time, Clavière published a *Lettre de l'auteur à M. Cerutti* rejecting any negative comparison with the paper money set up by John Law.

37.Étienne Clavière, *Réponse au mémoire de M. Necker, concernant les assignats, et à d'autres objections contre une création qui les porte à deux milliards* (Paris: L'Imprimerie du Patriote Français, September 15 and 24, 1790), esp. p. 29 for the value of church lands and pp. 63 and 110–13 for the references to Smith and the English situation. This pamphlet was published in two parts but paginated consecutively.

38. *Le Courrier de Provence*, no. 193 (the previous number included discussions of the sessions of September 15–17, 1790), 320. On the Genevan collaborators with Mirabeau, see J. Bénétruy, *L'Atelier de Mirabeau: Quatre proscrits genevois dans la tourmente révolutionnaire* (Paris: A. and J. Picard, 1962).
39.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19:264, 267. For the letter to J. Mauvillon about the assignats, see *Mémoires biographiques, littéraires et politiques de Mirabeau / écrits par lui-même, par son père, son oncle et son fils adoptif*, 12 vols. (Paris: Delaunay, 1834–36), 8:78.
40. Étienne Clavière, *Réflexions sur les formes et les principes auxquels une nation libre doit assujétir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 . . .* (Paris: Belin, Desenne, Bailly and Bureau du Patriot français, 1791), esp. 5–7. On the staggering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National Assembly, see Marion,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2: esp. 245–52.
41. For Clavière's response to Dillon, see especially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à Arthur Dillon* (Paris: Imprimerie du Patriote Français, March 10, 1791), reprinted in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bolition de l'esclavage*, 12 vols. (Paris: Éditions d'histoire sociale, 1968), 8: no. 7 (n.p.); Médéric Moreau de Saint-Méry, *Considérations présentées aux vrais amis du repos et du bonheur de la France: A l'occasion des nouveaux mouvemens de quelques soi-disant amis-des-noir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791).
42. Étienne Clavière, *Adresse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 à l'Assemblée Nationale, À toutes les villes de commerce . . .* (Paris: Imprimerie du Patriote Français, March 1791), 4, 32, 42.
43. See, for example,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34:526, 603, 721–23.
44. *La Chronique du mois ou les cahiers patriotiques*, November 1791 (Paris: L'Imprimerie du Cercle Social, 1791), 3–44. For the petition to the assembly on November 5, 1791, see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34:642–49.
45. *La Chronique du mois*, November 1791, 4.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bt, see pp. 8–35.
46. *La Chronique du mois*, December 1791, 3. For the pamphlet in response to critics, "Réflexions sur les remboursements," see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35:494–97. For the vote against suspension, see 35:677.
47. *La Chronique du mois*, January 1792, 105, 117–18, 129, 132, 134. Clavière added further reflections to this first essay in February and March 1792. In these he floated the ideas of an alliance with Great Britain and reminting of silver and gold coins. He then published all three parts in a 112-page pamphlet. *La Chronique du mois*, February 1792, 66–95, esp. 81; March 1792, 60–86.
48. On Clavière's challenges as minister, see Pierre-François Pinaud, "Clavière: Ministre des contributions et revenus publics, agioteur et réformateur," *Revue historique*, no. 289 (April–June 1993): 361–81. These issues are treated in much greater detail in Chaptal,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783–897.
49.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determining Clavière's role in the Batz conspiracy, see Chaptal, *D'une revolution à l'autre*, 864–65.
50. Étienne Clavière, *Suite du compte rendu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par le Ministre, le 31 janvier 1793, l'an second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Executive du Louvre, 1793), 3–19.
51. Clavière, *Suite du compte rendu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26.
52. On the American debt, see F. A. Aulard, ed., *Recueil des actes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Avec la correspondance officielle des représentants en mission et le registre du Conseil exécutif provisoire*, 2 vols.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89–1923), 1:224–25; *Actes et 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négociations qui ont eu lieu entre la France, et les État Unis . . . depuis 1793, jusqu'à la conclusion de la convention du 30 septembre, 1800*, 3 vols. (London: J. B. G. Vogel, 1807), esp. vol. 1; Anne Cary Morris, ed., *The Diary And Letters of Gouverneur Morris: Ministe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France . . . Etc.*, 2 vols.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888), 1:579.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t this first attempt, Clavière sought mone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help the French in Saint-Domingue. Despite the desperation for funds, Clavière advocated suppressing the lottery established by the monarchy; suppression was only voted several months after Clavière's departure.

On reminting, see Chaptal, *D'une révolution à l'autre*, 889–96. On the 20 sous coin, see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50:69. On the general question of coinage, see Charles Saunier, *Augustin Dupré: Orfèvre, médailleur et graveur général des monnaies* (Paris: Société de propagation des livres d'art, 1894).

53. Rebecca L. Spang, *Stuff and Money in the Tim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0; Marion, *Histoire financière de la France*, 3:3–6.
54. On the proportion of taxes to expenses, see S. E. Harris, *The Assigna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51. I have used Harris's figures for monthly revenue of taxes and those for yearly expenses, in both cases using the nominal value. If the depreciated values are used, the results would be virtually the same, 25 percent and 10 percent. Harris shows that tax revenue increased after the low point in 1790. Christian Aubin provides figures for the number of assignats printed and for their relative value: "Les Assignats sou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Un exemple d'hyperinflation," *Revue économique* 42, no. 4 (1991): 745–61, esp. 756 and 760. October 1794 was chosen for the sake of comparison because the number of assignats had doubled by then. A recent study has shown that hyperinflation occurred after the Jacobins fell from power in July 1794, in other words, long after Clavière's removal. Bryan P. Cutsinger, Louis Rouanet, and Joshua S. Ingber, "Assignats or Death: The Politics and Dynamics of Hyperinflation in Revolutionary France,"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57 (August 2023), available online from Science Direct.
55. *Correspondance du ministre Clavière et le général Montesquiou, servant de réponse au libelle du général contre le ministre* (n.p.: n.d.), 66 pp. For a balanced view of Clavière's ambiguous position on Geneva, see Chaptal, *D'une révolution à une autre*, 897–930.
56. François-Alphonse Aulard, ed., *La Société des Jacobins; recueil de documents pour l'histoire du Club des jacobins de Paris*, 6 vols. (Paris: Librairie Jouaust, 1889–97), 5:77, 106, 136.
57. Étienne Clavière, *Exposé sommaire de la conduite de Clavière, ex-ministre des contributions fait par lui-même, Adressé à ses juges, ses concitoyens, et à ses ennemis* (Paris: n.p., an II [1793]), 1–19.
58. Clavière, *Exposé sommaire*, 19–54.
59. Clavière, *Exposé sommaire*, 35–37, 54.
60. For the fate of Clavière's relatives, see Chapuisat, *Figures et choses d'autrefois*, 164–66. For the Clavière quote, see Clavière, *Exposé sommaire*, 53.

Epilogue: Self, Society, and Equality

1. Her evolution is most clearly traced in Arnauld Doria, *Gabrielle Capet* (Paris: Les Beaux-Arts, 1934), 70–79. The paintings can be seen in Christoph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1761–1818): Une virtuose de la miniature* (Caen, France: Musée des Beaux-Arts de Caen, 2014), 79, 67, and 69.
2. For a picture of this miniature in a private collection, see Marcheteau de Quinçay, *Marie-Gabrielle Capet (1761–1818)*, 77.
3. Thomas Dodman, "Ordinary Radicalization: Becoming a Citizen-Soldier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94, no. 4 (2022): 751–89; quote on p. 773; Ernest Picard, ed., *Au Service de la nation: Lettres de volontaires (1792–1799)* (Paris: Librairie Félix Alcan, 1914), 31, 39, 62, 216.
4. Étienne Clavière and J. P. Brissot, *De la France et des États-Unis* (London: n.p., 1787), footnote on p. 96.

Index

Page numbers listed correspond to the print edition of this book. You can use your device's search function to locate particular terms in the text.

Note: Page numbers in *italics* refer to illustrations.

abolitionist movement
Brissot and, 129–30, 136
Clavière and, 9, 125, 129–30, 136, 146, 152
Condorcet and, 129, 130
emergence of, 3
Friends of Blacks, Society of, 129–31, 136, 137
Millar and, 33–34
Mirabeau and, 129
Actes des apôtres (newspaper), 47
actuarial tables, 6, 8, 9, 119, 125
Addison, Joseph, 13–14
Anarchist, The (Petit), 53, 58–59, *59*, 60
ancien régime, 37
Armand-Désiré, Duke of Aiguillon, 72–73
armed forces. *see* revolutionary armies
armies. *see* revolutionary armies
artillery, 91, 102–3, 107
assignats, 133–35, 138, 139–40, 141–44, 145, 146

Augustus the Strong, 16
Auricchio, Laura, 69–70
autonomy
increased, in revolutionary armies, 92
social determinism *versus*, 1–2, 3, 4, 7, 19, 114, 148–49

Bache, Rose-Céleste, 80, 85–86
Bank of England, 118
Bank of Saint Charles, 123
Bastille prison, 34, 128, 132
Batz, Jean, Baron de, 140
Beauharnais, Hortense, 77
Beauharnais, Joséphine de (Joséphine Bonaparte), 76, 77, 87
Beaumarchais, Pierre Caron de, 123
Bentley, Thomas, 17
Berthier, Louis-Alexandre, 109, 110, 112–13
bills of exchange, 117–18, 119
Boilly, Louis-Léopold, 55, 85
Bonaparte, Caroline, 111
Bonaparte, Napoleon. *see* Napoleon Bonaparte
Boulton, Matthew, 17
Boyer de Nîmes (Jacques-Marie Boyer-Brun), 43–47, 49, 51
Bricard, Louis, 95, 96
Brissot, Jacques-Pierre
abolitionist movement and, 129–30, 136
arrest, 145
Chronique du mois and, 54, 137
criticism of speculators, 122, 123
death, 146
deputy to Legislative Assembly, 137, 140
Estates General and, 132
friendship with Clavière, 8–9, 120
Girondins and, 137, 140, 144
inte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27–28, 152–53
on Louis XVI's execution, 140
national debt and, 128, 139
paper money and, 127
republican political principles, 129–30
transnational vision, 129–30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finance and, 129

Calonne, Charles-Alexandre de, 139

Calvinism, 27, 43, 119
Campbell, Colin, 29–30
Capet, Marie-Gabrielle
as assistant to artist, 80, 81, 83–84, 88, 151
attention to fashion, 82–83, 85, 86–87, 88, 151
attention to generational change, 83, 85
death, 88
early career, 66–67, 68
Labille-Guiard's paintings of, *67*, 67–68, 79
as Labille-Guiard's pupil, 7–8, 66, 72, 79, 83
miniatures, 66, 71–73, *73*, 79–80, 83–86, 88, 151
painting of Labille-Guiard (*Studio Scene*), 66, 80–84, *81*, 85–86, 88, 151
Portrait of a Woman and Her Child, 151
protégée of Vincent, 66
rise from humble origins, 7, 65, 79, 151
self-portraits, 68, *69*, 70, 71, 79, 151
in *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 (Labille-Guiard), *67*, 67–68, 79, 151
Young Man in a Blue Jacket and Yellow Vest, 151
Caracalla cut for hair, 86
caricatures. *see* prints as revolutionary imagery
Caritat, Nicolas de. *see* Condorcet, Marquis de
Carnot, Lazare, 100–101, 104, 107
Carreaux de Rosemond, Marie Marguerite, *67*, 67–68
cashmere shawls, 73, 77, 85–86
cavalry, 92, 94, 102, 103, 106, 111
Cazenove, Theophilus, 127
censorship in France, 37, 38, 39, 127, 153
Chronique du mois (Chronicle of the month), 54, 137
civilization
stage theory, 20–22, 25
women's status and level of, 7, 12, 19–20, 21–22
Clarkson, Thomas, 130
Clavière, Étienne
abolitionist movement and, 9, 125, 129–30, 136, 146, 152
arrest and interrogation, 145–46
assignats and, 133–35, 138, 139, 140, 142–44, 145
belief in equality, 152–53
Chronique du mois and, 54, 137
criticism of speculators, 121–22, 123, 139
death, 9, 146
Discount Bank and, 120–21, 133
on disorder in state finances, 135–36, 141–42
early career, 119
Estates General and, 131–32
as finance minister, 139, 140–45, 149

fire insurance company, 123, 125, 126
French politics and, 8–9
friendship with Brissot, 8–9, 120
friendship with Mirabeau, 8
Genevan politics and, 8, 119–20
Girondins and, 137, 138, 144, 147
inte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27–28, 152–53
on invasion and annexation of Geneva, 144
Legislative Assembly and, 138
life annuities and, 124–25, 126–27
life insurance company, 8, 119, 123–24, 125–26, 140, 145
national debt and, 126–27, 128, 131, 137, 138–39, 153
paper money and, 127, 132–34
Paris Water Company and, 123–24
republican political principles, 125, 127, 129–30, 131, 138
on sale of church properties, 133–34, 139
short selling and, 120, 139
support for war with Austria, 138, 139
transnational vision, 129–30
and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finance, 129, 137, 153
watchmaker colony proposed in Ireland, 120, 125
Clavière, Jean-Jacques, 146
Clément-Hémery, Albertine, 74
coffee, 11, 15
coffeehouses, 11, 13
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 42, 100, 101
Comte, Auguste, 5, 62
Condorcet, Marquis de
abolitionist movement and, 129, 130
Chronique du mois and, 54, 137
deputy to Legislative Assembly, 137
Girondins and, 54, 137, 138
Mercier and, 54
on social science, 4–5, 62, 125
suicide, 5, 146
worries about assignats, 134
Courrier de Provence (newspaper), 133, 134
Courrier français (newspaper), 49
Crèvecoeur, J. Hector St. John de, 127
Cruikshank, Isaac, 61
cultural relativism, 18, 22
Custine, General, 95–96, 99, 103

Danger of Wigs, *The* (print, Vernet), 53, 55
Daunou, Pierre, 54
David, Jacques-Louis, 74–75, 78, 83
Décade philosophique, *La* (newspaper), 61
Delessert, Étienne, 120–21, 123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 5, 62
De Vinck collection, 38
de Vinck de Deux-Orp, Eugène, 38
Dialogues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dyce), 31
Dillon, Arthur, 136
Discount Bank (*caisse d'escompte*), 118, 120–21, 121, 123, 126, 133
Clavière and, 120–21, 133
establishment of, 118
National Assembly and, 133
paper money issued, 133
Paris Water Company and, 123
suppression of, 121, 126
Discourse on 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Inequality among Men (Rousseau), 3
Dodman, Thomas, 97
domesticity, 12–13, 14, 15
draft evasion, 94
Dubois-Crancé, Edmond, 102
Duboys, Jean-Jacques, 100
Ducancel, Charles-Pierre, 52
Dumouriez, General, 95, 98, 99, 140–41
du Pont de Nemours, Pierre Samuel, 122, 134
Dutch VOC (East India Company), 16

Edinburgh Musical Society, 30
Égalité (Quéverdo), 149–50, *150*
equality
among soldiers, 151–52
Boyer opposition to, 46
Clavière's belief in, 152–53
French Revolution and, 153, 154
in French revolutionary prints, 149–50, *150*
"Essay on the Phys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Regeneration of the Jews" (Grégoire), 45
Estates General
called by Louis XVI, 131–32
costumes of deputies, 40, 82
elections, 43
Friends of Blacks and, 130
king's debt and, 117

portraits of deputies, 40–41, *41*, 70
see also National Assembly

Family of Three at Tea, *A* (Collins), *13*
fashion
Capet's attention to, 82–83, 85, 86–87, 88, 151
Caracalla cut for hair, 86
in caricatures and political prints, 55–56, 58–60
cashmere shawls, 73, 77, 85–86
fashion plates, *84*, 85, *87*
fashion prints, 59, 61, 70, 87
frock coats, 58, 60, 82, 83
generational change in, 83, 85
jabots, 83, 85
knee breeches, 40, 58, 60, 82, 85–86
in Labille-Guiard's paintings, 69–70
Napoleon's rules about, 77, 82, 87
pantalons (nankeen trousers), 58, 85, 86
political and social meanings, 56, 60, 70, 80
rapid changes during French Revolution, 60, 70
Titus cut for hair, 77–78, 83, 86
white tunics and chemise dresses, 73–77, 78, 86
wigs, 56, 57, 60, 77–78, 82–83, 86
see also incroyables; *merveilleuses*
Favier, Gilbert, 98
Female Spectator (Haywood), 14
Festival of Reason, 74–75
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 74–75
fire insurance companies, 123, 125, 126
Folly of the Day, *The* (play), 56
Folly of the Day, *The* (print, Boilly), 53, 55, 56
Forbes, Duncan, 28, 30
Fordyce, David, 31, 32
Frederick the Great, 102
French National Library, 38, 41–42
French Revolution
beginning date, 4, 8, 37
British reactions to, 34–35
equality and, 153, 154
social science birth during, 4–6, 37, 61–63
see also specific topics
French Revolution Digital Archive, 39, 42
Freund, Amy, 40, 71

Fricasse, Jacques, 97
Friends of Blacks, Society of, 129–31, 136, 137
frock coats, 58, 60, 82, 83

Gérard, Michel, 40, *41*, 56, 70, 71
Gillray, James, 61
Girondins
Brissot and, 137, 140, 144
Clavière and, 137, 138, 144, 147
Condorcet and, 54, 137, 138
on Louis XVI's guilt, 140
Mercier and, 49–50, 54
opponents of Robespierre, 49
support for a republic, 138
support for war with Austria, 138, 139–40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61, 91
Grégoire, Henri, 45
Gribeauval, Jean-Baptiste Vaquette de, 102–3
Grimoard, Philippe de, 106, 108
Group of Artists in Jean-Baptiste Isabey's Studio (Boilly), 85
Guérin, Pierre-Narcisse, 83
Guibert, Jacques, 92, 102, 104, 105
Guiut, Guillaume, 100

Hamilton, William, 75
Hart, Emma (Lady Hamilton), 75
Haywood, Eliza, 14
History of the Caricatures of the Revolt of the French (Boyer), 43–44
Hoche, Lazare, 99
Home, Henry (Lord Kames), 20, 25
horse artillery, 102–3
Hume, David, 25, 31, 116–17

ideology, defined, 5
I Knew We'd Have Our Turn (print), 48
incroyables (incredibles), 52–53, 56, 58–59, 61, 78, 83
see also fashion
Incroyables, *Les* (Vernet), 53, 55, 61
individualism
in art, 70, 88
individual autonomy *vs.* social determinism, 1–2, 3, 4, 7, 19, 114, 148–49

individual initiative in French army, 8, 105, 107, 113, 114, 152
tea and, 11–36
Inside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play and print), 50–52, *52*
Irvine, Charles, 30
Isabey, Jean-Baptiste, 85

jabots, 83, 85
Jean-Jacques Rousseau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Revolution (Mercier), 54
Jefferson, Thomas, 117
Jewish moneylenders in caricatures, 45
Joliclerc, François-Xavier, 97
Jomini, Antoine-Henri, 103–4
Joséphine, wife of Napoleon, 76, 77, 87
Journal de la cour et de la ville (newspaper), 47–48
Journal des dames et des modes (fashion journal), 74, 86, *87*
Journal des révolutions de l'Europe (newspaper), 48
Journal du peuple (newspaper), 43
Julien, Joseph-Laurent, 56, *57*

Kames, Lord (Henry Home), 20, 25
Kauffman, Angelica, 65
Kellermann, François, 91
knee breeches, 40, 58, 60, 82, 85–86

Labille-Guiard, Adélaïde
Capet as pupil, 7–8, 66, 72, 79, 83
Capet's oil painting of, 66, 80–84, *81*, 85–86, 88, 151
death, 79
divorce, 72, 153
fashions and costumes in paintings, 69–70
marriage to Vincent, 66, 79, 153
paintings of Capet, *67*, 67–68, 79
portraits of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71–72
residences during Revolution, 72
in Royal Academy, 66, 71
scholarly attention to, 65
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 *67*, 67–68, 69–70, 79, 80
Lafayette, Marquis de, 48, 90, 98–99, 129
Lafitau, Joseph-François, 22–23
Lamb, Frederick and William, 26–27
Laneuville, Jean-Louis, 76

Lannes, Jean, 109, 110, 111–14
Lavoisier, Antoine, 129
Law, John, 117
Leclerc, General, 109
Lefèvre, Robert, 83
Legislative Assembly, 107, 137, 138, 139–40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Crèvecoeur), 127
lettres de cachet, 128
Levachez, Nicolas-François, 41
life annuities, 124–25, 126–27
life insurance
actuarial tables, 6, 8, 9, 119, 125
Clavière's company, 8, 119, 123–24, 125–26, 140, 145
origins of, 118–19
Paris Water Company and, 123–24
Linguet, Simon, 131
Locke, John, 14, 18
London East India Company, 30
Louis-Philippe, Duke of Orléans, 72
Louis XVIII, king, 99
Louis XVI, king
condemned to death, 72
declaration of war with Austria, 90, 139–40
deposed, 90
Estates General called by, 131–32
execution, 140
house arrest, 140
National Convention and, 49–50
portrait, *41*
return to Paris after attempt to flee, 48
Lynn, John, 105

Marie Antoinette, 73–74, 76, 78, 90
marine insurance, 118, 119, 125
Mars, Mlle. (Anne Françoise Hyppolyte Boutet Salvetat), 72–74, *73*, 74, 77–79, 81, 85
Masséna, André, 8
Melbourne, Lady, 26
Mercier, Louis-Sébastien
Chronique du mois and, 54
Condorcet and, 54
criticism of, 60–61
on Louis XVI's guilt, 49–50
political views and engagement, 49–50, 54, 61

reaction to prints, 42, 49, 50–53, 55–60
on rentiers who invested in state bonds, 56–57
Rousseau and, 54
on social systems and social mechanisms, 53–55, 62
on styles associated with *incroyables*, 78
support for the Girondins, 49, 54
time in prison, 49, 50, 54
"M . . . r [Mercier], An Ass Like No Other" (print), 50, *51*
merveilleuses (marvelous females), 52–53, 56, 61, 78
see also fashion
Mérveilleuses, *Les* (Vernet), 53, *55*, 55–56, 61, 78
Meynier, Charles, 83, 84, 85
Mill, John Stuart, 5
Millar, John
abolitionist movement and, 33–34
conversation as sign of civilization, 31–32
family life, 25, 26–27, 36
on Native Americans, 23–24
nontraditional lectures, 7, 25–26, 35
Observations, 20–21, 25–26, 27, 37
stage theory and, 20–22, 32–33, 149
status of women and level of civilization, 7, 21–22, 23, 25, 26–27, 31–32, 149
travel books and, 22, 23, 36, 62
Mirabeau, Comte de
abolitionist movement and, 129
as an agent of the court, 144
on assignats, 135
criticism of speculators, 122–23
death, 137
Estates General and, 132
friendship with Clavière, 9, 120
support of Panchaud, 126
"modernity," 19
Moeurs des sauvages amériquains (Lafitau), 22
Montesquieu
on climate, 23
danger of luxury and dissipation, 32–33
focus on the East, 22, 23, 32
on national debt, 116
Persian Letters, 19
Spirit of Laws, *The*, 19, 116
on status of women, 19–20
"thrall of manners," 19, 33
on types of political regimes, 19, 20, 22
Montesquiou-Fézensac, Anne-Pierre, 144, 146

Moratín, Leandro Fernández de, 62
Moreau de Saint-Méry, Médéric, 136
“Mountain” (Robespierre supporters), 75, 144
Muir, Thomas, 34–35
Murat, Joachim, 8, 103, 109, 110, 111, 112
Mure, Elizabeth, 15
mutinies, 93, 94

Napoleon Bonaparte
ascent to power, 8, 87
coronation, 82
coup in 1799, 87, 109–11, 112, 113
defeating 1795 insurrection, 111
First Consul, 109
fostering individual talents, 8
Italian campaign, 111, 112, 113
patronage, 114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110–11, 114
rapid rise in military, 107–8
return to Paris from Egypt, 109
rules about fashion and fabric, 77, 82, 87
Titus cut, 77–78
National Assembly
on Discount Bank, 133
formation from Estates General, 132
Friends of Blacks and, 130
political rights of free men of color, 137
portraits of deputies, 71–72
reforms of army, 92
Salon monopoly ended, 65
theatrical monopolies abolished, 38
see also Estates General
National Convention
financial policies, 126, 141
Girondins and Jacobins, 49–50, 54
interactions with army, 95, 96, 101, 106
monarchy abolished by, 95, 140
national debt
Brissot and, 128
Clavière and, 126–27, 128, 131, 137, 138–39, 153
and development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16
Hume and, 116–17
Legislative Assembly and, 139

Montesquieu and, 116
paper money and, 116, 117
problems caused by, 116–17
support by individuals buying bonds or shares, 115–16
National Institute, 4–5, 54, 62, 79, 82
Native Americans, 22–24
Necker, Jacques, 133, 134, 135
neoclassicism, 74, 86
Ney, Michel, 8
No Bankruptcy, or Letters to a Creditor of the State, 128
Noël, Gabriel, 105
Nouveau Paris, *Le* (Mercier), 50, 60–61, 78

Oath of the Horatii (David), 74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in Society (Millar), 20–21, 25–26, 27, 37
On the Bank of Spain, Called Saint Charles, 123
On the Shares of the Water Company, 123
Ostend East India Company, 29, 30

Panchaud, Isaac, 126
pantalons (nankeen trousers), 58, 85, 86
paper money
assignats, 133–35, 138, 139–40, 141–44, 145, 146
bills of exchange, 117–18, 119
Clavière and, 127, 132–34
Franc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117
images on, 39
national debt and, 116, 117
as US legal tender, 117, 127
Paris Water Company, 123–24, 125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development of, 1
Persian Letters (Montesquieu), 19
pikes, 107
Pinkerton, John, 24–25
Pitt, William, 139
Political Affection (Rowlandson), 47
Poor Ruined Rentier—Fish to Fry, to Fry (Julien), 53, 56–57, *57*, 58, 60
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110–11, 114
porcelain and china, 12, 14, 16–18, 29
Portrait of a Woman and Her Child (Capet), 151
Portrait of a Woman (Capet), 151
portraits
attention to fashion in, 8

of deputies to the Estates General, 40–41, *41*, 70
of deputies to the National Assembly, 71–72
genre choice by French women artists, 66
miniatures, 66, 71–73, *73*, 79–80, 83–86, 88, 151
self-portraits by women artists, 66–70, 71, 79–80, 151
Price, Richard, 125
prints as revolutionary imagery, 37–63
Anarchist, *The* (Petit), 53, 58–59, *59*, 60
anonymous artists, 7
Boyer de Nîmes and, 43–47, 49, 51
Danger of Wigs, *The* (Vernet), 53, 55
English *vs.* French caricatures, 61–62
Folly of the Day, *The* (Boilly), 53, 55, 56
I Knew We'd Have Our Turn, 48
Incroyables, *Les* (Vernet), 53, 55, 61
Inside the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50–52, *52*
"M . . . r [Mercier], An Ass Like No Other," 50, *51*
Mérveilleuses, *Les* (Vernet), 53, *55*, 55–56, 61, 78
newspapers and pamphlets compared to, 38–39
ordered for propaganda purposes, 42
overview, 38–42
Political Affection (Rowlandson), 47
Poor Ruined Rentier—Fish to Fry, to Fry (Julien), 53, 56–57, *57*, 58, 60
portraits of deputies to the Estates General, 40–41, *41*, 70, 71–72
prices, 42
reaction to prints, 42–49
"They only wanted what was good for us," *44*, 44–46

Quéverdo, François, 149–51, *150*

Récamier, Juliette, 74
Regnault, Jean-Baptiste, 74
Regulation concerning the Drill and Maneuvers of the Infantry, 104–5
revolutionary armies
artillery, 91, 102–3, 107
battle of Valmy, 90–91
cavalry, 92, 94, 102, 103, 106, 111
demi-brigades, 102
deployment of divisional formations, 92, 102, 106
discipline, 93, 94, 99
distrust of noble officers, 93, 94, 95–96, 98
draft evasion, 94

election of volunteer officers, 92, 99–100, 112
emigration of noble officers, 89, 92, 103, 111
equality among soldiers, 151–52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101–2
government propaganda distributed to, 96
increased autonomy, 92
increasing professionalism, 110, 113
individual initiative in, 8, 105, 107, 113, 114, 152
invasion of Egypt, 109
loyalty to comrades, 94, 98
mass army and attacks, 105–6, 114, 152
mutinies, 93, 94
numbers of men, 90, 93–94
occupation of conquered lands, 108–9, 114
offense *vs.* defense, 104
officer corps disintegration, 89, 90, 93
pace of march, 107
patriotism, 92, 94, 96–97
rapid advancement through ranks, 99–100, 111
reforms, 92–93
skirmishers, 103–4, 105
strategy and tactical innovation, 101, 102–8, 114
troops' affection gained by new officers, 98
use of columns *vs.* firing lines, 92, 103–5
volunteers, at battle of Valmy, 91
see also war with Austria; *specific individuals*
Révolutions de Paris (newspaper), 48–49
Riqueti, Honoré Gabriel. *see* Mirabeau, Comte de
Robespierre, Maximilien, 49, 56, 71–72, 75, 76, 145
Roland, Marie-Jeanne, 50
Rousseau, Jean-Jacques, 3, 54, 152
Rowlandson, Thomas, 47, 61

Saint-Cyr, Laurent de Gouvion, 99–100, 104, 105
Saint-Domingue, 76, 109, 136, 137
Saint-Just, Louis de, 106
Salons
Salon of 1783, 73
Salon of 1785, 67
Salon of 1789, 39, 65
Salon of 1791, 39, 65, 71
Salon of 1796, 76
Salon of 1798, 84–85

Salon of 1800, 73
Salon of 1801, 83
Salon of 1808, 80
works by women, 65, 66, 67, 71, 76, 83, 84
Scharnhorst, Gerhard von, 104
Scottish philosophers
on Highlands and Lowlands, 24–25
rapid transformation in economy and, 27–28
societies compared and categorized, 12, 20–25
on women's status and level of civilization, 12, 20, 21, 27
see also specific individuals
Self-Portrait with Two Pupils (Labille-Guiard), *67*, 67–68, 69, 79, 80
short selling, 120, 121–22, 139
Sieyès, Emmanuel, 4, 5, 6, 54, 62
slaves and slavery, 2–3, 16, 76
see also abolitionist movement
slippers, 56, 57, 58, 78, 85
Smith, Adam, 20, 22, 23–24, 25, 26, 134
Social Contract (Rousseau), 3
social determinism, 2, 3, 19
social organization, 5–6, 37, 148
social science
Condorcet on, 4–5, 62, 125
Destutt de Tracy on, 5, 62
emergence in 1790s, 4–5, 148
French Revolution and, 4–6, 37, 61–63
Mill on, 5
Sieyès on, 4, 62
society as distinct entity, 1, 4, 37–38, 131–32
Society of the Observers of Man, 62–63
sociology, emergence in 1840s, 4
South Sea Bubble, 29
Spectator, *The*, 13–14
Spies-Gans, Paris, 65
Spirit of Laws, *The* (Montesquieu), 19, 116
Stadnitski, Pieter, 124, 127, 128
stage theory, 20–22, 25
Steele, Richard, 13
Studio Scene (Capet), 66, 80–84, *81*, 85–86, 88, 151
sugar, 15–16, 28, 29
superiority of Western culture, belief in, 18–19, 35–36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29–30

Tableau de Paris (Mercier), 49
Tallien, Jean-Lambert, 75, 76
Tallien, Thérèse (née Thérézia Cabarrus), 75, 76, 78
Talma, François-Joseph, 78
tea, 11–36
criticism of, 14
effect on status of women, 2, 12–14, 29, 30–31
English and Scottish tea rituals, 27, 28–29
imports to Britain, 15, 28–30
international trade, 15
smuggling of, 28, 30
tea paraphernalia, 11, 12
women's new roles as tea servers, 2, 11–12, *13*, 13–15, 29, 30–31
tea tables, 2, 11–12, *13*, 13–15, 29, 30–31, 149
Thatcher, Margaret, 3
theaters during the Revolution, 38–39, 66
Théremin, Charles, 66–67
"They only wanted what was good for us" (print), *44*, 44–46
Thugut (Austrian chancellor), 108
Titus cut for hair, 77–78, 83, 86
Tournezy, Adèle, 74
travel books and travel accounts, 17–19, 20, 22, 23, 36, 62

Valmy, battle of, 90–91, 95, 102, 104
Verger, Pierre, 100
Vernet, Carle, 52–53, 55, *55*, 59, 61
Vien, Joseph-Marie (senator), 80, 81–82, 83, 85
Vien, Joseph-Marie (son), 80, 85
Vieusseux, Pierre-François, 119
Vigée Le Brun, Élisabeth, 65, 68, 72, 73, 75
Vincent, François-André
Capet as protégée, 66
in Capet painting, 80, *81*, 82, 83, 151
death, 88
marriage to Labille-Guiard, 66, 79, 153
National Institute and, 79, 82
residences during Revolution, 72
Voltaire, 22

war with Austria and Prussia
battle of Valmy, 90–91, 95, 102, 104
beginning of war, 89–90, 103, 139–40, 153

early French losses, 90, 140
emigration of noble French officers, 89, 92, 103, 111
expansion in 1793, 91
Girondins' support for, 138, 139–40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101–2
numbers of men, 90, 93–94, 106
shortage of men and equipment in 1792, 89, 106–7
strategy and tactical innovation, 101, 102–8, 114
use of columns *vs.* firing lines, 92, 103–5
as war of masses, 105–6, 114, 152
see also revolutionary armies
Wedgwood, Josiah, 16–17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Sieyès), 4, 6
white tunics and chemise dresses, 73–77, 78, 86
wigs and fashion, 56, 57, 60, 77–78, 82–83, 86
women
artists, 64–88
domesticity and, 12–13, 14, 15
literacy, 30–31
new roles as tea servers, 2, 11–12, *13*, 13–15, 29, 30–31
status and level of civilization, 7, 12, 19–20, 21–22
see also specific women

Young Man in a Blue Jacket and Yellow Vest (Capet), 151

林恩・亨特 (Lynn Hunt)著作

History: Why It Matters 历史学为什么重要

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

Measuring Time, Making History 史学的时间之维

Inventing Human Rights: A History 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 文化和阶级

版权所有 © 2025 林恩·亨特 (Lynn Hunt)
保留所有权利
第一版
如需转载本书节选内容，请致函：Permissions,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5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110
如需大宗采购的特别折扣信息，请联系 W. W. Norton 特别销售部：specialsales@wwnorton.com 或 800-233-4830
夹克设计：贾森·霍耶 (Jason Heuer)
夹克插图：
文森特夫人画室时光，1808 年（布面油画），玛丽·加布里埃尔·卡佩 (Marie Gabrielle Capet)（1761–1818）/ 法国 / Bridgeman Images
书籍设计：帕特里斯·谢里丹 (Patrice Sheridan)
制作经理：朱莉娅·德鲁斯金 (Julia Druskin)
ISBN 978-1-324-07903-3
ISBN 978-1-324-07904-0 (epub)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500 Fifth Avenue, New York, NY 10110
www.wwnorton.com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15 Carlisle Street, London W1D 3BS